

中国皇帝全史

明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皇帝全传

明

李雪慧等编著

目 录

明

太祖朱元璋	(1)
惠帝朱允炆	(25)
成祖朱棣	(33)
仁宗朱高炽	(48)
宣宗朱瞻基	(58)
英宗朱祁镇	(67)
代宗朱祁钰	(82)
宪宗朱见深	(87)
孝宗朱祐禋	(97)
武宗朱厚照	(107)
世宗朱厚熜	(124)
穆宗朱载堉	(141)
神宗朱翊钧	(153)
光宗朱常洛	(174)
熹宗朱由校	(183)
思宗朱由检	(202)

明之卷

太祖朱元璋

明洪武 31 年（1398 年）五月，71 岁的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结束了他创业的一生。死后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南京钟山孝陵。

一、不幸少年 乱世崛起

元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安徽濠州太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祖籍是江苏沛县，祖上数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由于忍受不了地主的盘剥，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

朱元璋又名兴宗，幼名重八，字国瑞。其父名世珍。庄里人叫他朱五四，世珍生有 4 子，朱元璋为四。

他的母亲陈氏，对元璋十分钟爱。暑去寒来，小元璋在父母亲温馨的怀抱里悄悄地长大了。可社会、人生的苦难也在等待着对他的洗礼。债务、饥荒像瘟疫一般紧盯住世珍那摇摇欲坠的茅屋。

天真幼稚的小元璋那里晓得人间的苦难，有空便和小伙伴去村旁皇觉寺玩耍。这寺内的长老见他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便也抽空教他识文断字。元璋也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入耳便晓。天长日久，便也粗晓些古今文字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这时朱元璋的三个哥哥早已为生活所迫，给地主扛起长活。迫于生计，朱元璋也不得不独立谋生了。这样经人介绍他到村中地主刘大秀家放牛。起初元璋决意不去，后经父亲一番苦苦劝导只好去人家牧牛谋生了。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朱元璋在苦难的风雨中长成了17岁的英俊青年。可这一年他的淮西家乡，赤日似火，大旱千里，蝗虫横飞，瘟疫横行。太平乡里不太平。几个月的功夫，太平乡就死了几百口子人。

灾难也降到了朱元璋家。64岁的老爹世珍首先染病不起，命归黄泉。三天后，长兄朱镇（又名重四），又染疫身亡。过了十二天，母亲也离开了人间。一贫如洗的朱家，不足半月相继去世了三口，朱元璋那悲痛欲绝的情景实在难于言状。父母病亡，总要尽早下葬，以尽孝子之心。可是天下漫漫无际地，却没有朱家半垅田。后来多亏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小块地，也无从备办棺木，就草草把三位亲人掩埋了。

谁料父兄的丧事刚刚料理结束，两兄又染上了时疫，一同病去。昔日儿孙满堂的朱家，眨眼几天的时间只剩下了元璋和嫂侄三人。

困惑中，朱元璋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父母曾在皇觉寺许过愿，长大舍身当和尚。朱元璋心想眼下正无路可走，还不如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有碗淡饭填饱肚子，总比饿死强。计划已

定，他也不及同嫂侄打招呼，就匆匆赶到皇觉寺，拜高彬长老为师，就这样当了和尚。

寺庙是靠收租和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度日的。朱元璋投靠时寺里已有几十个和尚，几十张嘴，僧多粥少，坐吃山空，不久就无米下锅了。没奈何，高彬长老只好将徒弟一个个打发出去，云游四方，自谋生路。因此进寺刚刚几十天的朱元璋也只得头戴破帽，背上小包袱，一手拿木鱼，一手托瓦钵，告别皇觉寺，穿城越村，加入了化缘讨饭僧的队伍中。

朱元璋就这样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山栖野宿，串村走户，软求硬讨，饱尝了人间风霜冷暖之苦。他先行合肥，又走固始、信阳，再往汝州、陈州、鹿邑、亳州，后到颖州（今安徽阜阳）。整整三年，先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山大川，名都大邑。化缘使他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为他后来指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由于朱元璋亲身倍尝了人生的艰辛，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痛苦生涯。所以起义造反的思想在他心灵上渐渐萌发起来了。三年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尽管是那么艰难和痛苦，但也确实又为朱元璋后来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元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在饱尝了仰食他人，朝不及夕的化缘生活的艰辛后，又两手捧着木鱼和瓦钵回到了皇觉寺。迈进寺院，只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一派凄凉冷落的景象。朱元璋向邻居一问，才知道近年来，家乡民生凋敝，寇盗四起，昔日的师兄也都死的死，逃的逃，无一幸存了。寺无他人，人无他路。后经乡邻挽留，朱元璋便留下暂作了皇觉寺的主持，聊度人生。

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终于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由农民领袖刘福通在颖州首举义旗。彭莹玉，徐寿辉紧随其后，起义于湖北。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先后于浙东、苏北奋起抗元。不久定元土豪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也在濠州响应，占据濠州城。至此，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熊熊燃遍大江南北。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不断传来的战事，心情早难以平静了。几天后，朱元璋终于被卷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

朱元璋入伍后，打仗非常勇敢，无论遇到何等强敌，他总是奋不顾身，争先陷阵。加之他又识得一些文字，就格外受郭子兴的器重，遇有战事，总让朱元璋伴随左右。时间不长，他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

朱元璋当然也不负郭子兴的期望，愈加听从指挥，苦练武艺。每次战斗获得的战利品，他都全部交给元帅府；他受的奖赏，也公平分配；论功行赏，人人有份。这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甚得军心。

元帅郭子兴见朱元璋虽然年纪轻轻，却如此有见地，有胆略，精明强干，也就把他当作知己，益加信任了。

郭子兴有位养女马氏，是他刎颈之交的朋友马公的独生女儿。马公的妻子郑氏生下女儿，不几日就病逝了。后来马公杀人避仇，将爱女托于子兴。不久，马公客死他乡。子兴尤其是加意教养朋友的遗孤。

这马氏也是聪慧过人，几年时间已出落成一个窈窕淑女，到了婚配的年龄，但一直还没有选中一个如意的郎君。

朱元璋的到来使郭子兴想起了养女的婚姻之事，经与夫人

张氏商量，又征得养女和朱元璋的点头称允，就择日给两人成了婚。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身价顿升百倍，兵士亦另眼看待。

不久，义军队伍里发生了内讧。元帅郭子兴与歃血为盟的副帅孙德崖因战事不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孙遂设下圈套将郭子兴骗入家中，想秘密将他杀害，自立为王。朱元璋出征归来获讯后，立即带领亲兵，闯到孙家，直入客厅，怒道：“敌人威逼城下，副帅不去杀敌，反要谋杀主帅，是何道理？”

朱元璋说罢挥手让亲兵拥盾冲入孙德崖屋中，四处搜寻，结果在一矮屋里找到了被捆绑的郭子兴。朱元璋击断锁链，背负而归。自此，郭子兴大难不死，自然对元璋感激不尽，更加厚爱了。

1353 年春天，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回到了阔别的家乡，竖起红巾军大旗，募集兵马。小时候的伙伴徐达、周德兴等乡里青年，听说朱元璋在外当兵做了官，要来家招兵，一声召唤，都来投效。十几天的功夫就拉起了 700 多人的队伍。这些人，后来一直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成了起义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其中的徐达等 24 人，能文能武，成为后来的开国元勋。

数日后，朱元璋众揽英才，率兵而归。郭子兴见状喜出望外，遂擢升他为镇抚总管，令所募 700 人归他统率。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局促濠州，经与徐达密议，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即带着徐达、汤和等一班英雄豪杰南下定远，开辟新天地。定远之役是朱元璋统帅自己的队伍，为实现自己宏图大略的第一战。

定元有一支拥有 3000 多人的地主武装，驻扎在驴牌寨。因该寨人多势众，又有坚固寨墙，朱元璋只好用计巧取。朱元璋一行来到定远，闻知这寨中缺粮，他心生一计，叫兵士钻进布袋里，

诡称民夫送粮，来到寨门前，遣人通知寨主，请出门接粮。寨主哪知是计，正愁军粮无着，闻报自然大喜，急步出迎。寨门开后，朱元璋一声令下，兵士们破囊而出，立即将寨主拿下。寨中士卒见寨主被擒，无心恋战，也纷纷逃命去了。

首战告捷驴牌寨，朱元璋又乘胜星夜奔定远另一股武装缪大亨。险居横涧山的缪大亨，拥兵 20000 余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朱元璋会如此神速地偷袭他的营地，睡梦中他爬起来慌忙迎战，但怎能抵挡得住义军潮水般的攻势呢！缪大亨见大势已去，权衡利害，只好率众投降，归顺朱元璋。

朱元璋占据定远后，爱民练兵，威声大振，四方归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是定远的两个中小地主，因害怕红巾军，就组织乡兵结寨自保。后来，他们听说朱元璋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连克数敌，人心归附，就带着自己的乡兵来见朱元璋归附。朱元璋见冯家两兄弟，儒冠儒服，温文尔雅，知道是两个读书人，非常高兴。他便向他们二人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说：“大江以南，金陵（今南京市）为重地，向来是帝王龙踞虎踞的都会，你率师南下，先夺取金陵为根据地，然后四处征战。倡仁义，收人心，救民于水火，不贪财宝女色。如此夺取天下是不难的。”朱元璋闻罢大喜，即令国用、国胜兄弟参赞戎机。同时下令拔营向金陵方向进发。

大军行进途中，又有人谒见朱元璋。此人姓李名善长，字百室，也是定远籍的地主知识分子。他从小读书，注重研究法家学问，很有些智谋。朱元璋高兴地同他促膝交谈，问他夺取天下之方略。李善长从容答道：“秦末大乱的时候，汉高祖以布衣起兵。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五年就成帝业。你是濠州

人，距离刘邦家乡沛县不远。如果你能效法汉高祖的长处，天下是可以平定的。”朱元璋听后连连称善，当即留在身边帮助自己出谋划策。文人儒士的韬晦方略使朱元璋坚定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加快了他横扫群雄，统一天下的步伐。

元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这位起义领袖亡去了。刘福通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义军的副元帅。不久，在两位副帅先后战死后，朱元璋又被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为朱元璋调动指挥了。

元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按既定战略攻取金陵。在城外的一场激战中，元军大败，仅收降元兵即达 36000 多人。降兵收容后，不知朱元璋会如何处置，个个非常恐惧。朱元璋身旁的将士向他进言，降众过多，怕有他变，不如及早处置。可朱元璋没有采纳将士们的意见，而是在降卒中挑选 500 个骁勇健壮者，带到自己的营房，夜里让他们环榻而寝。房中除留冯国用外，他平日的卫士一个也不留宿。朱元璋脱下战甲，登床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500 名勇士非常感激朱元璋的信任。数日之后，朱元璋复用这 500 名降卒为先锋，攻打金陵城。降卒们感恩思愤，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长驱直取金陵城下，人人荣立战功。3 万余名降卒见朱元璋果真以诚相待，也感激不已，以后做战中忠心为他效命。朱元璋的队伍由此所向无敌，名播四方。

攻占金陵之后，朱元璋改金陵为应天府。这时，在他的北面是义军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地盘不大，但东、西、北三面都有义军力量处在第一线，似屏障一

样保护着朱元璋这支义军队伍。朱元璋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以应天府为中心，先后迅速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今安徽歙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扬州、衢州等地。

这时候的朱元璋，经过七年枪林弹雨的洗礼，已由一个只为求食谋生的和尚，成长为一名驰骋沙场的义军将领；由一个小小的步卒成长为称雄一方的霸主。元至正十九年（1359），元末农民起义军名义上的首领，建立了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又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左丞相。

二、削平群雄 以猛治国

1357年在胜利攻占徽州之后，朱元璋曾亲自来到了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讨教治国平天下之策。朱升高瞻远瞩送了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以减小受攻击目标。朱元璋听后连连点头。朱升的话虽不多，以后确实成了指导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行动纲领。

朱元璋按照朱升的策略，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注意军事训练，提高义军将士作战的本领。同时，在战事频繁的空隙中，抓紧粮食生产。在义军中第一次设置了营田司，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项农业生产的事宜。并且还抽出一些将士，利用战争的空闲时间开荒种田。几年的功夫不仅解决了军队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了大量的剩余，改变了历来打仗的军队靠吃军粮的习惯。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自己势力范围

内农民的负担，军民皆大欢喜，起义军得到了百姓的欢迎。

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较早地暴露自己，以防止在力量脆弱时被吃掉，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红巾军的红色战旗，就是斗争的口号也与宋政权一致不二。

朱元璋经过数年卧薪尝胆，集蓄力量，开拓疆土的斗争，巩固的根据地终于建立起来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崛起为一支足以与元末其他义军和元军匹敌的强大的义军队伍。

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当朱元璋占据应天府周围地区的时候，雄居东方的张士诚占据了以平江（今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富庶地区。独霸西方的徐寿辉以武昌为中心，控制了湖广、江西的大片肥田沃土。昔日还是左右逢源的朱元璋此时却处于两面夹击之中，局势相当严峻。同时，随着朱元璋军事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与各个义军割据政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至此群雄逐鹿中原，决战天下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徐寿辉的部军陈友谅以派人祝贺胜利的名义，在江州（今九江）杀死了徐寿辉，并宣布即了皇帝位。定国号为汉。陈友谅立国称帝后，马上就同张士诚合谋共同举兵，进攻应天，企图顺江而下一举消灭朱元璋的队伍。

这场战役持续了36个日日夜夜，朱元璋昼夜和将士们战斗在一起。他白天用旗帜，夜晚用灯笼，沉着指挥，激励将士。有时他乘坐的指挥舰被击中，马上换只船继续指挥。不久，朱元璋终于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重大胜利。

鄱阳湖之役后，朱元璋的领土已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地广兵多，局面打开了。这样，朱元璋称王称霸的欲望也

就随着膨胀起来了。在部下的再三劝说下，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在应天自称吴王，设置百官，建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是年二月，朱元璋乘胜亲征武昌，陈理举国请降，汉政权灭亡，湖广遂划入朱元璋统治的版图。

朱元璋灭亡了汉政权后，又开始向新的目标挥师进军——消灭雄据东方的张士诚。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其基干队伍也是一些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部分贫苦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凌辱，奋起起义，作战十分勇敢。但其领导集团没有远大目标，腐败得很。也自封吴王的张士诚无大志，无主见。终日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只图享乐。其属下的将军大臣们也争相修花园，玩古董，养戏班子，整日寻欢作乐，有的将军甚至打仗还带着舞女作伴解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1366年底，朱元璋在逐步攻占了张士诚所属各城镇后，率军将其都城平江围得水泄不通。张士诚的大将吕珍、李伯升见势不妙，先后投降。平江城十分坚固，一时难以攻克。朱元璋想起了几年前海宁人叶兑献的“锁城法”，便命令士兵在平江城四周筑起长围，搭架三层木塔，登上塔顶，由此城里敌人的活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又在塔顶架起弓弩火铳和铁炮，日夜轰击。不久城破，张士诚自缢身死。

朱元璋攻占了张士诚盘踞的长江下游大片地区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并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在实现了除四川、云南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统一后，朱元璋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封建政权展开最后的大决战。

这时的元朝政权在红巾军连续的沉重打击下，加之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日趋瓦解了。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亲自制定了一整套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拆除大都的屏障；再挥师河南，剪除其羽翼；然后夺取潼关，占据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全为其所掌握，最后进兵大都，元军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

北伐战争几乎完全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1367年十一月徐达率军挺进山东，三个月后，平定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胜利进军河南。到1368年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大都的战略目标已告完成。

在北伐军横扫中原，直逼大都的时候，元军却在因皇位的争夺而忙于内战。待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慌忙调集正内战不休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李思齐的队伍，南下迎战。但腐败的元军那里还有战斗力，逢战必溃。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深夜带着后妃太子狼狈逃往上都（今内蒙多伦）。第二年八月，徐达统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中国达99年的元朝政权宣告败亡。

接着，徐达、常遇春乘胜挥兵四进，攻占了北方诸省。1371年朱元璋又遣水陆两军，平定了四川。1382年平定了云南。1387年元朝丞相纳哈出降辽东。至此，除漠北新疆外，统一全国的大业已基本实现。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正当北伐军胜利攻克山东的时候，四十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于应天正式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立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就这样，一个

牧童和穷和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还是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前夕，朱元璋将文武百官请到自己的身边，给大家出了个题目：元朝为什么会迅速土崩瓦解？不久将诞生的新王朝当务之急是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高参刘基首先进言，“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整肃，然后才能实施新政。”

朱元璋感到言之有理，也深感大明朝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根据朱元璋的命令，法律的制定工作加紧进行，到 1397 年正式颁布了几经修改的《大明律》。《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 16 岁的都要处斩。对官吏贪污，处罚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 60 两以上，将被处梟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满怀信心，带头实行，而且执法是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朱元璋唯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

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梆梆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以法处死。

朱元璋当皇帝的30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孜、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朱元璋专门设立了巡检司。当时，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都由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百姓如果要到百里之外去，事先必须办妥路引，否则就通不过关卡。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正式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随时向朱元璋报告社会上不公不法之事。同时，还授予锦衣卫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一切大权。在锦衣卫内设立了特殊的法庭和监狱。将锦衣卫变成了正式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在位的30多年间，特务多如牛毛，遍布街巷路途，严密监视着朝野内外、文武官员的活动。吏部尚书吴琳已告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便派特务到吴琳家乡去侦

察其活动。特务来到稻田，只见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从小凳上站起来，便上前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吗？”老人回答：“敝人便是。”朱元璋听了特务的这一报告后非常高兴。

大学士宋濂一次在家设宴招待客人，第二天朱元璋问他，“昨天请客，喝酒了吗？做的什么菜？”宋濂如实做了回答。朱元璋笑道：“说得对，没骗我。”

国子监祭酒宁讷一天在家暗生闷气，偷偷监视他的特务竟把他这时的样子画了下来，上报皇上。朱元璋见了宋讷问道：“昨天你在家生什么闷气呀？”宋讷照实做了回答。他吃惊地问朱元璋如何知道此事？朱元璋将画像递给他，他展图一看，方才醒悟，慌忙磕头谢罪。还有一大臣一日无事，在家与妻妾玩麻将，无意中丢了一张二万，怎么找也找不着。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这个大臣昨天在家干什么，该大臣如实说是在家与妻妾玩牌，请皇帝恕罪。朱元璋听后说：“卿不欺我，朕不怪也。”说完从袖中摸出一张二万扔给了他。

朱元璋害怕受廷臣蒙蔽，常常和侍从易服微访，对臣僚进行私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投奔了朱元璋后，常常犯颜直谏，刚正不阿。朱元璋对他一直很不放心。一天，朱元璋亲自来到城郊的罗家私访。不巧，这天罗复仁和他的妻子正在家粉刷破旧的墙壁。他一见皇帝驾到，急忙叫妻子搬过小凳，请皇上坐。朱元璋四周环视了罗家的房舍家俱，一见家贫如洗，十分感动，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的房子呢！”马上下令赐给他一座城中的大宅第。

三、加强集权 铲除功臣

建国以后，朱元璋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以改革旧制，建立高度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宏伟事业。

朱元璋的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地方机构开始的。元朝地方设置的行中书省，是从中央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职官的设置同中央中书省一样，掌管着一个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地位显赫，权力很大。实际上一个行中书省，就是一个小独立王国。想当年，朱元璋也做了几年行中书省的丞相，所以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端看得最深切。

在一番准备之后，朱元璋于洪武九年（1376），下令废除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权力范围也只限于民政和财政，按照皇上的意志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共设 13 个布政司。同时，地方上还设置了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三个机构彼此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同时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对中央政府机构，首先是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实行改革。本来中书省在中央的各个权力机构当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的矛盾最易激化。明初的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皇上朱元璋形成大的矛盾冲突。但

相位传给胡惟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胡惟庸是定远人，是开国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他依仗着李善长这个后台当上了左丞相。在朝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官员升降、生杀大事，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朝野内外的报告，凡对自己不利的全扣下来；想做官、升官的人，失意的功臣、武将，都奔走他的门下，收受金银、绢帛、名马、玩物不计其数。他四处网罗自己的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自己的小集团，打击异己力量，称霸天下。

胡惟庸如此胡作非为，不仅必然危及明王朝的安定，而且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也必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朱元璋下决心寻找机会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以巩固皇权。一天，胡惟庸的儿子乘马车在南京城里招摇过市，不小心从车上跌下来摔死了，胡惟庸判车夫抵命。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气愤，他非要胡惟庸偿命不可，胡惟庸请求，向车夫家人赔偿金帛以了此事。朱元璋坚决不准。胡惟庸听了十分紧张，遂坚定了起事政变的决心。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入奏，诡称其住宅中井出醴泉，请朱元璋去观看。朱元璋好大喜功，信以为真，也就匆匆驾出西华门。他正行进中，突然内使云奇冲上辇道，拦住车马，慌忙中一时几不成声。朱元璋以为不敬，即令左右侍卫棍锤乱下。顿时，云奇右臂被砸断，生命垂危。但他仍用左手直指胡惟庸的宅第摇晃。朱元璋猛悟，急忙返驾登城，远远望见胡惟庸宅第中绕有兵气，以此定胡惟庸谋逆，立即发羽林军逮捕胡惟庸，将其抄家灭族。同时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上负责。并且规定，后代皇帝不得再立丞相，大臣中如果有奏请再立

者，处以重刑。

胡惟庸被诛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行为跋扈的、心怀不满的、危及皇家统治的、都统统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案株连蔓引，先后持续了数年。前后共杀掉了官员三万多人。连位居“勋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 77 岁的李善长，及全家 70 多口人也一齐被杀。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又对中央监察、审判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原先，中央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1），朱元璋改为都察院，下设 13 道，110 名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的；或是贪污舞弊，心术不正，变乱祖制的都要检举弹劾。

这些监察御史本来只是七品官，但在朝可监察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是代表皇帝出巡，小事立断，大事可直接报告皇上裁决。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朱元璋的皇权确实是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着繁重起来了。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从清早到深夜，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务和批阅文件上，就是吃饭他也在想着政务，每想到一事，就顺手写在纸上，别在衣服上。有时事情记得多了，纸挂得满身都是，待上朝时就一一把它处理了当。

政务的纷繁使朱元璋喘不过气来，长此下去，不是皇帝身体要累垮，就是延误军国大事。为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以帮助朱元璋来

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以备顾问。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改观了。

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称帝后自然特别重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原统领全国军队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在废中书省的时候，把大都督府也一分为五。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统全国军队。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权力。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发生战事需要指挥调动军队时，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颁布调兵命令。战事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乱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的。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3000人，多的可达19000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新显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

数千人之多，到处敲榨勒索、霸占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且功高震主。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对蓝玉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朱元璋亲自审讯，继交由刑部锻炼成狱。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均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15000多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是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聊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他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

朱元璋这种杀功臣立威，以猛治国的策略，自己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这种做法。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能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安定的局

面。

四、发展屯垦 减轻赋役

朱元璋在对政治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是啼哭呻吟的流民，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景象。杭州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名城，为后来南宋的京都。元代时人口曾达百余万，且是元末破坏最轻的地区，但元末人口死亡也达十之二、三。江南如此，江北更甚。唐宋时代的繁华盛地扬州，待朱元璋部将廖大亨攻取时，城里只有 18 家居民。新任知府因旧城空旷难守，只好在西南部截下一个城角，筑起城墙，权作扬州府城。

面对着这种残破衰败的局面，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它一样。现在必须让老百姓“安养生息”。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奴仆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民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一

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河南布政使司曾赎回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的男女达 274 人。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且禁止 40 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 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开垦这些荒地，朱元璋采取了计民授田，奖励垦荒的措施。建国的头一年，朱元璋就颁诏书于天下：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别人开垦的就成为垦种者的田产。如果原田主回来，由官府拨给同等量的荒地做为补偿。对无主荒地，奖励农民尽力开垦，并承认其所有权，而且免征三年的田赋，个别的永不收税。这样一来，许多农民由奴隶变成了自耕农，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向上的景象。

朱元璋奖励屯垦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果。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垦田面积达 3874746 顷，比洪武元年（1368）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税粮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税粮达 32789800 石，是元朝一年税粮收入的三倍。同时人口也增加了 700 多万人。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

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按照朱元璋的命令，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国共开塘堰 40987 处，疏通河流 4162 处，修建陂渠堤岸 5000 多处。洪武二十三年（1390），修江南崇明、海门的海堤动用了 25 万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修建江南溧阳河坝 4000 余丈，组织 40 万人上阵。这些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明代以前，棉花是十分珍贵的。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到了明代中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五亩到十亩的，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按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

虽然明初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依然不忘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他常对朝臣们说，“步急则蹶，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他常常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尽力做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来计算，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州县服役 30 天。这些都比元

代赋役减轻了许多。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各地闹灾荒歉收的，都要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要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的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的区别；每天的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都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双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他发现了，气得他痛骂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笠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们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札、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朱元璋是一位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从一个贫苦的小牧童，成长为明王朝的开国大帝。其文功武略，堪称一代天骄。

惠帝朱允炆

自太祖朱元璋奠基开国，到思宗朱由检煤山殉国的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有一位在位仅仅四年的悲剧人物，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

朱元璋一生迭纳数妃，生有26子。长子朱标在被立为太子25年后突然病死。朱标有子5个。长子英早亡。身为朱标第二子的朱允炆便成了大明王朝第二代皇储的重要人选。

在朱元璋的众多子孙中，堪与朱允炆竞争皇储的唯有朱元璋的第4子、朱允炆的叔叔朱棣。

朱棣沉鸷智勇，屡建战功。朱元璋曾夸赞说，四子棣酷肖自己。因而在皇族中，朱棣特别受到父皇的钟爱。但燕王不是皇后所生，即不是嫡出。按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法，朱棣没有被立太子的资格。但朱允炆头颇稍偏，性格又酷似其父亲朱标，优柔寡断。所以朱元璋常常为此担忧，生怕一旦立允炆为皇孙，难成重器，毁了大明江山。

事情拖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已到60多岁，不立储已

不行了。经过了长时间对朱允炆和朱棣的观察思索后，朱元璋最后还是下决心要立燕王朱棣为太子。这年九月，朱元璋亲自召集群臣会议，商量立储事宜。朱元璋说，“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

谁知朱元璋话音落地，翰林学士刘三吾即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其他大臣也纷纷表示，应尊重礼法，父死子继，嫡庶有别。

经过一番争论，朱元璋难以说服众臣，只得屈服于祖制仪礼，含泪收回了爱子朱棣为储的提议，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立储落马自然愤愤不平。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太祖朱元璋病逝。22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登极即大明皇帝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是为明惠帝。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和朱允炆的嗣位，一场巩固皇权和夺取皇权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地展开了。

朱元璋临死前曾留有遗诏，令诸王镇守国中，毋须来京。诸王均依照父皇的诏令，遣使吊唁，唯有燕王朱棣不顾父命，星夜南下，当其人马即将到达淮安时，被兵部尚书齐泰侦知，即禀报新帝允炆，遣使出阻，促令他还国燕京。

朱棣对此怀恨在心。其他诸位亲王虽未起行，但也心怀不满。特别是几位年纪较大的塞王，都是久经战阵，屡建功勋的人物，手里又握有重兵。当然不把年轻、孱弱，又无治国安邦经验的侄儿放在眼里。这样一来，不敬之语常出王府，违法之事时有发生。而几乎成为太子，深受父皇宠爱的朱棣对最后都不能望父皇一眼以尽孝心更是恨恨不平。

年轻的惠帝对诸叔父的势力过大也深感不安，经过一番思

考后，他接受了一些亲信大臣的意见，决心削平诸叔父的独立王国，加强中央皇权。这一天他召来亲信大臣，原来自己的老师黄子澄计议。黄子澄举汉平七国的故例启示允炆，允炆对此欢慰不已。

两人密语不久，惠帝又收到了户部侍郎卓敬的秘密奏书，劝告允炆，“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

惠帝阅毕，次日即召卓敬入殿密议。但谁知事机不密，不久新主削藩的流言便很快传遍京师内外。

朱棣闻讯后，那肯束手待毙，一面上书称病，一面在王宫中私制兵器，招兵买马，搜罗异人术士，加快了应付事变，夺取皇权的步伐。

朱棣的不轨行为，被惠帝获悉。针对此种局势，他即刻召齐泰、黄子澄等入殿，再次共商对策。这些大臣不久一致主张即速削藩。但考虑燕王蓄谋已久，恐仓猝下手又引起大乱，这样计划先削废周、齐等弱藩，剪除燕王的手足，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废除燕王。

在削除弱藩时，为了防燕王产生异动，惠帝依照齐泰等的建议，先对燕王做了充分防范。首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控制行政，再命都指挥谢贵、张信，分掌北平都司事宜，掌握军队。最后命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外称为的是防御外寇。最后调遣都督耿王献，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以行戒备对北平呈包围之势。

内外布署完毕，惠帝便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密令曹国公李景隆率兵千人，奇袭开封，把分封此地的周王朱橚及

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废为平民，贬谪云南。后又召朱棣还京，锢禁狱中。

接着惠帝又于建文元年（1399）初，以有人告发岷王梗违法为由，下令将其废为庶人。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的湘王柏有不法行为，朱柏获悉被告发京师，全家自焚而死。接着齐王朱木也 也被削为平民，不久惠帝又下令将代王朱桂囚禁于高墙。

短短数日，五位亲王先后被废黜，暂还苟安的亲王俱为震恐。尤其是燕王朱棣，左顾右盼，愈觉大祸即将临头。

不久，南京连下朝旨，严责朱棣儿子高煦，擅杀吏民罪状。并将燕王府官吏于谅、周铎捕戮京师。朱棣见势不妙，为减轻建文帝的戒心，示以他无力争夺皇位，便佯装狂夫，披头散发，语言颠倒，走呼街头。他时而抢食市人酒饭，时而奄卧沟渠，竟日不起。

张昺、谢贵闻听燕王病重，不信，便入邸问候。虽时值盛夏，红日炎炎，而燕王府邸内却设火炉，炉火熊熊。家人虽大汗淋淋，唯独朱棣身披羔裘，兀坐炉旁，还连呼天寒。

张昺、谢贵见此情景，不由不信以为真。但谁知燕王府官吏葛诚说：“燕王诈疾，公等慎勿为欺。”两人闻后，正在犹豫间，惠帝已亲讯逮至京师的燕王百户官邓庸，获悉燕王谋反的确凿证据，因此严令张昺、谢贵和北平都指挥张信一起，内外呼合，逮捕朱棣。张信过去曾被朱棣信用，接到抓捕朱棣旨令后，一时竟不知所措。便把自己的心事偷偷向母亲叙说了。其母闻言大惊，执意劝子抗命不从。张信权衡利害，果遵母命。他换上便服，乘着妇人车，偷偷进入燕王府，将皇帝下旨掩捕朱棣的消息，一一密报于燕王朱棣。

朱棣获悉朝旨，跪谢张信救命之恩，且当机立断，先发制人。首先设计谋杀了前来掩扑朱棣的张昺、谢贵等，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毅然起兵抗命造反。

为出师有名，争取舆论，朱棣援引父亲朱元璋《祖训》中所训示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理由，直指齐泰、黄子澄为奸逆，须加诛讨。自称举兵为“靖难”。这就是历史上朱家皇室内争夺皇权的著名“靖难之役。”

“靖难”始初，惠帝对频频传来的恶讯，还并不在意，只是采取了一些常规的防范措施。首先是祭告太庙，削去朱棣属籍，废为庶人，然后是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讨伐。

耿炳文领命出师，兵众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只调集十三万人马。足智多谋的燕王朱棣，对耿炳文的用兵之术了如指掌。在中秋之夜，他乘南军不备，将南军先锋部队全部歼灭。接着朱棣又在滹沱河的北岸，大败耿炳文的主力部队。

败绩传入京师，惠帝异常的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对策。黄子澄回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以为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改任他来代替耿炳文。”

惠帝拜李景隆为大将军，并调集诸路五十万兵马，进兵河间，以报南军败绩之仇。

朱棣闻听京师易将，竟命李景隆披挂帅印，喜不自禁地说：“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隆竖子，寡谋而骄，给他五十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

当时，辽东方面的明朝军队受命进攻已被朱棣控制的永平，永平被围，军报告急。朱棣同诸将计议说：“我在这里，李景隆不敢来攻。我若率军去援救永平，他准会乘虚而入来攻打北平。

到那时我再回师北平，内外夹击，李景隆就大败无疑了。”但诸将都感到北平守兵太少，不敢冒此危险怕丢了根本之地。朱棣说：“城中之众，以战则不足，以守则有余。我此去不只为救永平，还要引诱李景隆来就擒，一举而两得。”

九月，朱棣以计率燕军赴援永平。临行时再三告诫留守北平的长子朱高炽说：“李景隆杀来，只宜坚守，不能出战。”他临走时，又故意撤去了芦沟桥上的守兵，以引诱李景隆深入。李景隆不知是计，听说朱棣已率师援救永平，果然于十月匆匆忙忙驱兵直杀北平而来。大军过芦沟桥时，没见一个兵士守卫，便喜不自胜地说：“不守此桥，我看他是无能为力了。”真以为北平唾手可得，遂命大军直逼北平城下。

朱高炽严遵父命，督师固守，连城中的妇女也被动员出来参战。李景隆所统帅的南军，却号令不严，指挥不当。兵马虽众，但胆小怕死，不敢向前。唯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亲自与两个儿子率领千余精骑，直攻张掖门。眼见大功告成，登上城门。但李景隆满怀忌恨，唯恐瞿能父子得了头功，在需要增援时，不仅不发援兵，反而勒令缓攻。燕军藉此喘息机会，连夜泼水城墙，天寒地冻，第二天城墙上挂遍冰凌，南军就这样失去了攻城的机会。

朱棣在击败永平的辽东军队，又设计攻破另一重镇大宁，收编了大批军队之后，挥师北平，与坚守在城内的长子高炽，里应外合，发起了对南军的全面反击，李景隆那里抵挡得住燕军潮水般的攻击，由于害怕竟独自连夜逃往德州。南军将士见主帅已逃亡，也无心再战，丢下粮草兵械，纷纷溃降。

李景隆兵败北平的消息传到京师后，被黄子澄暗暗匿住。他

怕承担误荐之责，竟向惠帝谎奏，景隆北平交战获胜，因天寒难以用兵，暂退德州，待明春再战。

惠帝信以为真，喜不自胜，即封李景隆为太子太师。李景隆因祸得福，转危为安，对黄子澄自然是感激不尽。建文二年（1400）四月，李景隆在建文帝的多次催促下，不得不誓师德州，率兵六十万与朱棣于白沟河（今河北省雄县北）展开决战。这场恶战，两军只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结果李景隆又遭惨败。南军被杀死、蹂躏和溺死者达十几万，横尸百里，惨不忍睹。战乱之中，李景隆则又潜逃德州。南军抛弃的器械辎重，好似山积。他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给丢弃了。

朱棣乘胜追击，兵围德州。李景隆又弃德州，逃命于济南。朱棣还是尾追不舍。李景隆只得仓猝迎战。十几万南军布阵未定，就被燕军冲垮。

建文四年（1402）五月，燕兵过关斩将，向南节节推进。在击败扼守淮河南岸的盛庸军队之后，乘胜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江北重地后，屯兵镇江，休养数日，待机进击京城。

惠帝见大势已去，只得派人前去北营前求和，可是这时的朱棣根本不予理睬，挥兵直逼金陵城下。这时朱棣的弟弟谷王朱木惠和李景隆，正在京城内率兵把守金川门，他们见朱棣已兵临城下，便开门迎降，燕兵即刻冲入金陵。

燕兵入城，建文帝惠帝去向何处？其说有二，各有道理，但又难以定论，遂成为明史一大疑案。

一说，当燕王朱棣“靖难军”打入京师，惠帝闻报，在命人点起大火后，他含泪偕同皇后等，投火自尽。

二说，认为惠帝并没有“阖宫自焚”，而是化装由地道逃出京城，以后隐姓埋名，剃度为僧，在江浙一带上岸之后，浪迹天涯数十年，云游于滇、黔、巴、蜀之间。史载朱棣即位后，自1405年始，派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不只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还带有寻找惠帝踪迹，以防后患的秘密使命。

另有史载，惠帝正统朝恢复本来面目，得到明英宗认可，从而入居宫中，寿年而终。死后葬于北京西山。

成祖朱棣

元至正二十年（1360），正在鄱阳湖前线同陈友谅进行着殊死激战的朱元璋得到报告，他又喜添贵子。这个儿子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也是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

一、少年英杰 靖难夺位

朱元璋一生得子 26 个，其中相貌奇伟，聪明伶俐的朱棣在众兄弟中自小就倍受父亲的钟爱。朱元璋常常自豪地对朝臣们夸赞，棣儿酷似自己。在小小朱棣刚长满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封他为燕王。洪武十一年（1378 年），宫廷要为朱棣诸兄弟确定宫城制式，朱元璋特别关照说，除燕王宫殿按元朝皇宫制式外，其他各王府均不得引以为式。由此可见少年的朱棣已经成了父亲朱元璋心中的明珠。

从洪武十一年（1378）开始，朱元璋陆续将各亲王派到他们自己的封国去。洪武十三年（1380），20 岁的朱棣也进驻了北平封国。当时徐达奉命镇守北平，朱棣有了这样的军事家做老师，

因此军事理论与武艺都迅速提高。

徐达不仅是朱棣的师长，也是他的岳父。这月下老人正是皇上朱元璋。徐达的长女自幼贞静，尤好读书。朱元璋听说后，便将徐达叫到跟前说，咱们是布衣之交了，过去君臣相契的率为婚姻，现在你的令女就同我的四子相配吧。徐达当然求之不得，也就欣然应下了这门亲事。洪武九年（1376），徐氏册为燕王妃。

朱棣在徐达的严格教授下，练得一身好武艺，逐渐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后来明王朝胡惟庸、蓝玉案发生后，当年跟随朱元璋开创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宿将几乎全给株连杀光了。这样北部防御蒙古侵扰的任务，朱元璋就只能交给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承担了。时称他们为“塞王”。但是，秦、晋二王都先后死于父亲之前，这样只有燕王朱棣的军事实权最大。朱棣还得到父亲的特许，军队中小事立断，大事方报知朝廷。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他的器重与其权力之大。

当然，朱棣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智勇有大略。在同入侵的蒙古军队交战中，屡建战功。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元残余势力南侵，朱元璋命令朱棣和晋王带兵北征。晋王胆怯，而勇猛果敢的朱棣置生死于度外，独自率傅友德等大将，挥师深入。进军中正遇大雪，不少将领又主张即刻停止深入。朱棣说，正因为天降大雪，敌人才毫无戒备。出其不意地逼近了敌营，迫使元残余势力未战而降。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大喜，说：“将来肃清蒙古沙漠者，还须靠燕王！”后来，朱棣多次受命北征元兵，多有战功，军权日重，威名大振。

朱棣权力愈盛，兵马愈强。尤其是太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有意立朱棣为太子，而众大臣所阻后，不仅使其恨恨不平，更滋

长了他夺取皇位的欲望和野心。

就在朱棣对不能当太子继承皇位愤愤不平时，71岁的朱元璋撒手抛开了他紧握了31年的皇权，离开了忧心重重的皇太孙，长辞人世。

22岁的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登上大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御座。同时，身居元都北平的叔叔燕王朱棣，也正日夕窥伺着侄儿的皇位。这样，朱姓皇族中一场争夺皇权的血战就一触即发了。

明帝朱允炆对于藩王叔叔们的权力过大，不是没有警觉，早在祖父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一次朱元璋非常自信地对惠帝说：“我把防御蒙古的任务交给诸王，边防既有保障，你就可以做个太平皇帝了。”惠帝沉思后说，“边境不安定有诸王抵御，诸王不守本分，由谁来抵御呢？”朱元璋反问说，“你的意见如何？”惠帝坚定地回答：“用德来怀柔他们，用礼来制约他们。这两条不灵，就削去他们的地盘，更换他们的封地。到再不行的时候，就只好用武力讨伐。”朱元璋闻言有理，便高兴地说：“对，再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

但惠帝是个有识无胆，仁柔寡断的年轻天子。即位后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他首先起用了齐泰和黄子澄两个亲信。一天晚上，惠帝把黄子澄叫到密室中说：“诸叔父各就封国，拥兵自固，若有事变，我该如何对付呢？”黄子澄引用汉平七国的例子，为惠帝出谋划策。惠帝又与黄子澄商量先拿谁开刀呢？齐泰主张先收拾燕王朱棣，认为以免打草惊蛇。但黄子澄则认为，周、齐、湘、代、岷王过去就有犯法行为，先削五王名正言顺。并且周王还是燕王的同母弟，削去周王的封国，就等于砍去燕王的手足。惠帝

同意按此法办，即下令将周王朱棣抓起来，削去王爵，降为平民。同时岷王朱楩、代王朱桂、齐王朱木 的王爵也先后被削去。湘王朱柏则自焚而死。

朱棣虽远离京都，身居北平，但京中发生的事情，他却无不知晓。听到前五王的命运，左右权衡，觉得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举兵造反。

建文元年（1399）七月五日，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说朝廷出了齐泰、黄子澄等坏人，必须起兵诛杀他们。于是，燕王削去建文年号，自置官属，布告天下，下令讨伐。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爆发。

朱棣起兵后，以闪电战术连拔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数县州，抢先攻占了北平北面和东面的一些军事重镇，补充了兵源，排除了后顾之忧。接着集中兵力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

当时朝廷中的元勋宿将在“胡蓝”大案中，已经诛杀得差不多了。侥幸活着的也寥若星晨。战事爆发，闻报朝廷，惠帝几经斟酌，只好命令年已古稀的老将耿炳文，带兵 30 万北伐燕军。两军交战不久，南军先锋部队全军覆没。八月南军主力部队又再败于滹沱河北岸。

这样明帝只好以李景隆代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隆本来是个膏粱子弟，素不知兵。朱棣设计撤去芦沟桥防线，诱敌深入。他把固守北平的重任交给儿子朱高炽，自己领兵直趋永平大宁，逼宁王交出精锐部队，包括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收归己有，由此增添了几万精锐兵力。

无勇少谋的李景隆，果然上了朱棣的圈套。他听说燕王出师救永平，便于十月驱兵直指北平。南军中唯有都督瞿能勇敢善

战。他率领自己的儿子及前锋部队，直杀入张掖门。正当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心胸狭窄的李景隆怕瞿能得了头功，竟然命令暂停进攻，命大军全到了一起发动总攻。这样就给燕军以喘息的机会。当时正值隆冬寒天，气温骤然下降。朱高炽命令将士连夜向城墙泼水，瞬时便结下厚厚的一层冰。待李景隆率大兵赶来，早已失去了战机。南军久攻不下，反而被从大宁、永平胜利回师的朱棣，大败于城下。李景隆率先逃遁，连夜奔回德州。南军士兵见主帅已逃，也都潮水一般一泻千里，落荒而逃。

不久李景隆又纠集 60 万大军北上，与朱棣大战于白沟河，复又大败。南军将士被杀死、溺死的有十几万人，又经过几番苦斗，1402 年，朱棣率领大军，从馆陶渡过黄河，在击败阻击的南军后，一路不计城池得失，挥兵直取扬州。

明帝见势不妙，急忙派使臣到燕军营中议和，答应割地休战，但此举被朱棣拒绝。

1402 年六月初三，朱棣挥师渡江。燕兵舳舻相接，旌旗蔽天，金鼓如雷。南岸的守兵见状吓得魂飞胆破，一经交战，即全线崩溃。明帝又派人议和，朱棣根本不予理睬，驱兵直逼南京城下。据守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李景隆，见燕兵杀来，便开门迎降，京师遂破。惠帝去向不明。建文朝亡，历时三年之久的朱姓皇族内的夺权之战，终于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建文四年（1402），43 岁的燕王朱棣终于在文武群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御座，以明年为永乐元年。

二、整顿国政 传扬国威

靖难之役告捷，朱棣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即位初，全国上下局势严峻，朱棣审时度势，采取了镇压和怀柔并用的两手政策，以稳定动荡危急的政治局势，巩固皇位。

朱棣将朱允炆时的旧臣陆续捕获后，稍有不屈，就备受杀戮。不是击齿，就是割舌。甚至截断手足，有的被杀死后，还要诛灭三族。

左佥都御史景清，平时倜傥尚大节。朱棣即位后，令他继续旧任。景清也受命不辞。有人见他这般行为，说他偷生怕死，有愧先帝。对此，他毫不介意。两月后的一天，他偷藏匕首上朝，刺杀朱棣未成。朱棣将他剥皮，悬于城门。事发后不仅景清全家诛杀，而且顺藤摸瓜，株连左邻右舍，甚至连他出生的村子也都斩尽杀绝。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清洗，史书称之为“瓜蔓抄”，先后被杀的人达数万之多。

朱棣在严厉镇压建文朝部分反抗的旧臣的同时，对跟随他“靖难”夺位的文武功臣，都给予提拔重用，并给予丰厚的奖赏；对战死的将士，也尽行追封。周、齐、代、岷四王，全予恢复原爵，各令归国。对朱允炆的故吏，只要能够真心归附新朝，朱棣也有选择地量才施用。

郑赐原是建文朝的北平参议，在朱棣手下办事极为卖力。后被朱允炆调升为工部尚书，并曾任督师讨伐过朱棣。因此也被列入奸臣的名册而遭逮捕。朱棣审问他，“你到底为何背叛于我呢？”郑赐回答：“我不过是对皇上竭尽臣职罢了。”朱棣闻言大

喜，遂任命他为刑部尚书。这样一来，原先允炆的故吏就渐渐归附，一心一意帮助朱棣治理大明江山了。

为了尽快改变朱棣即位初滥杀故臣所造成的恐怖紧张局面，在处理了建文旧臣后，他多次叮嘱司法机关各大臣，办理案件一定要依法办事，宁缓勿急。有一次，刑部送上判处死刑的 300 多人名单，请他审批。他看后说：“给这 300 多人所定的罪，恐怕未必个个都确实，你们再仔细的复审一遍，一定不能叫任何一个蒙冤受屈。”刑部按照朱棣的旨令重新复审后，果然发现错案，有 20 多人无罪获得释放。

朱棣是以藩王起兵“靖难”而夺取皇权的，他自然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皇权所造成的威胁。他当了皇帝之后，为掩人耳目，稳定当时的局势，曾一度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蕃。但几个月之后，他就寻找罪名，首先剥夺了代王和岷王的护卫军队。接着他又将齐王废为庶人。永乐十年（1412），辽王的护卫军队被削除；拥有护卫军队最多的宁王，也早于永乐二年（1420）被改封南昌。永乐十八年，周王被指控企图谋反。朱棣召他入京，把揭发他的纸状拿给他看。周王慌忙跪下请罪，并主动献出了自己的护卫兵。

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威胁最大的几位塞王的护卫军全部都被解除了，如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削藩之后，如何加强北方的军事力量，以防外寇入侵？朱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的发祥地，且距北面边防很近且屯集有重兵。天子居中，正所谓可以居重御轻。

永乐四年（1406），朱棣在不惜杀掉反对迁都的某大臣后，下令修建北京宫殿，并重新改造北平旧城。

永乐十八年（1420）工程竣工。就在这一年，朱棣宣布自明年起，以北平为京师，改南京为留都。永乐十九年（1421）春，朱棣正式车驾北迁。

首都北迁后，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这样南京除了没有皇帝外，其他各种官僚机构以及设置和首都北京几乎完全一样。朱棣任命自己的亲信驻守留都，掌管着南京的一切留守、防护事务。

其实，朱棣夺位之初，即打定了要迁都的主意。永乐元年（1403），他钦定了北平为北京，并着手组织力量修浚京杭大运河，以沟通北京与南方各地的联系。永乐九年（1411），朱棣又命令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并沿运河建闸 38 座，以提高水位。至此，京杭大运河开始真正畅通。使南方的粮米和丝帛等物资通过漕运源源输往北京，北方物产也通过运河南下，大大增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为迁都北京准备了条件。

朱棣即位后，在加强皇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在经济上继续推行朱元璋休养生息，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

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淮河以北的广大田地，杂草丛生，荒凉衰败。再加上蝗虫灾害，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滑坡。朱棣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振兴农业经济。首先是迁移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灾民充实这一地区。不久又先后迁移山西、山东、湖广等地少地的农民和无业流民到北京及北方地区屯垦。在“靖难”战争中遭受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还发给耕牛、农具，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同时，朱棣还采取严厉措施，惩处贪官污吏，限制僧道发展，赈济灾民。

由于这些措施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使永乐朝的农业经济比洪武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每年上缴京师的赋粮达数百万石以上。全国府县的仓库里还积存着大量的粮食，陈陈相因，以至红腐不可食。

随着农业的繁荣，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遵化冶铁厂是明永乐时所建的最大的手工业工厂。山场分布在蓟州（今天津蓟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今河北滦县）、迁安等地，占地面积 4500 多亩。厂内有民夫、工匠、军夫达 2500 多人。永乐时代的造船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所修造的航海宝船，最大的长 44 丈，宽 18 丈，可乘载 1000 多人，并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先进航海设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国家。

在长期的实践中，朱棣渐渐体会到：金玉之利是有限的，而书籍之利则是无穷的。所以在他执政期间，特别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文化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

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授命解缙组织编纂《永乐大典》。他要求，“书的内容要务求详备，凡有文字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要收罗进去，毋厌繁浩。”根据朱棣的旨令，解缙于永乐二年（144）十一月，类书初稿编纂好。朱棣审阅后，认为取材不够完备，下令重修。同时加派人员与解缙一起监修。同时降旨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全国宿学老儒及著名学者充任纂修，选派生员充当缮抄员。这样，先后调集了 3000 多人，用了 4 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拥有 22937 卷，约 3 亿 7 千万字的世界当时最大的类书的编纂任务。朱棣审阅后非常满意，赐名《永乐大典》，

并亲自作序命人抄写了两部。可惜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此书大部遭焚毁，剩下的也多被劫走。

在对外关系上，朱棣一面广泛吸引外国使臣来中国贸易，一面派出自己的使团走出国门，出访外国。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就是在朱棣亲自授命下，组织的一项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外交活动。

对这次大规模的外交活动，朱棣做了多方面的周密的准备工作。永乐五年（1407），朱棣下令在翰林院开设“八馆”，训练培养通晓外国语言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同时朱棣还命令福建沿海修造大批海船，仅永乐元年（1403），福建造船厂就建造海船 137 艘，永乐五年（1407）又改造海运船 249 艘。同时，考察选拔了一批忠于职守，才貌出众，能够执行外交政策的人才。

永乐三年（1405），朱棣经过多方考察，终于选定了宫廷内官兼太监郑和为出使西洋各国的外交使节。郑和是明朝初年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回族人。原姓马，后因随燕王朱棣参加靖难之役有功，赐姓郑。明洪武十五年（1382），他 12 岁被明军俘获至军营，因他的祖父和父亲生前都先后到麦加朝拜过克尔白（一块被称为伊斯兰教圣物的黑色陨石）。这样，郑和从小就了解到西洋的一些风土人情。

永乐三年（1405）七月，郑和率领 27800 多人的远航队伍，带着大量的丝织品、瓷器、铁器、布帛和充足的口粮，日用品等，分乘 62 艘宝船，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集合启航。

郑和的船队首航直抵占城（今越南），然后往南到达爪哇、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再往西航行到满刺加（今马来西亚）、

古里（今印度南部）等国。

自此之后，郑和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先后 29 年，7 次下西洋，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每到一个国家，都以明朝使节的身份，向当地的国王或首脑赠送皇帝朱棣的礼品，表示建立邦交，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并邀请他们来中国访问。并同当地官府进行贸易，从各国收购了许多象牙、珍珠、珊瑚、香料等物品，受到当地人们的热情欢迎，人们称大明船队为“宝船”。

郑和遵照朱棣的命令，远航西洋，不仅大大促进了我国和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把我国古代的航海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许多国家的国王、首脑或使臣，纷纷来到中国访问，建立了邦交和贸易关系。中国到东南亚去的侨民，也迅速增加，他们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南洋的开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发展生产 巩固边防

朱棣虽是以非传统方式登上皇帝御座的皇帝，但他确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民族英雄。当他雄心勃勃从朱允炆手中夺过大明御玺的时候，他面临的不仅是前朝旧臣的激烈反抗，而且还要对明朝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作出及时的恰如其分的反应。朱棣即位后，继承父亲朱元璋的未竟之业，以通好和防御两种策略巩固和发展了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为我国满族人民的祖先。

在秦以前，女真叫肃慎，隋唐又叫靺鞨，辽代后始称女真。明朝建立，朱棣继位，于永乐元年（1403），即派邢枢等使臣前往奴儿干地区诏谕。女真各部的首领相继归附，甚至连一些元朝故臣也入京，进贡马匹。对此，朱棣下令，在开原设立马市，同海西、建州两部进行交易。同时，发给女真酋长许可证，每年都可到指定的地点做买卖。对于前来参加马市贸易的女真族首领，朱棣还命当地官员赏以猪羊酒席，以资鼓励。因此，在整个永乐朝，女真族都按时入贡，奉职唯谨。明朝有所征调，每调必赴。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后来，朱棣继父亲在辽阳建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后，又下令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当地先后设置了 370 卫，20 所，任命当地部族酋长担任卫所官员，且代代承袭。建州卫指挥阿哈出还以军功被朱棣赐姓名李思诚，其兄弟子侄也一个个当上了明朝的官。

为了便利运输军需、贡赋物品和传递公文，朱棣下令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扩建、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有 6 条交通干线，开原为 6 条干线的起点。这些干线东至朝鲜，西达今蒙古，东北抵达满泾站，西北通向今满州里以北，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奴儿干都司设置后，宦官亦失哈等人曾多次奉命到此地，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宣谕抚慰。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时，在都司城的西南，黑龙江河口对岸的山上建永宁寺，记述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它记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历史业绩。

尽管朱棣在发展大明同周边各民族关系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真正展示朱棣雄才大略的是他五次远征漠北的战绩。

元顺帝逃往漠北以后，于洪武三年（1370）死于应昌（今内蒙多伦县东北）。春去秋来，几代逝去，蒙古贵族内部逐步分裂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鞑靼部最为强盛。三部之间经常仇杀，但更时常南下侵扰明朝边境。朱棣仍然采取父亲朱元璋“威德兼施”的对蒙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各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另一方面积极防御，从嘉峪关起沿着长城进入辽东至鸭绿江一线，先后建立了9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这九个军事要塞都配有精锐军队，以抵御蒙古贵族的南下侵扰。

永乐七年（1409）四月，朱棣遣都督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带着大量绢币前往蒙古各部招抚。其中，瓦剌接受招抚，朱棣即敕封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不仅拒不归附，还杀了使臣郭骥，发兵进攻明朝边境。

朱棣闻讯即授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统兵十万，北征鞑靼。临行前，朱棣叮嘱邱福，“毋失机，毋轻犯，毋为所殆。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但邱福却有负众望，轻敌妄进，全军覆没于胘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克鲁伦河）。恶讯传到京师，朱棣怒不可及，追夺邱福的封爵，以书谕皇太子监国，决意立即选练兵马，来春亲征。

永乐八年（1410）春，朱棣率师北征，命户部尚书夏元吉留守北京，接运军饷。自领武将文官，督师50万出塞。五月，人马行至胘胸河，本雅失里不敢接战，北逃斡难河。朱棣挥师追杀，

两军遂大战于斡难河畔。朱棣率军冲锋掩杀，大败敌众。本雅失里丢弃辎重牲畜，只带着 7 骑渡河逃走。

朱棣首次北征鞑靼告捷后，又先后于永乐十二年（1414）、永乐二十年（1422）、永乐二十一年（1423），四次亲征漠北。朱棣数次发动对蒙古贵族的征战，一方面有效地防御和打击了其侵扰，但也确实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第三次出征，仅运输粮草一项，就用驴 34 万匹，车 177500 辆，民夫 235000 多人，计运粮 37000 石。户部尚书夏元吉、兵部尚书方宾等廷臣，力谏罢兵，休养兵民，严敕边将守备。但朱棣不听，且把反对北征的朝臣逮捕入狱，有的迫害致死。朱棣在力排众议的情势下，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又发动了第五次亲征阿鲁台的战争。

征伐大军在漫漫荒漠日夜兼程，但放眼百里不见敌人的踪影。以后根据闻报又多次扑空，将士死伤疲惫，劳而无功。朱棣方知边报不实，心里不免怅然。他望着漠漠荒沙，懊恼不已。但终因军粮将尽，不敢久呆，只好下令班师回京。大军行至一处叫清水源的地方，朱棣见路旁有一石崖陡峭数十丈，便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功，刻石纪功后，朱棣突感身体少有不妥，几日之后，病情猛然加重，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下旬，朱棣率师达到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附近）已是气息奄奄，不可救药。他知道自己不能再亲理朝政了，便召英国公张辅入内，嘱咐后命：传位皇太子朱高炽，丧礼一律照父亲朱元璋的遗制办理。言毕，当即与世长辞。

噩耗降临，张辅、杨荣、金幼孜含泪议定，六师在外，不便发丧，严密封锁消息，载着遗体，仍然是翠华宝盖，亲兵侍臣拥护前行。暗中派太监海寿，驰赴京师急报太子。太子朱高炽闻报，

含恻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棺，举丧如仪。葬于长陵。

朱棣卒年 65 岁，在位历 22 年。尊谥“文皇帝”，初庙号“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9）改庙号“成祖”。

仁宗朱高炽

阅读明史，常有“仁宣之治”之说。“仁”就是指仁宗朱高炽。这位曾被后人比作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的皇帝，虽然在位只有 10 个月，却以为人仁厚，爱护臣下，体恤百姓，善于治国而赢得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一、太子之位 几遭濒危

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被朱元璋封为世子，永乐二年（1404）被朱棣立为太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登基。从当太子到做皇帝的 20 年间，朱高炽屡濒危境，太子地位几遭废黜。

“靖难”之初，朱棣率兵北征。身为长子的朱高炽奉命留守北平。他出色地指挥将士奋勇抗击，顶住了李景隆 50 万大军的围攻，不仅为燕王保存住了根据地，更为诱敌深入并收编永宁精兵创造了条件。

朱高炽虽然在保卫北平的战役中立了功，但他有一个很大

的弱点，就是身肥体硕，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要宦官扶持。即使这样还常常失足。因而在以后的战役中很少战功，而朱高炽的胞弟高煦、高遂跟随朱棣南征北战，战功显赫。特别是高煦勇武强悍，能征贯战，深得朱棣宠爱。

随着战局的发展，明王朝的天秤逐渐倾向了朱棣。朱高煦自恃功高，开始觊觎世子的位置。高煦的这种愿望传到了惠帝谋臣方孝孺那里，他当即向惠帝献计，请惠帝亲自写信给朱高炽，让其归依朝庭，并封他为燕王，由此引起燕军内哄。惠帝依计而行，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送信。朱高炽接到信心里一惊，他并没有马上拆封，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也猜得出惠帝致书的目的。他当机立断，立即派人将没有启封的信连同张安一道星夜送往正在前线作战的朱棣。

然而，朱高炽没有料到，宦官黄严的动作更快。黄严是高煦的心腹，素常媚谄于高煦。他得知惠帝送信的事后，先于高炽派人驰报朱棣，声称世子与朝廷私通要谋反。朱棣听到报告后将信将疑，便问高煦。高煦乘机进谗，说高炽早就想篡位当燕王。朱棣勃然大怒，决定下令抓捕太子。正在这时，朱高炽派的人匆匆赶到了。朱棣看了书信心中释然，庆幸刚才的命令没有发出，否则就要错杀了自己的儿子。

一场杀身之祸总算躲过了，然而风波并未静止。建文四年（1402），朱棣终于将惠帝赶下了台，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按常规，在稳固了政权后，应尽快确立太子。但朱棣却犹豫再三，一拖再拖，久未决断。按封建礼法有嫡立嫡，众嫡立长，高炽既嫡且长，为太子名正言顺，但高煦在“靖难”中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多次在乱军下救朱棣于危难之中，加之他的长相特别像朱

棣，这使得朱棣不由不对他有所偏爱。而且在战难时，朱棣就曾有“世子多病，你多努力”的暗示。所以，欲舍高炽不忍，欲立高煦又恐违背祖制，臣民难服。朱棣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境地，大臣们几次建议立储，他均未置可否。

大臣之中也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淇国公邱福、驸马都尉王宁等武将，都主张高煦功高，应当立为太子。唯独兵部尚书金忠认为这样做不妥。他向朱棣历数古代帝王易长另立而引出的祸乱，以图说服朱棣。见效果不大，他又将自己的意见秘密告诉了支持立高炽的翰林学士解缙、黄淮、尹昌隆等。

一天，朱棣就立太子的事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讲了一通“世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没有应声。见状，他撇开高炽不说，夸赞起了高炽的儿子。原来，高炽的长子朱瞻基长得十分英俊，聪明过人，深得朱棣钟爱，从小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并经常称赞他将来一定是个盛世天子。果然解缙一提到他的“好圣孙”，便打动了，不由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分别寻问了黄淮、尹昌隆等，他们的意见与解缙完全一致。他的心便逐渐倾向于世子高炽。

又过了些日子，朱棣命众臣题《虎彪图》。画中有一虎领众彪呈父子相亲的样子。解缙借题写了四言绝句一首：“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读完诗句，朱棣深为所动。终于做出抉择，立即宣布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封高煦为汉王，封国云南。封高燧为赵王，封国彰德。

朱高炽被立为太子，表面看来似乎确立了地位，但更大的风浪也随之而来。

高煦当太子的梦被打破了，心中十分愤然，又被封到云南，

更为不满，他一方面迫害拥戴太子的大臣，解缙不久即被迫害致死；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陷害朱高炽。

经过详细了解，朱棣察觉太子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相反，倒是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引起了他的不满。高煦封到云南时曾以地方远而不肯去，后来改封到了青州，但他仍赖在京中不走。朱棣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就不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而惮行，现又托故留行，都不是理由，也不是你的真实想法。这次你必须到封地去”。高煦假意应承却并不离京，而且趁朱棣北征之机，私选卫士，招募兵士 3000 人，还纵容爪牙到处劫掠，支解无辜百姓投入江中。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他的爪牙，竟被高煦用手铁爪活活锤死。他还私下僭用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乘舆器物。

朱棣终于认清了高煦，在训斥了高煦一顿后，将其囚禁于西华门内，打算废为庶人。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大臣为高煦说情。面对这种情势，受尽了高煦陷害的高炽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找到父亲陈情谏劝，涕泣力救，终于说服了朱棣，为胞弟保住了王位。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朱棣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县），并限令即日成行。

高煦已没有能量与高炽相争，但高炽的另一个弟弟高燧仍在威胁着他。永乐十六年（1418），朱棣有病长期住在北京。追随赵王高燧的宦官大臣造谣谗构太子，一时谣言纷起。有了前两次教训，跟随太子监国的大臣惴惴不安，深怕朱棣不问情由怪罪下来弄得身败名裂。恰巧有一位陈千户霸取民财，高炽先是令其远戍交趾立功，后又考虑到他曾立过军功，便宽恕了他。这件事被党附高燧的宦官黄俨知道后，即秘密报告朱棣说太子私自宽恕了皇上贬谪的罪人。朱棣闻报便下令将陈千户处以死刑，并将

辅助太子监国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侍读梁潜、司谏周冕，以不劝谏阻止太子的行为为罪名逮入狱中处死了。

为了彻底查明情况，朱棣命令礼部尚书胡 濙以出巡江浙诸郡为名前往南京调查，要他多留些日子，仔细观察了解太子是否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很多过失，将情况如实秘密奏报，还特别交待奏书的字要大，如果晚上接到奏书就晚上看。胡 濙到南京后用心访察，不久即为太子行政处事的仁明所折服，又观察了一段时间，便以自己所见所闻的“诚敬孝谨”的七件事密奏朱棣，朱棣阅后大悦，从此不再怀疑太子朱高炽。

高炽的地位虽然在朱棣心里巩固了，但高燧及其追随者仍不甘心。永乐二十一年（1423）五月，朱棣因经常有病不能临朝，内外事务均交太子处理。太子几次裁抑宦侍，使得黄俨心怀不满，到处造谣说皇上现在钟爱的是高燧。与此同时，他秘密勾结一批官员及军官伪造遗诏，图谋用毒药毒死朱棣，用伪诏书诏示天下，立高燧为帝。一切布置停当后，黄俨将秘密告诉了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听后大吃一惊，力劝舅父不要参与这诛灭九族的勾当，黄俨不听劝阻，王瑜急速报知朱棣，朱棣下令逮捕了这些人，搜得了伪造的诏书。朱棣拿着假诏书，怒气冲冲地问高燧：“这是你干的吗？”高燧吓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高炽再次为高燧解脱，说这都是下人们干的，高燧不会参与这个阴谋。从而保住了高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北征还京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风风雨雨 20 年，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

二、仁政治国 善于纳谏

朱高炽能得到众多大臣竭力拥戴，在两个兄弟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仅是政治手腕，而更重要的是靠爱护臣下，关心百姓疾苦，为人仁厚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巩固了地位。

还是在洪武末年，当时朱高炽还是燕王世子。有一次朱元璋让诸王世子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因为早晨天气太冷，朱高炽特意等卫卒们吃完了饭才检阅，所以，等他检阅完毕时，其他世子早已检阅完很久了。一些人以为他肯定会受到训斥。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地夸赞他懂得体恤部下。

体察人民的疾苦，行恤民之政，这是朱高炽从做太子监国到即皇帝位，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做太子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奏免灾区的税粮。永乐七年二月，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发现颖川军民缺食少粮，便按常规奏请发放赈粮，高炽接报后，一面埋怨他们“军民用乏，待哺嗷嗷”，却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地从容启请上报。一面派人火速下令“即发廩赈，不得迟延。”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的宫殿建设很快就要完工，第二年将迁都北京。高炽应朱棣之召前往北京。多少年来，他很少有机会离开南京。这一次，他趁机询访沿途军民，查看百姓生活，寻访政事的得失。

一天，来到山东邹县境内，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手持篮筐在路旁采挖野菜、野草，高炽便停马问百姓挖做何用。百姓告诉他因遇荒年要以此为食，朱高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马来到了农民屋

里，只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家家锅底朝天，不禁感慨万千。当即命令太监分赐宝纱，并亲自召集乡里老人询问疾苦。这时，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一见面，高炽便责怪他身为民牧，人民贫穷到如此地步，竟无动于衷。布政使辩解说凡是受灾的地方，都已经奏请减免今年秋税。高炽愤愤地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一刻也不准延误。”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三斗，高炽嫌太少，命令每人发给六斗。并说：“你别怕犯擅发仓廩的罪，见到皇上，我自会奏报”。

天灾是经常发生的，每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仁宗在位期间，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洪熙元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受灾，百姓饥荒。但地方官不仅不想法救济百姓，反而加紧催逼赋税。这件事被仁宗知道后，他立即命令杨士奇起草诏书，减免上述地方夏税一半，罢免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当按往常的程序，通过主管部门户部和工部去办。仁宗却认为，救民就像拯救落水的人，不能有片刻的迟延，户部和工部如果知道要减免税粮，肯定会因为怕影响国家收入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按常规办，就会误事。他当即命宦官取来笔纸，杨士奇立即草就了诏书，仁宗看后立即命人送出。这时他对杨士奇说，你可以告诉户部和工部了。

有人曾向仁宗建议，对庶民百姓不能过分仁慈。仁宗表示：“体恤民众，我宁肯过于仁厚。作为天下之主，怎可与民较锱铢？”当时，户部尚书郭资刚毅而又非常廉洁，对任何人都从不徇一点私情。对此，仁宗十分赞赏。但郭资生性偏执，不能彻底执行仁宗减免灾荒租税的命令，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有司照旧依

额征纳。因此，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了他的职务。在仁宗在位的短短十个月里，他先后对受灾的大名府、昌邑等 22 个县，或减免赋税，或开仓赈济。

从做太子起，高炽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真正体恤平民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就一定要清除赃吏。因而，一旦发现官吏贪赃害民，他都严厉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让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待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四个月，派遣御史十四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临行，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好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侍讲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像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朕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尚书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五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

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1425）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多为仁宗采纳。后来，在又一次奏陈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有人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还有些人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拔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阿谀之辈的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理，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谁知这样处理还是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因为以后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慢慢悟出这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在下了一番决心后，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这样的大事，

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今后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宦官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便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崩逝于钦安殿，终年 48 岁。仁宗在位只有十个月，洪熙的年号也只有一年。他曾对人说，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别的都不想。决心励精图治，一心创建事业。然而却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不幸。

朱高炽死后葬于献陵，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宣宗朱瞻基

一天夜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授给他一个大圭，并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很是惊奇。没过几天，他的长孙降临人间。满月时朱棣见到婴儿，他欣喜异常，兴奋地说“小子英气溢面，符吾梦矣。”这个婴儿就是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被后人称为英明之君

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一、继父登基 平定藩王

朱瞻基渐渐长大了，果然聪颖过人，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为了使孙子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自己对瞻基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孙子长期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穡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八年（1410），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特意带上瞻基同行，一路上

他让孙子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一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这为以后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二十二年（1424），随着父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亲朱高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定年号为宣德。

像一般的皇帝一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官员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赃枉法而下狱虽可遇赦出狱，但一律要罢官为民。

在用人为政方面，宣宗既重用信任杨溥、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一班富有经验的老臣，又十分注意发现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个月，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防止循私，还规定，凡被举人犯法，举荐人连坐，由于宣宗注重吏治，善用人才，加上仁宗时较好的社会基础，因此这时的明王朝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为“仁宣之治。”但就在这时一件宣宗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汉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乐时，为争夺太子地位，曾屡次谗陷朱高炽，后被朱棣贬至乐安（今山东广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高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然后自己篡位。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高煦派人送

来奏书，提出了利国安民的四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心，要防备他，然而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四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诚，可见叔父旧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议施行。并复信表示感谢。宣德元年（1426），高煦派人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人向宣宗报告说汉府所派之人，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示要至诚款待，不要猜疑。对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一次就给了他 40 峰，要马，又给了他 120 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感化高煦。这年八月，他还是掀起了反叛朝廷图谋皇位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人潜入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攻占济南的内应，计划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当时恰在济南的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口，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但还未到，高煦就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指斥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奸佞之臣。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大臣，挑拨君臣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别无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讨大计。大学士杨荣提议宣宗亲自挂帅出征。他认为，高煦一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高煦一贯好虚张声势，内里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高煦。夏原吉接过话茬，以朱棣举靖难之

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讨而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一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色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宣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军日夜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谨慎行事，武臣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像井中之虎。现在大军压境，他们这些乌合之众，那里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一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高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用火炮射击。将军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而是连着给高煦写了两封信，仍不见回音，他又写了告高煦部下的谕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一些人便欲擒执高煦，以图立功得赏。高煦见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军心不稳，知道大势已去，内心十分沮丧而畏惧。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实在感到已经走投无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密派人到宣宗帐内，乞求宣宗宽假一天，以便让他与妻儿诀别，并保证第二天出城归罪。宣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天夜里，高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文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高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力阻止，表示要决一死战，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受辱。高煦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城太小了，城太小了。”王斌等一离开，他便悄悄换了装束潜出乐安城来见宣宗。宣宗没有答应群臣要求处死高煦的主张，只是把大臣们的这些劾章让高煦看了看，便让他召了几个儿

子一道回北京。

宣宗不战而胜。他惩办了积极跟随高煦反叛的主要谋士和将领，宽赦了大多数的协从者，改乐安州为武定州，留下薛禄和尚书张本镇抚，自己便带大军班师凯旋。

高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废为庶人，生活予以优待，囚禁于西内，名曰逍遥城。宣德四年（1429）宣宗好意前去看望高煦，高煦却出其不意，用脚将宣宗勾倒在地。这一来宣宗恼羞成怒，当即命大力士找来一个三百多斤重的大铜缸，将高煦扣入缸中。高煦自恃勇力，将缸顶起。宣宗又命人用木炭将铜缸埋起来，然后用火将高煦活活烧死了。

汉王既死，封为赵王的高燧在高煦被平定后主动交出护卫兵力，更加小心。至此，朱瞻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了。

二、整顿吏治 体恤民生

朱元璋时吏治十分严明。到永乐末年，官场贪浊之风渐起，到仁宗洪熙年间，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承平日久，官吏贪风日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关朝廷兴衰。因此，他在继续依靠重用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历经洪武、建文、洪熙三朝历经考验，富有治国经验的老臣的同时，十分注意提拔任用正直而又有才干的新人，罢黜无所作为的庸吏，惩治贪官污吏。

宣德三年（1428）六月，宣宗登上皇城远望，忽然发现远远的有一个地方正在大兴土木，规模十分宏壮，便寻问这是什么人在搞什么建筑，然而左右官员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问，

才知道是工部尚书吴中私自动用官厂的木料、石头，让人为他盖私房。宣宗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将吴中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须加强督察力量。杨士奇、杨荣向他推荐了通政史顾佐。顾佐曾任应天尹，为人刚正不挠，公廉有威，时人比作包公。宣宗听了二杨的介绍，当即拍板，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

顾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负宣宗重托。他一到都察院，首先对院内所有御史进行考察，将 20 位不称职的贬谪到辽东为官，另有 8 个被降了职，三人被罢了官。同时举荐了 40 多位清正有为的人担任御史。朝纲为之一振，宣宗对顾佐大刀阔斧的行动也极为赞赏。

任用了顾佐之后，宣宗又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为南京都御史。邵玘一丝不苟，奏请宣宗罢免了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至此，北有顾佐，南有邵玘，南北呼应，贪吏金息，纪纲肃然。

对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罚，对碌碌无为、无才无识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地罢免、降职。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原是宣宗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情谊颇深，然而宣宗执政后渐渐发现他们二人才疏学浅，在他们的职位上无所创建，待他的这一看法从杨士奇等人那里也得到了验证之后，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曾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偏袒，而是将他们调离内阁。陈山被派去教授小太监，张瑛则贬到南京做礼部尚书。

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蹇义、夏原吉及“三杨”等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象后世传名的况钟就是宣德五年（1430）由蹇义等人推荐任苏州知府的。当时，苏州的赋役负担

在全国是最重的。贪官污吏便趁此机会营私舞弊。况钟到任后，第一次升堂办公，面对群吏拿来的一大堆公文，他假装什么也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吏目说的处理。群吏大喜过望，以为又碰上了一个糊涂知府。三天之后，况钟召来群吏，把三天前办的事重新搬了出来，告诉群吏那件事应该办而他们却阻止，那件事本不该办而他们却硬逼着他办。并历数他们的种种舞弊勾当。当场捶杀了几个为首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然而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又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象况钟这样的官员，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宣宗经常向朝臣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终臻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玄宗做了比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大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而唐玄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乱，他经常把随炆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国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

东郊，见路旁地里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地里，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人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一篇《耕夫记》，激励自己与大臣。宣德七年，宣宗又作《织妇词》一篇，并叫人画成图挂于宫中。为此，他对朝臣们说，并不是因为他好为词章，借以炫耀，而是因为农桑实是衣食之本。所以才作成诗歌，经常使人传诵，不致忘记，而作画张挂，也是为了让众妃嫔知道百姓的艰辛。

宣宗要求朝中带头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乐和充实国库的作法。他认为，君王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在他刚刚即位时，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道“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彩被传为美谈，均称其恭俭爱民。朕也要以俭约为臣下做出表率。”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斥了一顿。他说：“人都想多活几年。古时候的君王象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治国的时最久，但那时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验？世人不悟，实在可叹。”宣宗不仅要求自己比较俭约，而且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等，也极力反对奢侈之风。在为他的父亲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厉行节约，亲自规划，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陵墓。献陵在规模和耗资方面都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皇帝的陵墓做了个好的样子。只是到了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

奢侈、华丽起来。

为了实行节俭，宣德三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建议裁撤内外冗官，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并责成蹇义具体负责这件事。宣示还严禁官员扰害百姓。每逢出发，他都反复告诫将士，：“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东莞采珠，宣宗认定他是“扰民以求利”，将他罢官下狱。工部尚书吴中认为山西果圆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要征调力役修复旧塔，宣宗说：“你想修塔求福，我却以安民为福。”驳回了他的请求。

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是宣宗经常对受灾地区人民采取的救助办法。河南的一个知县没有经过请示，就发放了一千余石驿粮给灾民，私自动用皇粮是要犯大罪的。然而宣宗知道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赞扬这个知县机敏，是个能够胜任的县官。那时，经常发生天灾，百姓为了逃避灾荒，四处流移。许多地方官府害怕流民变乱，经常派兵拘捕。对此，宣宗多次下令制止这样做。他一再强调，饥民流亡是迫于无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一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而这些地方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行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土地都是国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间的百姓比较安定。

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朱瞻基突然一病不起。宣德十年（1435）正月，这位常被后世称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宫，时年 38 岁。六月，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被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书又称宣德帝。

英宗朱祁镇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了，大臣们一面料理着他的后事，一面期待着新君临位。几天后，九岁的太子登基，他就是大明朝又一位新皇帝——英宗朱祁镇。

一、宠信宦官 土木惊变

朱祁镇虽然做了皇帝，但仍是一个玩童。宣宗也知道，9岁的儿子即便登上皇位，也没有能力行使皇权、管理国家，因而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命令大臣，凡是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必须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张氏。这时，有人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了她的拒绝。但实际上，凡是朝廷大事，都要先告知张氏，再送往内阁议决实行。由于张氏的把持，再加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仁、宣时期富有经验的老臣主持着政务，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朝政在以往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宦官王振却在悄悄地窃取权

力，干预朝政，并终于酿成大祸，导致英宗为北方的瓦剌所俘。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他非常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朱祁镇的欢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朱祁镇登上了皇位，便把王振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 24 个宦官衙门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和各种杂役，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成诏谕颁发。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部门，便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一直到宣宗，对宦官的管束都十分严厉，这一点王振十分清楚。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讨好英宗，一面故作姿态，骗取阁臣的好感。王振每次到内阁传旨，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拼命拉帮结派。朱祁镇当皇帝不久，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隆庆右卫指挥佾事纪广与王振交往甚密，王振竟骗过所有大臣，谎报纪广为骑射第一，并越级提拔他为都督佾事。

渐渐地，王振便有所放肆了。太皇太后常派他到内阁问事。有几次杨士奇尚未决断，王振便自作主张，杨士奇甚为恼怒，一连三日不上朝。太皇太后张氏知道后，立即召人到便殿，指着五个大臣对英宗说：“他们都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忠臣，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必须与他们商议，如非五人赞成，便不可实行。”她又命人传来了王振，历数了他的种种不规行为，下令赐死。话还没落音，几个女官的刀已经搁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立刻面如土灰，浑身发颤。英宗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他又惊、又怕、又怜，赶忙跪下为王振求情。五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

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去。太后经众人求情才缓和了脸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决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国，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都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事，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在这之前，杨荣也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儿子杀人，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溥，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牌，总觉得后背冷嗖嗖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打着英宗的旗号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张太后死后英宗也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在王振的怂恿下只管游玩享乐，那里还管什么铁牌、什么祖宗训戒，朝事全交给了王振。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僉事。凡是触犯他的，稍不如意，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璟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

他。有的甚至蓄了须又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 30 多岁。

朝官的谄媚，王振的专横，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珍宝等物品，作为对他的奖励，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为王振唱了一曲赞歌。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瓦剌部的脱欢及其儿子也先逐渐强盛起来，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去，也先嗣位，执掌了瓦剌的实权。也先上台后，开始扩张势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到正统九年（1444）设置了甘肃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与此同时，他又向东发展，攻击兀良哈三卫。面对这一系列的扩张、侵扰，朱祁镇和王振不但不谴责、反击，就是遇到求救也从不派兵。渐渐地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对此，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向英宗上疏，提醒他警惕瓦剌的崛起。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 10 件应该改革的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防范瓦剌。然而，王振看后，认为这是对他的谴责，竟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杀害在狱中。从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进贡。也许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瓦剌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一般都在 2000 人左右，但常常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以庇

护。

正统十四年（1449）这一年也先再次向明朝进贡马匹，像往常一样实派贡使 2000 却谎称 3000。不知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来潮，一面让礼部按实有贡使人数给予赏赐，一面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了五分之四。贡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又失信为借口，于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

由于多年战备荒废，塞外明军不堪一击，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次。英宗顿时慌了手脚，他先是匆忙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率兵万人前去迎敌。但很快全军覆灭。英宗不得不又找来王振和群臣商量对策。

贪鄙的王振为了讨功邀宠，动起了劝驾亲征的念头，极力劝说英宗亲率兵马抗击也先。英宗仍像过去一样，只要王振说了话，他就谁的话也不再听信了。他当即传下命令，让太监金英辅佐成王朱祁钰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扈驾随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却视若儿戏，仅通过两三天筹备，就于七月十六日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踏上了艰难的征程。随征的文武大臣只不过是英宗壮威的摆设，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专断。

也先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诱使明军深入。

英宗率领大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初一，英宗率领部队进入大同。他还想继续北进，追击

也先。这时，王振的同党，曾藏在草丛里捡了一条命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惶恐，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这样就可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从不放过耀武扬威的机会的王振，更想借机邀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以光宗耀祖。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想到，如此众多的兵马经过蔚州一定会将家乡田里的庄稼踏坏，因而遭到乡人的唾骂。这时大军已走了40多里，王振却让英宗下令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建议英宗仍按原定路线走，这样可确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没有采纳。

也先闻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追袭。明军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撤退，但由于改变行军路线耽误了时间，很快就被瓦剌骑兵追上。明军殿后部队虽一再力战，但难以抗敌，很快便溃散。

十三日，英宗在明军且战且退的护卫下来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赶紧进城里驻守。王振却因为自己的千余部辎重车辆未到而让英宗在土木堡扎营等候。兵部尚书邝野一再上奏要英宗立即疾驰入居庸关，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王振却将奏章截留不报。眼见形势十分危急，邝野直接闯进行殿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王振大声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敢胡说就砍掉你的脑袋！”喝令士兵把邝野架了出去。英宗无动于衷，听凭王振施威。就这样，英宗坐失了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天，土木堡就被赶上的瓦剌大军重重包围了。

土木堡地势高，无水源，士兵下挖二丈多仍见不到一点水。一连两天人马没有喝上水，士兵一个个饥渴难耐。十五日，也先

设计，先是假意派人讲和，并指挥军队诈退。在这种情况下，讲和是英宗求之不得的，他立即派通事二人随瓦刺使者去也先营中议和。王振见瓦刺退兵信以为真，立即下令移营取水。干渴极了的明军一听移营命令蜂拥而奔，马上乱了队形，这时已预有准备的瓦刺骑兵像是从天而降，从四面八方冲来。早已疲困不堪而又完全放松了警惕的明军立即溃不成军，争相逃窜。

英宗亲带亲兵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眼看突围无望，索性下马面南盘膝而坐。一个瓦刺士兵抓住了他要剥他的衣甲，但看到朱祁镇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搡着他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利王。堂堂的明朝皇帝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做了俘虏。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集中到了王振身上，他猛喊一声，“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猛击王振，王振一声惨叫摔死到马下。

这一仗，随英宗出征的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多位高级官员全部战死。英宗所率五十万军队，几乎是明朝的全部精锐，也差不多全部被葬送。

这次事变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它成为明王朝的转折点。

二、被俘受辱 南归复辟

英宗朱祁镇被俘后，瓦刺士兵开始只是看他的穿戴非同一般，并没有想到抓到了明朝的皇帝。英宗先是被送到了赛利王的营地。赛利王盘问他是什么人，他却反问对方是也先，还是伯颜

帖木儿·赛利王。赛利王听他说话的口气很大，非常吃惊，便立即告诉也先说，“我的部下俘获了一人非常奇异，莫非是大明的天子？”也先听后马上让还留在瓦刺营中的明朝议和使者前去辨认，果然是朱祁镇。也先欣喜若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抓到明朝的皇帝，于是认为谋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时机到了。他把英宗关押起来，准备用他向明朝政府要挟。

英宗被俘曾使明朝上下一度出现混乱，但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于谦等人的坚持下，顶住了朝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张，紧张而有序地建起了新的运行机制。他们先立了英宗年仅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让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不久清除了王振的死党，加强了北京的保卫，迅速做好迎击瓦刺的准备。接着，为了抵销英宗在瓦刺手中的作用，文武百官又联名上书太皇太后，请立成王为皇帝。九月六日，朱祁钰登基做了皇帝，并改年号为景泰。为了照顾英宗的面子，遥尊他为太上皇。

这一招果然使也先有所失望，但他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土木之变后的三个月，瓦刺经过充分准备，挟持英宗，以送英宗回京为名，大军直逼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刺军队列阵西直门外，朱祁镇则被放在了德胜门外的一座空房内。

与此同时，明军在于谦的率领下，英勇出击，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迫使也先于十五日拔营北遁。英宗也被裹挟而去，他不得不继续留在瓦刺，过着俘虏的生活。

也先本想在抓获英宗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霸取中原的目的。现在看到明朝已立新君，手上的朱祁镇这张王牌已失去了价值。这时瓦刺内部也产生矛盾，可汗脱脱不花私下派使者向明朝献马议和。同时连年的征战也使瓦刺的人民死伤惨重不得

安生，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先提出与明朝讲和。

朱祁镇的弟弟、已经做了景帝的朱祁钰已不愿放弃皇位，因而内心很不愿哥哥回来。朝议时，于谦劝景帝说天位已定，派使者前往瓦剌迎回上皇，有利于消除边患。景帝听到皇位不会再改动，才放了心。随决定升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任副使，率领随行人员于七月一日出发前去瓦剌议和。

朱祁镇见到明朝使者，迫不及待地，你们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和内外大臣，赶快派人来迎。并表示回去后愿看守祖宗陵寝，或者就做一名普通百姓。

李实回到北京后，也先又两次派使者到北京，双方经过反复谈判，在明王朝在经济上做出许多让步后，也先终于决定放归英宗，十五日，朱祁镇到达北京，景帝与百官集结在东安门迎接，二人相见后执手相泣，寒暄了一番后英宗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由做也先的俘虏，变为被弟弟幽禁的“囚徒”。

被软禁起来的朱祁镇，在南宫一住就是将近8年，这期间，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景帝的儿子所取代，看着弟弟的皇位日益巩固，他只有哀叹的份儿。心想这一生只能这样渡过了。但谁曾想，天遂人愿，一夜之间，他忽然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原来，景帝在景泰三年废除了原来的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只过了一年多，朱见济却夭折了。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不愿传位给祁镇的儿子。因而对立太子一事一直不露声色。这时他才20多岁，或许是想以后自己还会有儿子。不料到了景帝八年（1457）正月，他却病倒了。当时，

一年一度的极为隆重的大典郊祀的日期即将临近，他支撑着病体来到南郊斋宫，把武清侯石亨召到榻前，要他代行郊祀礼。

心怀二心的石亨看出景帝已经病入膏肓，毫无康复的希望。从斋宫一出来，即找到同党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和太监曹吉祥密谋，请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以便得功邀赏。主意一定，他们又跑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商议，许彬认为办成这件事有盖世之功。但他又称自己年纪太大，无能为力，让他们找常有奇策的徐有贞商量。十四日晚上，石亨等人聚集在徐有贞家里，商量如何行动。约定十六日夜举事，石亨等在前一天将计划秘报了朱祁镇，得到朱祁镇的默许，于是便分头准备起事。

这时，恰好边吏报警，徐有贞便决计以加强戒备以防不测为名，调一部分军队进入大内，然后直扑囚禁英宗的南宫。军队冲到南宫后，由于门紧锁着，很牢固，徐有贞命令军士抬来巨木，几十个人一起用力抬木撞门，但仍不奏效，他又命令一些士兵爬墙进去，内外合力毁墙，终于很快墙坏门开，他们冲进了南宫。

朱祁镇自从得到了秘报，他不知是福是祸，他期待着幸运之神的降临，在忐忑不安中焦急地等待着。听到撞门声，他立即在灯烛之下单独出见。徐有贞等人冲入后，见到英宗立即跪伏在地上，齐声请他复出登位。朱祁镇用力压抑住心头的惊喜与慌乱答应了他们。

军士拥着英宗来到了东华门，守门的卫士喝令他们停止前进，朱祁镇大声喊道：“我是太上皇。”门卫见状，不敢阻拦。众人一直来到皇帝听朝的地方奉天殿。当朱祁镇重新坐在了告别八九年之久的座位上，他激动得近乎于木然。徐有贞等见大事已成，率众军士立即高呼万岁。

十六日，景帝曾通知群臣第二天上早期，十七日清晨，大臣们一大早就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之中传来山呼万岁声，正在惊疑之时，又听钟鼓齐鸣，接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宣布上皇帝已复位，催促大家赶快去朝贺。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官员们一时反应不及，十分惶恐，又见大殿上果真坐的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朱祁镇又摆出了皇帝的威严，宣谕复位，并狡称卿等因为景帝有疾，迎朕复位，望仍各司其职。一场宫廷政变出乎意料地平平静静地成功了。这件事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三、宠信奸臣 被迫平叛

英宗复辟后，废景帝仍为成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往西宫，没过几天就病死了（也有说是被害死的），年仅30岁。他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他的妃嫔也被赐死殉葬。与此同时，英宗将在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治理国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少保于谦等一大批官员逮捕入狱。

为了借机报仇，徐有贞与石亨等几个串通一气，唆使同党弹劾于谦、王文阴谋迎立英宗的叔父的儿子为皇帝。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进京须用金牌信符，派人须用马牌，只要查一下内府、兵部就可以真相大白。于谦在一旁冷笑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辩白又有什么用处？果然，经过查对，金牌、信符全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然没有明显迹象，但用意是有的。这时主审的都御史萧维桢阿附徐、石，竟以“意欲”二字成罪，判于谦等人谋逆罪，处死刑。

开始，英宗十分宠用徐有贞，认为他很有才能。徐有贞便趁机排挤异己，意欲独揽大权。他看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英宗对此亦流露出厌恶的神情，便有意与曹、石二人拉开距离。英宗因而对他更为信任，经常屏退左右，与徐有贞一起秘密议事。

在这之前，曹吉祥与石亨在权力争夺中也有矛盾和斗争，但当他们感到受到威胁时，两人又联合起来，秘谋对付徐有贞。一次，英宗又与徐有贞议事，曹吉祥让一个小太监悄悄在外窃听。过了不久，曹吉祥在和英宗谈话时，故意将偷听到的内容泄露出来。朱祁镇大吃一惊，连忙问他是从那里听说的，曹吉祥谎说是徐有贞告诉他的。这使英宗对徐有贞产生了怀疑。就这样，在曹吉祥的不断离间下，朱祁镇渐渐疏远了徐有贞。之后不久，曹吉祥、石亨又唆使言官弹劾徐有贞“图擅威权，排斥勋旧”。于是，徐有贞被关进了诏狱，并被谪戍边，直到天顺四年（1460）才被释放回原籍苏州。

天顺元年十二月，英宗重新审议奖励在“夺门之变”中的有功人员。由于这时的政局已基本上被曹吉祥、石亨所操纵，结果，曹吉祥的养子被加封为昭武伯，他的三个侄子被任命为都督，他门下豢养的士卒因夺门冒功得官的竟多达千人。石亨也不甘落后，他以迎复功最高自居，不仅本人进爵，而且他的侄儿石彪也封为定远侯，他的弟弟、侄子家人冒功而授指挥、千户、百户的50多人，他的部属、亲朋故旧冒名夺门而得官的达4000多人。

由于英宗的宠信放纵，石亨借机培植党羽，扩充实力。他摸透了英宗的心理，常常带几个爪牙到英宗跟前对他说，这

几个人是我的心腹，迎复陛下时他们出了很多力。昏庸的英宗只要一听说为他复位出过力，就立即按石亨的要求授予官职。到后来，石亨、石彪叔侄两家养有官员、猛士数万人，将帅中有一半出自他们的门下。

随着权势的扩大，石亨更加胡作非为，横行朝中，他大肆排斥异己，将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他还屡兴大狱，构陷纠劾他不法行为的言官。使得朝中官员大都十分畏惧他的权势。

直到这时，朱祁镇对石亨才有所认识。起因是石亨在皇城中建造了豪华府第 300 余间。一次，朱祁镇在官员的陪同下登上翔凤楼，他遥指石亨的府第明知故问身边的官员说：“这是谁家的住宅如此宏丽。”官员们没有一个敢如实相告，大都推说不知，个别的则含混其辞，说那一定是座王府。英宗一笑说“不是这样”，官员们假装惊诧地问“不是王府，谁敢盖这么宏伟的房子”。英宗恍有所悟地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都是害怕石亨，不敢说他”。从此英宗对石亨叔侄内外拥有重兵的疑虑越来越重。为了削弱他们的兵权，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石彪入京。石彪不肯从命，暗地里指使千户杨斌等 50 余人到京师奏保，乞令石彪留在大同镇守。这更引起了英宗的怀疑，他命人将杨斌等人收入狱中严刑拷问，杨斌供出了是受石彪的指使。英宗立即严令石彪疾驰入京。石彪一到北京立即被关进了锦衣卫狱。

石亨措手不及，只好上章待罪，请求尽削弟侄官爵，放归田里。英宗没有准许。很快石彪的供词牵涉到了石亨，在朝的一些大臣也上章弹劾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图谋不轨等罪行。说石亨不可轻宥。于是，石亨也被关进了诏狱。第

二年二月，石亨在狱中死去，紧接着石彪等人也被处死。

石亨叔侄的下场使曹吉祥等惊恐不已。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与石亨等人是紧密相连的，石亨的结局也许就是他们明天的命运。他们认为如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发动军事政变。

英宗得悉曹吉祥等人的不法行为后，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派锦衣卫指挥暗中进行监视。曹慌了手脚。天顺五年（1461）七月，恰巧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告警，英宗下令怀宁侯孙镗统领京军西征，部队正整装待发。曹吉祥等秘密商定在七月初二由其侄曹钦率人袭杀孙镗，夺取兵权，曹吉祥则在宫中率领所属禁卫军为内应。计议已定，曹钦设宴招待他的党徒等待起事。夜交二鼓，酒吃到一半，叛乱军官之一的都指挥马亮怕万一事情不能成功而遭杀身之祸，悄悄溜出来，到皇宫朝房告发，恰好孙镗和另两个军官住在里面，他们急忙草成奏疏从长安门缝隙中投了进去。英宗接到这份报告，便下令火速逮捕了曹吉祥，并严令坚闭皇城各门及京城九门。

曹钦发现马亮去而不归，察觉到走漏了消息，慌忙率领他的几个死党和几百士卒直扑长安门，但一到宫门看已紧闭，便冲到朝房砍杀了几个官员，并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这时孙镗已集合起征西部队攻击曹钦，曹钦不敢恋战，想外逃出城，但各城门已依照英宗命令关闭，没有办法他只好奔回家中，孙镗的部队很快冲进来，曹钦走投无路，投井自杀了。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英宗宠信曹、石，酿成了曹石之乱。在这之后，他虽然

也想任用贤臣重治国家，然而，这时的国力已遭到极大削弱，英宗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多病。天顺八年正月，（1464）年仅 38 岁的朱祁镇死去。临终前，他命太监草书遗诏，废除了自成祖、仁宗、宣宗以来的宫妃殉葬制度。最后总算办了件明白事。朱祁镇死后被葬于裕陵，庙号为“英宗”。

代宗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初六，秋高气爽，成王朱祁钰在群臣拥戴下，登上帝位。尊被也先俘虏的明英宗为太上皇，定年号景泰。

朱祁钰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是和土木之变中明英宗的被俘有关的。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文武百官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代英宗主朝的成王朱祁钰应该说，对“土木之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只是他没料想哥哥英宗被俘。宣德十年（1435）朱祁镇继父位称英宗时，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祁钰13岁，也被封为成王，之后，二人来往甚少。英宗继位后，便一味追求玩乐，极少过问国事。宦官王振独揽朝中大权，专断骄横。对此，祁钰十分反感。当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准备亲统50万大军，以解大同及边关之围时，许多大臣均认为朝廷没有充分准备，劝英宗不宜亲征，祁钰也劝英宗待探明敌人虚实，做好准备后再亲自统兵支援不迟。但英宗的耳朵里只听得进奸宦王振的话，对祁钰和群臣的进谏一概不听，结果落得兵败被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为了安定人心，太后下诏，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但是，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刻，怎能让一个年仅2岁的小孩登基当皇帝呢？因此，张太后根据群臣的建议，又命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祁钰下定决心坚守北京，并针对守卫京师的兵士多为老弱病残及人心震恐的情况，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各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经过于谦的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了。于谦所为深得祁钰的称赞。不久，祁钰便把他提升为兵部尚书。

外患既防，内祸未除。一天，祁钰上朝，文武大臣数百人联名呈上一份弹劾王振的奏章，上写道：“王振危害了国家，请求成王对王振抄家灭族，以平民愤。如果成王不答应众臣的请求，臣等死也不肯退朝”。奏章读罢群臣放声大哭。群臣所奏正合朱祁钰之意，因此他马上以监国的名义传旨，将王振的田地家产全部没收，抄家灭族。

铲除了王振的党羽之后，祁钰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京城的人心也基本稳定。但也先仍以英宗相要挟，不断袭扰边境，企图迫使明朝赔款割地。群臣认为，虽然京师已稍稍太平，但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心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太后，建议让祁钰早登大位。太后见英宗回归无望，便传旨：皇太子幼小，成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起初，祁钰对群臣的奏章劝进再三推辞，后来见太后已下旨，便遵从了母命。

尽管祁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对如何巩固政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但他比起其父宣宗、其兄英宗来，可称得上是因忧

国而思治国的君主了。面对严峻的现实，他抛弃了议和求生存的念头，几乎采纳了于谦提出的所有建议。十月，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祁钰任命于谦为统帅，同时飞马报知各省巡抚火速派兵援京。由于祁钰的周密安排，于谦等将领的出色指挥，身先士卒，将士人人效命，连京城的百姓也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投击敌人。两军相持 5 天，瓦剌军连战皆败，仓惶撤围西去。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战也为景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无隙可乘，而祁钰又识破了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逼得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景泰元年（1450）八月，也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兄弟二人在殿堂相见时，无不泪湿衣襟。一年的颠簸生活，使英宗显得苍老了许多。英宗见弟弟祁钰既已正式登基且治国有方，自己一年来身体虚弱，做个太上皇就行了。之后英宗便出居南宫了。

经过整编的团营在保卫京城、守护边疆中发挥了作用。但此时明朝江山已远不如明朝初期那样稳固了。祁钰深知，要想稳定住并治理好这个国家，必须以儒家正统观念为指导，实行开明政治，广开言路，招贤纳士，以仁政治国。由于连年战事，瓦剌骚扰，加之黄河逢汛必决，因此，全国灾区广泛，饥民几乎遍布黄河流域。针对这些情况，祁钰对各灾区采取了宽恤政策，对受灾较重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都给予了不同程度减免赋税，并发粮赈济饥民。黄河孕育了华夏民族，可她也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灾难。自英宗当政时，黄河就时时泛滥，虽经几番治理，但终因治理措施不当而以失败告终。景泰四年（1453）十月，祁钰召

徐有贞进京，命其担任右佥都御史负责治理黄河。徐有贞总结了以前治黄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在河水平缓时，先在上流疏浚河道，然后在中下游挖河道，固筑堤堰，并修成广济渠。景泰七年（1456）四月，徐有贞治黄获得了成功。

经过两年的整治，国家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经过一番计谋，景泰三年（1452）朱祁钰终于废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至此祁钰总算是松了口气。

但谁知就在当年，立为太子的朱见济得病死去。太子是朱祁钰唯一的儿子，这对景帝是一巨大打击。到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终于一病不起，土木之变之后出现的稳定朝局急转直下。

大臣们开始在底下私议立储之事，这其中又以武清侯石亨，大臣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等活动得最积极。石亨此人贪欲很重，虽经于谦举荐被晋封为侯，但经常因贪心外露被于谦所斥责，受到祁钰的冷遇，因此，对祁钰和于谦心怀不满。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虽因各有功劳而被祁钰所称赞，但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所以，内心也甚为不满。石亨和曹吉祥都是武夫及奸宦，鼠目寸光，都主张重立见深为太子。倒是徐有贞极有心机，他认为再立见深为太子，不如趁祁钰正在病中，利用他和英宗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迎请太上皇英宗复位。这样，事成之后论起迎复之功，自然人人都可以加官晋禄。徐有贞的主意得到了石亨、曹吉祥等人的赞同。

正月十六日深夜，按计划，一队士兵在徐、石带领下冲入英宗住所南宫之后，簇拥英宗直奔奉天殿。

奉天殿里文武百官正在等候早朝，相互之间一边打听祁钰的病情，一边等着祁钰视朝。忽然，徐有贞、石亨带兵赶到，

将英宗扶上王位。徐有贞对众臣大呼：“上皇复辟了”。由于事出仓猝，众臣一下给惊呆了，摸不着头脑，不知所然，十分惶恐，抬头一看，果真是太上皇英宗端坐在宝座上，只得列班朝贺。这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历史上称之为“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废祁钰仍为成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随即，祁钰在位时所重用的大臣于谦、王文、学士陈循、商辂，尚书俞悦、江渊等都被逮捕入狱。其中于谦被徐有贞妒恨而被英宗杀害。对石亨、徐有贞等，英宗以迎复功高，大受宠任。明朝振兴的希望至此破灭了。

几天以后，祁钰在西宫也死了。祁钰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北京的西山，当时没有庙谥号，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直到公元1475年才被恢复帝号，被谥为“景帝”，庙号“代宗”。

宪宗朱见深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土木之变”发生后，明太皇太后张氏下令，让英宗的异母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这一年，朱见深只有两岁。

一、两当太子 初理国政

景泰元年（1450），受尽屈辱的英宗大难不死，被也先送回北京，这时朱祁钰已经在朝臣们的拥戴之下，做了快一年的皇帝，年号也改作景泰。朱祁钰珍惜到手的权力，不肯拱手让出，把英宗送入南宫加以幽禁，因此朱见深在东宫居住的时间没能太久，景泰三年，他的太子之位被废掉改封为沂王，朱祁钰封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朱见深小小的年纪，每日只会玩乐游戏，对当不当太子，也就视同儿戏一般。他虽然不是太子了，但还蒙伯父开恩，不加以伤害，得到了沂王的封号，照旧过着优裕的生活，衣食无忧。在后宫里，他最亲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周贵妃，另一个

是因反对废掉朱见深太子地位而被朱祁钰废掉的皇后汪氏。汪后与周贵妃脾气相投，关系一直很好。汪氏对朱见深十分喜爱，经常不避人前地与周贵妃往来走动，由此遭到了朱祁钰的斥贬。因此，朱见深对她十分尊敬。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里，发生了富有戏剧色彩的“夺门之变”。朱祁镇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随着父亲的复辟，朱见深也有了出头之日，很快恢复了太子的地位。英宗复辟后，朱祁钰很快就病死了，报复心极强的英宗下令他的嫔妃全部为其殉葬，其太监拟出的名单上也包括汪氏。朱见深听说后，马上找到父亲，重新提起了汪氏当初遭贬的事因，英宗遂与宽宥。朱见深还请求父亲，允许汪氏出宫安居旧邸，并将私蓄一并带去。这以后，朱见深时常陪母亲去看顾汪氏，并邀请汪氏进宫叙谈家常，感情一如当初。

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六日，18岁的朱见深即位，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1465）。在治理朝政方面，他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为了保持安定，朱见深继续任用了一大批父亲信任过的老臣，尤其将李贤视为得力的辅臣，基本做到了言听计从，并且又陆续在内阁中添进了许多忠直之士，使朝事稍有起色。

朱见深知道，新君临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能否割舍私爱。他把这利刀首先挥向了典玺太监王纶。王纶是朱见深做太子时最喜爱的一个内官，朱见深即位之前，朝官中有人预料王纶日后必有大用，就极尽巴结，王纶也直言不讳，在朝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朱见深即位后，依照李贤的建议，立即将王纶逮捕下狱，发配到南京服苦役。前兵部尚书于谦曾在土木之败后力撑危局，挫败了

兵临京城之下的瓦剌大军，后被人陷害，被英宗砍了脑袋。朱见深还是太子的时候，就闻知这是冤案，为了平息朝野的怨怒，他不为父讳，下令为于谦平反。他继位后做的这几件事尚得人心。

朱见深继位时的阁臣，开初时有三位，按级别排列分别为李贤、陈文、彭时。尤其是李贤颇有宰相风度，身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方面，进贤而退不肖。在朱见深的支持下，李贤经手提拔了一批忠于朝廷的官吏，同时革斥了4000多名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投机者。陈文、彭时也是尽心辅佐。朱见深对此深怀感激之心，特赐给厚禄，以示嘉许。成化元年（1465），南方大旱，湖广、河南、陕西、四川交界处的荆襄地区，流民不堪赋税徭役之苦，造起反来。朱见深接到奏报，令湖广总督李震为总兵官，由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率军征讨。官军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打了一年，流民溃散，朱见深如愿以偿地听到了胜利的消息。做为登极之初的新君，朱见深对荆襄战事比较看重，他钦点军事将领，批阅拜表奏章，派心腹太监去前线监军，颇费心机。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兴，广西境内大藤峡的瑶民起事。内阁大臣火速急议，李贤主张征讨，朱见深对此表示同意。圣旨传出后，右佥都御史韩雍点起16万军马，向广西杀去。大战于十二月初开始，大藤峡一带，丛山盘曲，岩洞极多，韩雍分进合击，瑶民殊死抵抗，双方死伤惨重。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瑶民战败，大藤峡一带遂告陷落。事后，韩雍令士兵把大峡中的青藤砍断，把大藤峡改名“断藤峡”，并磨崖勒石，立了纪功碑。捷报驰抵京师时，正值大雪初降，朱见深踏雪赏玩归来，兴致未消，又添喜悦，格外兴奋。他传旨嘉奖、提拔韩雍，让其担任右副都御史，提督广西军务。

以后朱见深又镇压了荆襄山区人民起义，派兵击退了北方蒙古连续对西北河套地区的进攻。朝野因此对朱见深大为赞许。

二、宠信万妃 重用汪直

在朱见深重当太子第四年的时候，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叫万贞儿的女人。万贞儿是孙太子宫中的使女，因其父亲犯罪，她在四岁时被没入宫中，长大后颇有几分姿色。孙太后爱她伶俐勤快，召入仁寿宫，让她掌管衣服、首饰。朱见深常去孙太后那里，万贞儿与他逐渐地熟悉起来，继而发展到亲昵。孙太后崩逝之后，朱见深向母亲请求，让这个年长自己 17 岁的万贞儿入事东宫，服侍自己，结果如愿以偿，两人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朱见深登基后，照例要册立皇后。正宫皇太后钱氏和皇太后周氏选中了吴氏，于是朱见深遂于天顺八年七月成婚。成婚之后，还要选妃。朱见深没有忘记万贞儿，向母亲提及此人，太后同意封为贵妃。万贞儿出于对吴后的嫉妒，对其语言多有不恭。吴后的忍耐极有限度，两人闹到语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吴后于是令宫女执杖大打出手。朱见深知道后，次日就入禀两太后，说吴氏脾气太坏，举止轻佻，定要废易。太后们开初不同意，阁臣也力劝他放弃此念，他坚决不听。于是，吴后被缴还宝册，贬入冷宫，另选了王妃做皇后。这时，吴后正位正宫，只不过 32 天。吴后被废掉后，万贵妃更加有恃无恐，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朱见深对万贵妃的宠爱，使宫中的太监有了立身的行为标准，他们纷纷投靠在万贵妃门下，挖空心思地为她进献美珠珍宝，并且假托圣上的旨意，到民间搜刮采办，苛

扰百姓。作为回报，万贵妃对这些太监有求必应，使他们得以青云直上，有机会干预朝政，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一些在各省的“镇守中官”，也都因朝中有人，颐指气使，位居总督和总兵官之上。朱见深对此时有所闻，却毫不在意，为了使万贵妃合意，无论什么事情，都可听她所为。

出于享乐心理，朱见深对朝事的兴致大减，初临丹墀时的朝气，很快就消磨掉了。在万贵妃的影响下，他一掷千金地大肆挥霍，建造了大量祠庙宫观，小心翼翼地陪万贵妃拜佛炼丹，尽情欣赏歌舞，做种种消磨时光的游戏。早朝已经成为负担，动辄就被取消，即便升朝，也是摆摆样子，礼成而退，疏奏大都扔给太监去批复。大臣们耳闻目睹朱见深的变化，痛心疾首，一些人纷纷上疏，劝他励精图治。彭时一针见血地说：“万贵妃已过生育之期，毛病甚多，不可专宠。希望陛下分恩宠于众妃。”朱见深对此不加理睬。由于万贵妃横行六宫，朱见深日思暮想的皇子一直没有出生。成化七年（1470）柏贤妃曾经生下一个儿子，被立为皇太子，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万贵妃害死。直到成化十一年，才有太监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藏在后宫的安乐堂内。事情挑明后，内阁首辅大臣商辂等为了使皇子逃过万贵妃的毒手，建议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并建议立即册立为太子。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朱见深照办之后，不仅保住了皇子的性命，而且使万贵妃感到固宠的手段已被识破，遂不再滥行堕胎、毒杀的手法，索性让各个妃嫔多生几个皇子，以与太子争宠。于是，朱见深又增添了 11 个儿子。朱见深不仅在宫廷内宠信万贵妃搞得后宫不宁，与此几乎同时，还重用宦官汪直，搞得朝臣人人自危。汪直开始只是万贵妃的内

侍，由于他奸诈异常，能曲意迎合贵妃心意，尤其会敛财讨她的欢心，以后被万贵妃推荐给朱见深，执掌御马监。朱见深对汪直，开始时印象还不深，但经过一段时间，便成为了朱见深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了。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发生了一起令朱见深极为不安的事情，有个叫李子龙的人被太监私放进宫，图谋不轨。事后朱见深为安全起见，就命令汪直易服化妆，经常带校尉不断外出打探消息。汪直对此非常尽心，街头巷尾的事情，无所不报。这不仅取得了朱见深的信任，而且朱见深一高兴，下命令成立西厂，并由汪直提督，其势力还大大超过原有的东厂和锦衣卫。

在朱见深的支持下，汪直的地位日益巩固，自此他结党营私，屡屡制造骇人听闻的冤狱，到后来朝中公卿大臣，一遇到他都像避瘟神似地改道而行，没人敢招惹是非。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因为在路上没有让道给汪直，便受到了汪直的当面凌辱。汪直的胡作非为，搞得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引起了众大臣的反对，导致了西厂于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一度被罢。但朱见深对汪直的处理十分宽大，仅仅是令他回御马监再操旧业，使群臣大失所望。

朱见深虽然被迫取消了西厂，但仍念念不忘汪直，而汪直对首辅商辂等人的报复，也来得十分迅速。没过多久，朱见深就接到了汪直对商辂加以诽谤的奏报，说他在朝中任用了坏人，接着，又有御史戴缙因商辂没有及时加以提拔，对商辂加以攻击，并吹捧汪直公正无私，建议恢复西厂。朱见深一见有人提出恢复西厂，正中下怀，便顺水推舟，再开西厂，让汪直官复原职。商辂见西厂又被恢复，知事不可为，于是上疏要求致仕。朱见深也

乐得他离开，在恢复西厂的当月批准了他的辞呈。汪直复职后，立即指使西厂诬告项忠有不法之事。朱见深依从汪直的建议，下令三司法和锦衣卫对其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官员对朱见深的意见非常清楚，虽然抓不到什么证据，还是定了项忠的罪，把项忠削职为民。株连所及，一时九卿等官被撤职者达数十人之多。

西厂一事过后，朱见深对汪直更加信任，他听从汪直的建议，把统制三边的王越提升为兵部尚书，把边将陈钺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王越是一名立过战功的边将，但为人品格却不太高，与汪直过从太密，以后终于因此而倒了霉。陈钺也是如此，在跟着汪直做了许多坏事以后，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对朱见深纵容汪直横行宫掖的行为，大臣们一直没有放弃劝谏，许多人以对汪直的不恭行为，从侧面对朱见深加以提示，使朱见深渐渐地明白过来。

成化十五年（1479）秋天，朱见深出于对边事的关心，下令汪直巡视边疆。边臣得知汪直巡边，害怕受责，极力加以讨好，沿途数百里，陈设供应，奢侈铺张到了惊人的地步。兵部侍郎马文升受命镇守辽东，他对汪直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对汪直没有恭敬。结果汪直就给马文升加上了扰边的罪名，把他贬戍边城。河南巡抚秦肱对此十分不平，向朱见深密奏了这一罪行，朱见深虽然不太相信，但对汪直也有了看法。

成化十七年（1481）秋天，汪直奉诏巡边已有整整两个年头。就在汪直巴望回京的时候，朱见深却屡屡不准其请，只召还了跟随他的官吏。这是一个疏远汪直的信号。给事中、御史们一见这种情况，乘机纷纷上疏，把汪直泄露宫中丑事，以及勾结外臣的许多不法行为，一一揭发出来，请求撤销西厂，内阁大臣万安也

上书支持这些言论，大同巡抚郭镗千里之外又上了一疏，揭发汪直和总兵许宁不和，恐贻误边事。朱见深于是下令将汪直召还，不过没有让他进京，而是发落到南京御马监，随后，又撤销了西厂。不久，朱见深又根据万安的建议，罢了汪直的官，驱逐了汪直的亲信王越、陈钺等人，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朱见深的这一举动，令文武百官感到十分鼓舞，认为圣上终于被感化了，从而对朝政充满了信心。

三、迷信僧道 不理朝政

本来在打击了汪直势力之后，满朝文武欢欣鼓舞，朱见深有了一次重振朝纲的机会。但谁知这时的朱见深不仅没有振作，而且又沉溺于两件事上。一是求道炼丹，以此来延长他的寿命，本来宫中已经有一些祀求仙道的斋坛，他对此仍不满足，经常令人加盖翻新。炼丹也到了着迷的地步，宁肯为此废寝忘食。再就是与妃嫔耳鬓厮磨，终日沉溺于房事。太监梁芳见朱见深如此这般，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僧人，名叫继晓。继晓对房中之术很有研究，不断地对朱见深加以指导，并自制了一些春药，供其使用。朱见深按照继晓所嘱，很有成效，于是就将继晓留在京城，在西市建了大永昌寺，耗费了白银数十万两。从这往后，六部尚书和九卿科道大臣基本就见不到他的面了，就连内阁大学士，一年当中被召见也是有数的几次。

朱见深对朝事偶尔还有点兴趣的，是任命官吏。祖制规定，皇帝任命大臣要经过廷推，提升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朱见深不管这些，随意让太监传旨，任命若干

人为官，出身资格一概不拘。被任命者大多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臣。这些官，全是不合格的人员，因此被称为“传奉官”，总数多达 3000 余人。

成化二十年（1484），为了使朱见深能摆脱梁芳、继晓的控制，刑部员外郎林俊满怀愤懑地上书，要求朱见深把梁芳、继晓正法。朱见深十分恼怒，下令将林俊捕入诏狱。司礼太监怀恩对林俊深表同情，面奏朱见深，请予释放。朱见深大发雷霆，提起桌上的端砚，向怀恩用力掷去，随后拍案大骂道：“你竟敢帮助林俊诽谤我啊！”事后，由于怀恩对镇抚司施加压力，镇抚司才没敢对林俊治罪，只是将其降职使用。林俊敢于直言上疏的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朝中的言官，于是，不久因此而引发了又一场上疏行动。

成化二十一年（1485）元旦，朱见深受贺退朝之后，刚刚吃罢午饭，突然晴空炸响霹雳，听后不禁为之悚惧。在一宿心神不安之后，朱见深在早朝上向群臣询问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立即陈言，数说了时弊的六个方面，语气极为沉痛。朱见深听后，不禁心有所动，下诏将已封为国师的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 500 余人。一些给事中、御史见李俊入奏有效，喜出望外，也纷纷上疏。不料，朱见深能够改正一些缺点，并非出于自愿，他对这些疏奏根本就不想披阅，反而对进谏者都耿耿于怀，令吏部尚书尹旻将奏章所署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以后寻找机会一一给以远调或者罢免。

成化二十三年（1487），朱见深终于脱离了万贵妃的控制。这个女人挟制了朱见深整整 23 年之后，死于肝疾。

万贵妃死后，朱见深念及她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年幼时的一

段情份，洒落下了眼泪。他命治丧一切按皇后的待遇办理，并辍朝七日，给万贵妃加了荣耀的封号。

到这一年的八月，朱见深染上了重病，并一病不起，很快就结束了自己平庸的一生，死时 41 岁，葬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的茂陵，庙号宪宗。

孝宗朱祐樞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六日，朱见深死去。九月六日，18岁的皇太子接替父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1488），此即后世庙号称为孝宗的朱祐樞。

一、侥幸得生 清除积弊

祐樞的母亲纪氏在宫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史（女官名称），她本是广西贺县的瑶族民女，在成化元年瑶民造反失败后，夹带在被俘的几千名男女青年中送来京城。由于纪氏姿色超群，聪明伶俐，入宫后不几年即通习汉语，从而被命令管理宫中藏书。成化六年秋天，宪宗偶然来到书房，见纪氏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应对称旨，于是喜而幸之，因此有孕。纪氏怀上朱祐樞，犯了宪宗专宠的万贵妃的大忌，这个女人自己不能生育，也不准别人为皇帝传宗接代，专门残害被宪宗临幸过的妃子和宫女。纪氏怀孕时，万贵妃曾经留意过她，其他宫女谎说她是病痞，于是被贬居安乐堂。看着已经降生的朱祐樞，纪氏忍痛下了狠心，将他交给

门监张敏，让把他溺死。

张敏为人善良，朱祐樞交给张敏后，他想到皇上无子，就背着万贵妃秘密加以哺养，废后吴氏这时正好贬居在西宫，与安乐堂相邻，闻之也往来就哺，从而保全了他的生命。渐渐地朱祐樞长到6岁，成化十一年（1475）春天，终于走出了安乐堂。一天，宪宗召张敏梳理头发，对镜叹道：“老之将至了，尚无子嗣！”张敏就把朱祐樞的事情告诉了他。宪宗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他接来。朱祐樞去见父亲的时候，胎发还未剪除，直垂到后颈，看到宪宗，他依据母亲的交待，扑到宪宗的怀里，大声呼喊“爸爸”。宪宗揽视良久，悲喜交加，连连说：“这个孩子像我，真是我的儿子啊！”随即饬礼部定名，并册封纪氏为淑妃。纪妃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厄运，不久就在新居永寿宫暴死。纪妃之死，有人说是被万贵妃毒死的，也有人说是被她遣人勒死，由于宪宗没加深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母亲的去世，使朱祐樞极为悲伤，神情犹如成人一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年的十一月，朱祐樞被册立为太子。随后即位，是为孝宗。

后宫中的这段经历，对孝宗的影响很大，由此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即位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孝宗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太监梁芳是万贵妃的红人，曾向其大量进献美珠珍宝，得到宠信，一些奸佞之徒通过走他的门路，得到包括太常寺卿在内的官职。孝宗在执政的第6天，就把他送入诏狱。李孜省因为依仗万贵妃作恶多端，公然操纵内阁大臣随意罢免、提拔官吏，被谪罚戍边。两个月后，孝宗又下令罢免传奉官，将那些冒领官俸的艺人、僧徒一概除名，先后总计有3000人之多。接下来，孝宗又拿混在内阁中的奸佞开

刀，首先罢了万安的官。万安的靠山同样是万贵妃，为了巴结这个女人，竟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她的侄子，在万贵妃的包庇下，劣迹斑斑，声名狼籍。孝宗还是太子时，就对此人非常反感，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匣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到万安，严厉指责他：“这是大臣写的东西吗？！”万安羞愧得汗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孝宗遂下令罢免其官职。除此之外，孝宗还以各种方式处罚了另外一些奸佞之徒。在清理过程中，孝宗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被砍掉脑袋的，只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僧人，叫继晓。一系列堪称圣明的行动，好像一阵冲刷污垢的暴风雨，使宫廷之内的坏人骤然减少。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清除障碍的作用。

与罢斥奸佞相并的是任用贤能。为了熟悉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的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提拔、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

孝宗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于是在他上台不久，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如这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言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约费用，以解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顿”，他说：“宫中所供应的物品，如果陛下能节俭一分，则百姓受益一分。”言语极为尖锐、深刻。孝宗对这个建议非常赏识，嘉奖了马文升，并下令削减宫中开支。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个早朝，大臣们为时间所限，进见言事，不过片时。这样一来，

皇帝与大臣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信太监的意见，对大臣们的了解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吏部尚书王恕建议，除早朝之外，孝宗最好每天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其奏章，下发指令。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使皇上加深对大臣们的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其处理政事的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得以贯彻执行。孝宗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

二、任用贤能 注意民生

新君即位之初勤于朝政，而后荒疏，继尔江河日下的事例，史书每每可见。明王朝的君主尤为明显。但孝宗是个例外，弘治初年的诸多优点，在以后几乎一直保持下来。

孝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孝宗的周围，有一批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臣之中，孝宗最信任的是王恕，也因有了王恕的原因，孝宗才如虎添翼，雄风大振。王恕是在成化末年被宪宗强迫致仕的老臣，以“好直言”著称。孝宗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将他任命为吏部尚书，一直干了将近6年之久。新君的善任使王恕感激不尽，在职期间，除了仍能上疏抨击时弊之外，忠于职守，先后向孝宗引荐了包括刘大夏在内的许多人才。孝宗极为赏识的还有马文升。这是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大臣，弘治二年（1489）由左都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并提督12营团。马文升到职以后，因兵备久驰，他

大力整军，罢免了 30 余名不称职的将校。结果惹起遭贬将校的怨恨，有人夜间持弓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人写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孝宗立即下令锦衣卫缉捕，并特拨骑士十二人，时时跟随保卫马文升。数年之后，孝宗仍把重用忠良之士做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又陆续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提升到内阁当中，参预机务。对于内阁大臣们的奏请和意见，孝宗初时尽管大多能听从，有时也并非全都认可，但后来他看到这些人确实在同心辅佐，其信任程度大为加强。凡阁臣们的奏请，无所不纳，与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因刘健曾在他做太子时，担任过讲官，就一直称其为先生，尊重异常。孝宗接见刘健等人的时候，往往要左右之人退下，据这些人出去讲，孝宗对阁臣们讲的话，言听计从，每每称善，这种情形在君臣之间，确实少见。

孝宗在减轻百姓负担上也做了许多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1490）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1493），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孝宗闻奏之后，向灾区发送去帑金 50 余万两，米 200 余万担，并派了官员监督发放，不仅免除灾区税赋，还通过赈济拯救了 260 余万灾民的生命。为了整治黄河以及江南的水患，孝宗令刘大夏于弘治五年（1492）七月，来到了山东，坐镇阳谷。刘大夏不负使命，完成了多项水利工程，历时两年，终于治服了水害。奉旨到江南治理水害的工部侍郎徐贯，也出色地完成了钦命。他在江浙地区大搞调查研究，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一举修建、沟通河、港、泾、湖、堤岸等 135 道，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地方的渠道，毫无阻拦地泄入海中，除掉了威胁朝廷主要经济区的一大祸害。

在施恩于百姓的同时，孝宗继续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表现得相当明智。弘治九年（1496）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向他进讲《大学衍义》，趁机向他揭发太监李辅国与张皇后关系甚密，招权纳贿。此事被李辅国知道后，马上报复，说王华有种种劣迹，应予驱逐。孝宗没有听信这番鬼话，反而哈哈大笑，传令中官赐食给王华，以示亲近。弘治十年（1479）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的时间过长，侍讲学士王鏊反复规劝，孝宗当时没有接受，事后却没有怪罪，而是对诱导他玩乐的太监说：“讲官指出这一缺点完全正确，是一片诚挚之情，完全是为我着想啊！”自此之后，不再到后苑游猎寻欢。为了引导大臣们踊跃进言，孝宗还经常提出这件事情，请人们知无不言。他为取消讲官的顾虑，避免讲官为此观望，不肯大胆进言，特召来刘健等人，说：“讲书必须要讲那些圣贤之言，如此直言不妨。”进而又明确要求阁臣们：“传我的话给诸位讲官，不必顾虑。”为了巩固统治，孝宗如此虚心，在明王朝历代君主中是不多见的。

三、知过能改 限制勋戚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将曾修治黄河有功的刘大夏，由总督两广军务的左副都御史，提升为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行一番改革，因此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告诉孝宗。有一次，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你几次对我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我也尽力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刘大

夏回答说：“陛下以为征敛有常规，其实不然。我在两广任职，每年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这种情况，陛下可知道？”孝宗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与百姓一样穷苦不堪。”孝宗很不理解，说：“士兵平时月有口粮，出征时也有行粮，怎么会穷？”刘大夏向他报告说：“将领统帅克扣的数量，在半数以上，怎能不穷？”孝宗遂感叹道：“我做君主已经很久了，竟不知天下军民如此困苦，这也是我失职啊！”于是，下诏严令将帅不得侵吞士兵的军费。孝宗对刘大夏这样的大臣，非常喜爱，经常召他在一起商讨大事。有时与刘大夏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过长，感到十分疲劳，就传司礼太监李荣搀扶走路。有一次早朝，刘大夏立于一侧，孝宗没有看到，第二天就告诉他：“你昨天失朝了吗？我担心御史找你的麻烦，所以当时也没让人召你。”这个小小的误会，足以说明孝宗对爱臣的感情。在孝宗的支持下，刘大夏大力整顿军事。先是从核查军队虚额入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醮。孝宗看了刘大夏写的“兵政十害”的疏奏，接受了他的许多建议，不过，也有一些保留，有的因为牵扯到权贵和近倖，孝宗认为与军备关系不大，就搁置起来，没加批示。如刘大夏力主把分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就没有同意，这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在阁臣以及六部尚书的支持下，孝宗在弘治初年对朝政加以治理的基础上，沿着改良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勋戚宦官等为非作歹，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孝宗特别予以了注意。弘治三年九月，孝宗下令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不准接受外人的投献钱财、物品。这是一场几经反复的斗争。勋戚近臣对这项命令，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并在行动上

不加收敛，公然蔑视各种规定，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在京师之中大开店铺，邀截货商，收受献品，有的还在府中养了大批仆从，任意肆虐百姓。面对这种情况，孝宗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弘治九年，孝宗排除阻力，首先对民愤极大的张皇后的两个兄弟开刀。皇后有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张氏兄弟仗势骄肆，纵使家奴夺取民田、民宅，指使官吏释放行赂的囚犯，十分霸道。朝中大臣十分愤慨，纷纷上奏，孝宗收到举报后，就派人去调查，结果属实。孝宗毫不客气地严令制裁。

由于朝中一些太监对孝宗影响太重的原因，孝宗身上的有些毛病改起来比较困难，尽管与他多年来的勤于政事的长处相比，这都瑕不掩瑜，但毕竟有失明君的形象，况且他也有铸成大错的时候。如他有热衷于斋醮、修炼的缺点。在政务上，孝宗对一些好的措施，也不能完全持之以恒，言而不行和半途动摇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情况最严重的几年当中，孝宗停止了午朝的做法，除了早朝还能坚持，与大臣们几乎不再见面。章奏的批答也不及时，有的竟能滞留数月之久，批示过的也只不过问执行的情况。幸好这种情形，到了弘治末年得到了改变。弘治十四年（1501）之后，孝宗接到的劝谏疏奏日益增多，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了改正。

在孝宗的诸多失误当中，有一条是对皇戚勋爵的不法行为，缺乏一以贯之的打击。他曾经将这个问题看得相当严重，于弘治三年、九年下决心解决，但落到实处的制裁措施不多，其阻力来自张皇后。

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数万言。其中指斥张皇后的兄弟张鹤龄尤其严厉，揭发他招纳无

赖，鱼肉百姓。张鹤龄与皇后母亲金夫人听说后，天天在孝宗面前哭闹，要将李梦阳下狱。孝宗不得已，照着做了。科道官纷纷上疏营救，金夫人也不放弃攻势，又在孝宗面前哭闹，要求对其加以重刑。孝宗大怒，推案而起。接着刑部来请示处理意见，孝宗毫不犹豫地提笔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过了一些日子，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入内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场。酒至半酣，皇后、金夫人入内更衣，孝宗独召张鹤龄谈话，左右不得闻，但见张鹤龄免冠叩头不止。于是鹤龄兄弟，大为收敛。不久，孝宗在一次召见刘大夏时，谈完其他事情，又询问社会上舆论的情况。刘大夏告诉他：“最近放了李梦阳，中外欢呼，交口称赞陛下的圣德。”孝宗对他说：“李的上疏中有‘张氏’两字，有人说这是对皇后的污辱，我没办法才将他下到狱里。刑部的请示一到，我曾经问人如何处置，有的竟说要杖责。我知道这些人的本意是要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妇人之忿。所以我下令将其释放复职，也不让司法拟罪。”

对皇戚勋爵的打击，在李梦阳获释之后，自然就达到了高潮。锦衣卫和东厂的侦缉往来探听，据实治罪，颇有声势。那些往日横行不法的权贵，从孝宗的决断行动当中，感到寒光闪闪的利刃正在逼近，纷纷收敛了劣迹。京城中悄悄关闭了若干商栈店铺，被遣散的家奴仆人，也纷纷另寻生路。京城一带，遂告平安。

孝宗在执掌权力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整顿朝纲，渴望帝国的振兴。弘治十八年（1505），李东阳奉旨去山东曲阜祭祀孔子，时值大旱，返京的路上，李东阳将所见所闻奏告孝宗，其中多是朝弊造成的不良后果。孝宗接到奏报，流下了痛心的眼泪，他反躬自省，竟夜不能眠。也就与此同时，工部尚书曾镓

为削减宫中的开支，向他进言，裁减尚衣局、军器局、司设监的匠人，他毫不犹豫地就加以同意。此后，当他接到了宫内针工局的奏告，计划招收大批的裁缝入宫时，也没有批准。孝宗还下令裁减织造数额的三分之一，大大节省了经费开支。

孝宗临死之前，给将要接替自己继续执掌权力的皇太子，留下了大笔有形和无形的财富，留下了弘治贤相和能臣，留下了宗社的安定，也留下了殷殷期望。对自己的一生，他自觉问心无愧，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苦心经营出的“弘治之治”的瑞祥气象，还能持续多久？他是多么希望继位的皇太子能将他的政绩发扬光大，使“弘治之治”连续成“弘正之治”但遗憾的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武宗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1505）四月，孝宗皇帝患病多日，身体每况愈下，已是残灯将灭。熬到五月六日中午时分，便在群臣和太子的痛哭声中去世了。五月十八日，15岁的皇太子即位，以第二年为正德元年（1506），新继位的皇帝即朱厚照，后世庙谥号武宗毅皇帝。

一、懒于朝政 除正扶邪

朱厚照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他唯一的弟弟朱厚炜三岁时就夭折了，因此他在当太子期间不像前几朝那样，宫廷中充满了争夺储位的尔虞我诈，刀光血影。

朱厚照刚入学时的表现还相当不错。诸儒臣更番进讲子史经籍，时间安排得也很紧，他常常一听就是一天，非常入迷。讲官下课时，他必要拱身致敬，作揖告别。次日，掩卷朗读所学功课甚为流畅。

出于对太子学业的关心，孝宗余暇也爱到学宫去走走看看，提一些问题让朱厚照回答。朱厚照每次听说父亲来了，都立即率宫僚趋前迎接，按照学过的礼节，恭恭敬敬地行事，用心回答父亲的提问。对此孝宗感到很满意。为了使这个嫡出独子增长见识，孝宗外出的时候，总爱将他带上。但谁知这一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频繁的外出给朱厚照提供了认识皇宫之外世界的机会，使他顿感宫中学屋一方天地的狭小，慢慢书屋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讲官们的妙语连珠也变得枯燥无味。他就像飞出樊笼的小鸟，再也不愿回到笼中去了。朱厚照心猿意马，于学业上开始疏懒起来。本来太子的游戏时间和种类是不少的，像踢球、斗蟋蟀、角抵、百戏这些，都是朱厚照熟悉的消遣方式，但这与置身于皇家林苑之中放鹰纵犬、泛舟逐流，个中滋味毕竟不大一样，况且朱厚照已经不是呀呀学语的孩子，他需要更多、更新鲜、更富刺激性的游戏方式。也许侍卫在孝宗身边的那些纠纠武夫给他的印象太深，朱厚照对兵器愈来愈感兴趣，进而发展到喜欢骑马弓射。在热心的太监们教习下，打马飞奔、挽弓疾射对朱厚照很快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有人将朱厚照的新变化告诉了张皇后，张皇后有些忧虑，但孝宗对此不以为然，说：“他这是在学习军事知识，小小年纪就知居安思危，这是件好事，不要多加干预。”

弘治十八年（1505），一个没有经过很好教育、且心已玩疯了的孩子，陡然做了皇帝，终日跟繁复的朝廷礼仪，枯燥的群臣奏疏，繁乱如麻的国家大事打交道，自在惯了的朱厚照，哪里招架得了？于是每日早朝成了他一天最难捱过的时光。他向往太子时期的欢乐，想念在东宫里陪他玩乐的太监们，心性变得浮躁起

来。

朱厚照的身边，有个非常阴险的人物刘瑾。这人生于陕西，早年自阉进宫，孝宗时，并没有得势，有次还因为犯了罪要被处死，后来被宽宥，入东宫服侍太子，直到朱厚照即位时，在太监中的地位也不高。刘瑾品性恶劣，狡诈多端，他善于揣摩朱厚照的心理，极力迎合主子的癖好，他知道朱厚照爱玩，因此千方百计经常弄来鹰犬、歌伎、角抵之类供朱厚照玩乐，以后还带他出宫兜风，因此取得了朱厚照的信任和宠爱。不久刘瑾收罗了马永成、高风、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七个太监，他们都有媚上欺下的手段，他们几人相互勾结往来密切，恣意横行，人称“八党”、“八虎”，是朱厚照的“私爱”。

在刘瑾等人的引导下，朱厚照即位没多长时间，对朝事就由厌烦发展到不管不问。大臣们尽心写好的疏奏，他只是划上“闻知”两字，往下便没了结果。他常由持刀拖棍的太监簇拥着，拍马驰驱宫禁，整日泛舟南海。他还不顾皇帝的威仪追逐宫女，三天两头与张永溜出皇宫，或在秦楼楚馆中厮混，或于醉眼朦胧中误认良家妇女为娼妓，任意闯入民宅，纵情笑乐，丑态百出。为了掩饰淫荡行为，他先是吩咐专记皇上寝所、幸临宫妃的太监免于记注，后来干脆去掉了尚寝司这一官职。由于朱厚照纵欲胡为，造成精神困倦，所以早朝的时间往往是一拖再拖，经常要等到日高数丈。侍卫执役人及朝中大臣等不能久立，纵横坐卧、弃仗满地的景象屡屡可见，四方朝见官员、外国使臣疲于久候，皆苦不堪言。

弘治朝的一批正直大臣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但他们屡谏不听，有些人开始心灰意冷。正德元年（1506）四月，吏部尚

书马文升上疏要求退休。朱厚照即位以来，马文升像以前那样，孜孜不倦地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各项政务，为了汰除传奉官，不惜开罪当权的太监。太监们对他十分怨恨，这时见到他的乞休奏疏，就劝说朱厚照下旨，允其归。朱厚照听从了太监们的主意，非常客气地将马文升打发回家。被朱厚照打发回家的重臣，还有兵部尚书刘大夏。在排斥正直臣僚的同时，朱厚照在刘瑾等太监的怂恿下任用了一些投其所好的小人。如代替马文升职务的焦芳，因他心术邪恶、一心向上爬，被刘健、谢迁所看穿，一直不得重用，一次户部尚书韩文报告财政吃紧，大臣们在廷上议论，认为“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朱厚照出于对这件事的关心，找了心腹在大臣中间观察。当时的吏部左侍郎焦芳参加了这次讨论，他知道朱厚照安排了耳目，故意大声说：“就是老百姓家也要有所花销，何况国家、君主！现在拒租匿税成风，你们不去认真查处，反过来倒说皇上的不是，究竟是因为什么？”一言即出，朱厚照对焦芳自然另眼相看，加上刘瑾吹风，很快就让他升任吏部尚书。

眼见“八党”胡作非为，朝政日非，正直的朝臣忍无可忍，正德元年十月，户部尚书韩文愤然联合其他大臣上疏。他们历数“八党”的罪行，规劝朱厚照以国事为重，勤政讲学，远离小人，以肃纲纪，要求将“八党”明正典刑。朱厚照接到疏奏，思前想后，因事关众怒不得不把奏疏交给内阁讨论，但提出从轻发落刘瑾，让他到南京去服苦役。内阁大臣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杀掉刘瑾。到内阁中传达、商讨意见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平时也非常憎恨刘瑾，回来向朱厚照报信说：“大臣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余地了，内阁首辅刘健还推案大哭，说，‘先帝

临终前要我辅佐太子，治理天下，现在他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不杀八党，我没有脸去见先帝！’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咄咄逼人的形势面前，朱厚照无奈只得同意对刘瑾等人处以死刑，当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忍不住泪如泉涌，心里有说不尽的委屈。

刘瑾死党焦芳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告诉了尚蒙在鼓里的刘瑾。刘瑾大惊失色，困急之中带上另外 7 个人，急赴朱厚照寝宫，围着他放声大哭，乞求皇上饶命。朱厚照心中老大不忍，脸上现出悔意。刘瑾看中机会，为其儿党百般解脱，并挑拨说：“这件事情全怪王岳这个恶贼，他勾结朝廷命官想限制皇上外出宫门，故意先除掉我们，使其能控制皇上。退一步说，富有四海的皇上，玩几只鹰又有什么？如果司礼监有一个皇上信赖的人，阁臣们难道敢这样逼迫陛下吗？！”

朱厚照听后连连点头，他认为刘健等人太过份了，越想越气，不仅改变了杀刘瑾的计划，反而当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执掌司礼监。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西厂成化十八年罢，这时又设），将宫廷权力几乎全交给了刘瑾。刘瑾有了权力，连夜派人把王岳、范享逮捕，押往南京。

一夜之间，局势逆转。第二天早朝宣读的圣旨，对充满信心、准备伏阙力争的大臣们，不啻是当头一棒。刘健、李东阳、谢迁万没想到，一夜功夫，乾坤颠倒，刘瑾等人不仅活着，而且升了官，控制了朱厚照身边的要害部门。他们对朱厚照失望到极点，许多大臣提出辞职回家。朱厚照没有客气，在他们的辞呈上挥笔写了“钦准”。

贬斥顾命大臣的决定遭到了言官、大臣们的激烈反对。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朱厚照进言，请留刘健、谢迁。朱厚照认为这

是对皇威的冒犯和轻蔑。他下令对谏争的官员们施以杖刑，削职降级。那几日宫廷内哭号震天，血肉飞溅，京城外落叶翻卷的土路上，不时有载着遭贬官员及家眷的马车匆匆驶过。兵部主事王阳明，为保护言官当面怒斥刘瑾，结果也被处以杖刑，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他在赴任途中，发现有刘瑾派来的杀手追踪，只好夜中将鞋、帽投入钱塘江中，造成投水自尽的假象，才得幸免一死。

二、重用刘瑾 纵情淫乐

自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去职后，朱厚照愈发信任刘瑾，对他言听计从。刘瑾控制了皇上，便开始报复政敌，扩充个人势力范围。先是杀掉了押往南京途中的王岳、范亨，很快借故罢了户部尚书韩文的官，命令厂卫的侦缉四出监视官员的行动，然后派出自己的亲信太监，分镇各边镇，将对自己摇尾乞怜的人一律升官，一时擢升官校达1560人，又假借朱厚照的旨意，授锦衣卫官数百名，其死党焦芳，还被他保举进了内阁。朝内朝外，遍布刘瑾党羽。

初时，每当朱厚照玩乐兴致正浓的时候，总要扫兴，因为刘瑾每每这时将各司送来的疏奏，递过来让他御批。朱厚照对此大为光火，一回两回倒还忍了，经常这样，禁不住就暴躁起来。他横眉立眼地喝斥刘瑾：“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我来管，我来问，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岂不知这正中刘瑾的奸计。这以后，刘瑾就将朱厚照的御笔抓了过去，所有文武官员的奏章实际是送刘瑾过目。刘瑾没有文化，不学无术，许多奏疏看不懂，更不能批答。不过他也有办法，就是将奏疏带回私宅，与妹婿礼部司务孙

聪相商处理，然后交给焦芳润色执行。刘瑾的宅前，天天都有大批各府衙门的官员等候汇报公事，对他行向皇帝行的跪拜大礼，如同等候皇帝的召见一样。官员在奏疏里和平常的谈话中，都必须称他刘公公或刘翁，不可直呼其名。都察院有一次忽略了，公文中写了“刘瑾”二字，被他臭骂一顿，都御史只好率领僚属跪着请罪，才算无事。大小官吏奉命出京办事或归来，都要先拜见刘瑾之后才能上朝，这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大小官员莫敢违犯。出自刘瑾手中的“御批”、“圣旨”源源不断，文武百官真假莫辨，只好一一遵从，内阁首辅李东阳对此也只能点头称是，不敢提出疑问。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假借朱厚照的圣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做了两件事。他先是到内阁中走了一趟，让阁臣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命各府州的镇守太监，可以干预巡抚的刑名政事。之后，又将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御史陈琳等 53 人，列入奸党，“榜示朝堂”，召集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诏”，借此对朝官中的正派人士进行威吓。

朱厚照对刘瑾的横行跋扈，闻之不怒，见而不怪。一方面他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他认为刘瑾忠心耿耿，为自己拔掉了不少眼中钉。有些对刘瑾非常痛恨的官吏，用写匿名信的方法，向朱厚照告发刘瑾权擅天下，索取贿赂、侵渔百姓的罪状，朱厚照则认为无稽之谈，望风扑影。他不但戏谑地说：“我的天下就是给此人也无不可，不过要等我乐意的时候”，甚至将收到的匿名信交给刘瑾去处理，以显示自己对刘瑾的充分信任。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丹墀前又发现了告刘瑾的信。朱厚照让人把信拿来，匆匆一扫，随手交给

刘瑾，拂袖而去。刘瑾恼羞成怒，立即下“旨”，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对他们进行责诘。因无人承认，当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300多人收入锦衣卫狱。时值酷夏，竟有人热渴而死。第二天李东阳上疏申救，刘瑾也听说是太监中人所为，始才将人释放。事后，朱厚照对李东阳说：“你说的那些好人，我就是不任用，你说的坏人，今天我倒是偏偏要重用他。”

由于朱厚照的支持，为了监视京城士民及百官的言行，正德三年（1508）八月，刘瑾又成立了内行厂，由他亲自掌握。这样东西两厂和内行厂三大特务机构连成一气，争相侦缉罗织，滥杀无辜。内行厂中设置了各式特殊的刑具，其中一种叫反枷具，重达150斤，一旦套在身上就会被活活压死。而那凌迟处死，更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酷刑。几年内，被处死的官民竟达几千人之多。京城中的官员，无论大小，见到太监登门，第一个感觉莫不是祸事临头，而京城外的官吏、百姓，神经更为紧张，遇着衣着华丽、操京语、打马狂奔的人，无不纷纷传告躲避，犹如惊弓之鸟。

刘瑾把朱家王朝的官职攥在手里，谁给他的贿赂多，就封给谁。他曾经向亲信们夸口说，其聚敛的财富可与皇上一比高下。事实确实如此，有个叫刘宇的下级官员一下子贿赂刘瑾万金，刘瑾立即封他为兵部尚书，后来又提拔为太子太傅。地方上的布政使上京朝觐，至少要向他献银2万两，如拿不出这笔钱，不仅会丢掉官职，还要引来更大的祸事，暂时凑不够钱的只好去向京师富豪之家举借，复任之日，再取官库所贮加倍偿还，称为“京债”。

朱厚照成了刘瑾操纵的傀儡皇帝。他站在高高的太和殿上，

沐浴着紫禁城中的朝日辉煌，欣赏着朝廷命官们唯唯诺诺的面孔时，心底却充满了人君的自豪。当然他不会听到人们背后对他的议论，人们管他叫“座皇帝”，刘瑾是“站皇帝”。

朱厚照将朝政交给刘瑾后，玩乐之心已如脱缰之马，他不安分的心时时产生骚动，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为了新奇，他令宦官们仿照京城市肆，开设了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在里边做买卖交易，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还让人从中调节成交。又让宦官开设酒店，挑一些有姿色的宫女在店中弹琴歌舞，还召京城里那些斗鸡逐狗之徒，入宫表演各路“绝活”。正德二年八月，朱厚照依从刘瑾的主意，下令在西华门外筑起了两厢有密室的高大宫殿，命名这片宏大建筑为“豹房”，豹房建好之后，挑选了大批珍禽异兽和民间秀女充实其中。朱厚照整天在赏玩珍禽异兽的同时，纵情声色。以后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看到朱厚照玩腻了宫中的妇女，就向他献媚说：“西域地方的女子，姿容特别漂亮，皮肤白皙细嫩，比起汉族的女子来，要胜过一百倍。”朱厚照听后，就让于永去寻找。于永不负皇上的嘱托，在京城里奔波了几天，从京官们的府中物色了一批能歌善舞者。朱厚照见后，果然个个妖娆绝色，大喜过望，把她们也留住，在豹房密室中，待之如嫔妃。朱厚照对音乐歌舞，有一种几近天生的喜好，他天天召教坊司的乐工到跟前演奏，还不得满足，就下令礼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选全国各地通艺者入京待召，结果优伶进京的每天数以百计。舞女、乐工们鲜衣美服，演技高超，朱厚照目不暇给，赞叹之余不免跃跃欲试，遂昼夜学习，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勤学苦练必有成果，时间不久，朱厚照也能引吭高歌一曲，其声虽不能响彻行云，倒也十分开心尽兴。

朱厚照在挥霍浪费上更是达到朝野皆惊的地步。他在短短的几年中，陆陆续续地整理和扩建豹房，费去了白金24万两。正德九年（1514）为修复年初焚毁的乾清宫，向全国加赋100万两，起用军校力士10万余众。对于女人，朱厚照的兴趣有增无减，凡向他进献美女的人，都得到了极厚的赏赐。延绥总兵官马昂本来犯罪罢官，他妹妹生得漂亮且能歌舞，精通骑射，已经嫁人怀孕，马昂把她从夫家手中夺出献给朱厚照。朱厚照惊其美丽，极为宠爱。马昂不久就复职，还得到了朱厚照赐给他的住宅、蟒衣。

豹房中的醉生梦死，并不妨碍朱厚照另一癖好，即大兴土木营造。继豹房之后，他又下令陆续修了太素殿、凝翠殿、昭和殿、光霁殿、崇智殿，等等，还扩建了南海子船坞。这些工程都尽力修得豪华、气派，费用浩繁。承建工程的经手人发了财，一些官吏和太监也趁机发财，用贪污的钱财建起了自己的庄园、祠墓以及香火寺观。无视国力的大举挥霍浪费，使弘治年间积聚的内库银两急剧减少而告罄。以后朱厚照几次指使向全国加税，也还入不抵出。工部大臣不敢停下这些工程，向朱厚照奏请卖官，当即就得到了批准。仅正德二年就卖了两次，只要愿意纳银，可从承差，知印役吏一直买到指挥、僉事。于是，出现了文官有目不识丁者、武官有不能发一矢者的荒唐情景。朱厚照开了这个先例，各部官员纷纷紧随其后，不择手段地为皇室增加收入，以作为自己晋升的敲门砖，同时也一饱私囊。仅在京畿一带，短短的几年当中，他们就替朱厚照兼并百姓的良田美地3.75万余顷，设了300多个皇庄。管庄的官校们打着朱厚照的旗号，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京畿以外的百姓，在官吏的淫威之下，生活更是水深火热。

新的玩乐方式、玩乐场所，新的珍禽、新的美女，使朱厚照更加厌烦那些繁琐无味的视朝听政。群臣苦心婆口地劝说很久，他才不得不“偶尔虚应其事”，有时虽然宣布视朝，官员从早等至黄昏，却又传旨免朝，诸臣只得快快而归。正德十一年（1516）元旦，按祖制进行庆贺大典，朱厚照按例应去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天百官以及国外使臣四更时就齐集宫门等待，足足等到下午，朱厚照才起床，懒洋洋地蹒跚而来。下午酉时典礼开始，拖到深夜才结束。百官饥渴一天，好不容易听到散朝，就如同囚犯听到了大赦，个个夺路狂奔，许多人被推倒，以至互相践踏，将军赵郎竟被踩死在禁门之中。

这时的明王朝，皇帝纵情淫乐，太监肆意弄权，朝政此时是一塌糊涂。谁知刘瑾此时对自己这种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仍不满足，他怕某一天朱厚照对他失去宠信，因此竟打起了发动政变，自己做皇帝的主意，这引起了他的死党之一张永的疑虑。张永本来就与刘瑾有些矛盾，怕自己参与刘瑾的事不成而遭灭门之祸，从而向朱厚照告发了刘瑾。朱厚照听后大惑不解地反问：“刘瑾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张永说他这是要得到天下，朱厚照说，那让他得到好了。张永又说，那时候将置陛下于何处呢？朱厚照这时才醒悟过来，下令连夜把刘瑾抓起来，准备谪居凤阳，但心中仍半信半疑。

在张永的鼓动下，朱厚照亲自率领锦衣卫去查抄刘瑾的家。从刘瑾家中，搜出了伪玺、穿宫牌以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带等违禁品。此外，还有黄金24万锭又5.78万两，元宝500万锭又158.36万两，宝石2斗。细心的士兵从刘瑾常常使用的扇子中，还发现了两把锋利无比的匕首。朱厚照直到这时才对刘瑾

恨得咬牙切齿，说：“这个奴才果真想造反！”气极之下，照着刘瑾连挥数拳，接着下令将刘瑾处以磔刑。刘瑾处刑之日，许多人争相向刽子手买他的肉吃，以此发泄心中的奇耻大恨。跟随着刘瑾的一批内外官，被弹劾成为奸党，包括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总数超过了60多个。

三、肆意纵游 染病身亡

从正德十二年始，朱厚照已不满足于在宫中或京城中胡作非为，在新宠信的一个大臣江彬鼓动下，动了到塞外出游的念头。他怕引起朝中大臣的反对阻拦，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在没有仪卫扈从、伴驾大臣、护辇将军陪同的情况下，朱厚照与江彬一行悄悄出京，过昌平，直抵居庸关，命人传令打开关门。大学士梁储等闻知后直起急追。巡关御史张钦拒不执行这道命令，将朱厚照派来叫关的使臣召到面前，加以训斥，说：“皇上决不会悄声匿迹地出巡，定是有人假冒圣驾，希图出关通敌。”朱厚照听了大臣的回报，第二天又命其去宣谕。张钦不再装傻，将“敕印”绑在背上，手持宝剑，坐关门之下，严厉地宣称自己受天子的命令把守边关，没有天子的敕谕，“敢言开关者斩！”朱厚照闻报大怒，命人逮张钦治罪，正好梁储赶到，苦苦劝其回京，朱厚照不得已，怏怏而回。几天后，朱厚照乘夜深秘密出京，又至居庸关，派人刺探张钦，得知其正巡察白羊口，于是不失时机抢出关去，并命令谷大用代张钦守关，阻止追劝的朝臣。在江彬的引导下，朱厚照日行夜宿，饱览塞上风光，九月到达宣府。这里，江彬已提前为朱厚照修建了镇国府，将豹房中的珍宝，以及

巡游中掠来的妇女安排在里面。朱厚照见府中女乐歌童无一不备，房屋建筑画梁雕栋、朱檐黄瓦，禁不住心花怒放。宣府地处塞外，因是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青舍点点，牧歌悠悠，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乐而忘归，常常在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被调来保护朱厚照的军士们炊柴接继不上，动辄拆毁民房，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

没多久，朱厚照又去了阳和（今山西阳高）。正值蒙古兵骚扰这一带，他闻报之后，心想这正是显示自己“勇略”的好时机，于是将自己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称驻所为“军门”，并以此职写奏章向内阁索要军马粮钱。阁臣们没有答应，上疏请他早日还京。朱厚照干脆直接下旨给户部，“拨银一百万两给宣府，以赏劳军师。”尚书石介只好送去这个数字的一半，应付过去。10月，两军交战于应州城北，朱厚照亲执武器，与太监们率兵自阳和驰援，激战了两天。这一战，虽然蒙军死16人，最后退走，但明军伤亡六百余人，朱厚照也险些被俘，可他却认为取得了重大胜利，让人向朝廷发回捷报，自己则率兵折回宣府。隔不久，时当立春，朱厚照在宣府准备了诸样杂剧欢庆新春，其中最令他开心的是，装饰大车数十辆，上载和尚与妇女数百人，令他们互相打逗，以为乐趣无穷。正德十三年（1518）春决定返京，传令群臣盛服郊迎“威武大将军朱寿”凯旋。正月十六日，朱厚照回到京城，当晚又“宿于豹房”。

没过几天，朱厚照又起身北巡宣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宣宗的皇后）去世，他只好收起游兴，赶回京城办理丧事。

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朱厚照借太皇太后将下葬的机会，开始了第三次出巡。他先去昌平，又到密云。江彬等沿途掠夺良

家女数十车，经过之处，民多逃亡，远近骚动。五月，自喜峰口还京，一路上春风满面，全无半点悲戚之色。

时隔仅一月，朱厚照因怀念塞外，准备再次出巡，遂以边关经常受北寇入侵为借口，令阁臣起草敕令：“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征讨。”七月九日，天还不亮，朱厚照就带领江彬及兵士走出东安门，沿着已经走熟的路线，经过居庸关，到达宣府。接着，他又来到大同，在大同降敕，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担。十月，巡游的大队西渡黄河至陕西榆林。十一月，南至绥德。十二月，东渡黄河，到达太原。这次巡游，江彬与随行士兵到处为朱厚照物色美女，无论官家民家，已婚未婚。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很有几分姿色，精通音乐，朱厚照占为己有，临行载之而归。此后，这女人便随侍朱厚照，宠幸超过诸女，称作“美人”，江彬则称其为“娘娘”。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朱厚照的“远征”结束，满载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丽女自宣府而归。这次出巡时间达半年之多，跟从他的人不堪劳累，多半生过病，而他一路上乘马驰行，涉险阻，冒风雪，兴致勃勃，毫无疲惫之感，甚至连一次小小的感冒也没患过。

第四次出巡归来之后，内宫大臣杨廷和向朱厚照上疏，请他“明诏天下，不复巡游”，朱厚照不听。他在阅尽塞上奇丽风光后，炯炯的双眼又移向了细雨轻烟笼罩的南方。不到一个月，又下南巡诏令。南巡的诏令刚下，就遭到朝臣的群起反对。先是杨廷和等人面见朱厚照，说西北之巡已经闹得百姓哀痛，若南巡必又涂炭江南，又说皇子一直没有降生，圣上应保养身体，以继宗社，应当收回诏令。对此朱厚照不加理睬。兵部郎中黄巩等人见毫无

结果，先后上疏，批评朱厚照因宠信坏人，使朝政先坏于刘瑾，再坏于江彬，指出朱厚照南巡不过是“侈心为乐。”朱厚照对此十分震怒，将阻拦的黄巩等 30 余人捕入锦衣卫狱中。对其他 146 名反对的大臣当庭施以杖刑。江彬恨他们指斥其罪行，暗中令掌管刑狱的加重责打，为此前后共有 15 个大臣毙命。但其余大臣并没有被吓倒，还是死谏不退，迫使朱厚照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这一打算。

正当朱厚照为南巡的事情与朝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江西南昌在悄悄孕育着一场叛乱。南巡的风波刚刚平息，叛乱的消息就传入京师。

叛乱的头子是朱宸濠，其高祖为明太祖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朱宸濠早就有窃国的准备，他的护卫军队曾几次被取消，但很快就被他通过各种手段恢复，经过苦心经营，有 2 万余众。因朱厚照胡作非为，又无子嗣，朱宸濠认为时机已到，正德十四年（1518）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声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中了可供调遣的兵马，号称十万，公开反叛。叛军杀掉了巡抚江西副都御史孙燧等一批官员，任命了所谓左右丞相，以及兵部尚书，挥师沿长江而下，攻打安庆。

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急令各府州县，发兵会剿。正当王守仁与朱宸濠激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朱厚照得到了消息，他认为突破大臣们的阻挠、实现南巡梦想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开始筹划御驾亲征。江彬等陪他在豹房中玩乐的近臣，马上积极响应。朱厚照恐再形成上次的局面，公开明令：“再有敢妄言劝阻者，处以极刑！决不宽宥。”这回总算达到了目的，八月，以南征为名的十万队伍浩浩荡荡涌出京城。

队伍刚至涿州，王守仁平叛获胜的捷报送到了。朱厚照看罢捷报，他怕失去借口，悄悄将捷报掖起来，秘而不宣。十二月初，抵达扬州。太监吴经已先期赶到，将夺来的民宅改为“大将军府”，还打着圣上的幌子到处寻找处女、寡妇，一时间居民惶恐不安，有女之家皆赶紧婚配，甚至拉郎相配。掠夺来的妇女被关在尼姑庵，有钱人家将人赎出，贫者多自杀，余下的送入“大将军府”。朱厚照在扬州一住数日，之后，大军进发南京，又在南京游玩数月。一路上随行的江彬狐假虎威，肆意妄为，让各地的官员一律身着戎服迎送车辇，而江彬则不时地传圣旨征索。旗牌军校对待官职稍小的郡县长吏，任意拷缚，待之犹如奴隶一般。为了满足朱厚照亲征的面子，江彬还授意让王守仁将朱宸濠在鄱阳地区放掉，以便让朱厚照擒拿。王守仁极为愤怒，他上书陈述江西兵乱之后，已是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大兵再至，将有不测，朱厚照最后表示可以不再继续南下，让王守仁“重上捷音”。正德十五年（1520）七月，王守仁再次报捷，为了照顾朱厚照的情绪，在捷报上写明完全是按照威武大将军的布置，才讨平了叛乱，又把随征的诸宦官、大臣的名字也列上请功。朱厚照没有亲自捉到朱宸濠，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于南京搞了一场非常可笑的受俘仪式。他设了一个广场，竖起威武大将军的大旗，由全副武装的士兵围场一周，令去掉朱宸濠身上的枷索，自己着戎服，持利剑，在伐鼓鸣金声中，冲进场去与朱宸濠格斗，将其擒获，重上桎梏，然后接受献俘。这场闹剧结束了，朱厚照才觉满意，在大学士梁储、蒋冕的劝说下，决定“班师”。

自南京返回京师的途中，朱厚照迷恋于水乡秀丽的景色，一

路上捕鱼射雁，走走站站，从容不迫地享用南巡的最后一段时光。九月，他来到清江浦，划着小船在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捕鱼捉虾，不想在奋身撒网时，翻船跌落水中，幸亏左右的人及时跃入水中将他捞起，朱厚照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这次虽没被淹死，但受了凉，生起病来，并且一直不见减轻。十月，朱厚照还至通州。没过多久，在通州处死了朱宸濠，将其焚尸扬灰。这时，江彬还在鼓动朱厚照北上宣府，因他的身体实在不能支持，才没依从。从通州起驾回京的路上，朱厚照再也无力骑马了，只得登辇而行。从遮盖严密的车辇上，朱厚照不时传出教大臣们心惊肉跳的剧烈咳嗽。十一日，文武百官迎驾到正阳桥，朱厚照强打精神，披挂战袍，立于正阳门下，与百官们检阅大军以及“赫赫战果”，接受人们的欢呼表贺。十四日，朱厚照因凯旋大祀天地于南郊，跪行天地时，由于病体不支，突然从口中喷涌出鲜血，终于提前告退。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朱厚照死于豹房，终年31岁。朱厚照一生嫔妃如云，美姬常拥，但他没能为自己留下后嗣。预先准备好的葬地是康陵。对自己荒嬉无度的一生，朱厚照自己有个评价。他在临死的头一天，对守护身边的太监说：“我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你把我的意思转告太后，天下的事情，还是朝政为重，请她今后一定与阁臣们商量行事。过去的事情，责任由我负，与别人无关。”君王们威福任情一生，能引咎自责的，不算太多，朱厚照临终能做如是说，确属不易。这位临死才有点明白的皇帝，庙号“武宗”。

世宗朱厚熜

湖北小城安陆，是一方富庶的绿州。明弘治年间，这里多了一座兴献王府，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朱祐樑的弟弟朱祐杬，被封在此地做藩王。

正德十六年三月，从这里走出了翩翩少年朱厚熜，他挥泪告别汉水边的故土，入继大统，成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庙号“世宗”。

一、初治国政 朝争仪礼

明正德十六年时朱厚熜只有 15 岁，他的父亲朱祐杬前年刚刚去世，按照明朝的礼法，朱厚熜 13 岁时就以世子经理王府事务，不久前又被特命承袭王位，小小年纪就已拥有了一个亲王的种种特权。

对于明宪宗朱厚照驾崩的消息，朱厚熜知道的不算太早，三月的最后几天，朱厚照已死的邸报传来，王府上下按照惯例举行了十分铺张的哀悼，此外他根本不曾想过这件事与自己还有什

么关联。

替朱厚熜想到继承关系，并力主由他登极的，是远在京城
的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朱厚照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慈寿
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议所当立。早有准备的杨廷和第一个发言
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皇太后对杨廷和的建议没有
提出异议，批准写进大行皇帝遗诏，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二日，风尘仆仆的朱厚熜由安陆来到了京城郊
外。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仪迎接他，但朱厚熜凭借掌握的礼
仪知识，拒绝参加这个仪式，他责问叩问缘故的众臣说：“遗诏
写得很清楚，我遵照兄终弟及的祖训嗣皇帝位，你们按照太子礼
的方式迎接我，难道我是来做太子的吗？！”新君的机敏和强硬态
度，出乎大臣们的意料，大学士们只好重新做出安排，改由皇太
后率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三次，朱厚熜感到名正言
顺后，才于中午时分起身，自大明门进入宫中。他先是派官员代
表去祭告宗庙、社稷，然后谒拜列祖神位，然后去问候皇太后。
即位典礼当日就在奉天殿举行，朱厚熜为自己选择的年号是嘉
靖，意在平乱求治，力除弊政，繁荣帝国。

世宗年龄不大，不乏求治之心。他在安陆管理弹丸大的封
地，积累了一些统治经验。朱厚照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
交困，百废待兴，人心极不稳定。他明白治理朝政需要的是什
么，由此他赏识和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世宗对武宗时
期的弊政进行了一番改革：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钱宁，将太
监谷大用、邱聚降职去司守孝陵，迫使太监魏彬、张永交出权力
闲住；两次裁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共 18 万余
人；提拔了一些正直官员，委以重任；放走内苑的珍禽异兽，明令各

地不许再献；减少漕粮 1532000 石。对即位之前杨廷和调边军还镇、关闭不成体统的皇店、送还全国进献美女等举动，给予了肯定。当杨廷和因为从宫中驱逐朱厚照的义子、裁汰冗员引起失职之徒的仇恨，扬言要报复时，世宗的反应极其迅速，下令调拨了百余名军士，日夜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元年十月，有大臣上疏，指出宦官出镇不足取，说他们平日里安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极不可靠。世宗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不久就下诏将派驻在各州府的宦官召回京城，并且一直没有复派，时间长达 40 余年。在不长的时间里，世宗以世人眼花缭乱的果敢举动，显示了他的威仪，缓和了社会矛盾，天下臣民盛称新天子圣明，歌颂杨廷和功高，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持续到嘉靖元年（1522）。

世宗是因明武宗朱厚照无子，兄终弟及，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樞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世宗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问题的核心就是当皇帝后还能不能承认生父为父亲，如果能，按封建礼制，就有套礼仪问题。世宗的本意，当然是要尊奉生父。在即位典礼后的第 5 天，为了给死去的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世宗下诏给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廷和恪守礼法，认为世宗既是以宗藩入统，就应称孝宗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他让礼部尚书毛澄将这个意见告诉世宗，并用坚决的口吻对左右的人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世宗对“移易”父母非常不满，要求重议，但因群臣的反对，加上他的皇位还不巩固，只能搁下。但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世宗的母亲蒋氏。大约过了 4 个月，蒋氏自安陆进京，听到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大发脾气，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受职为官，父

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那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完即停在通州，不肯再走。世宗闻报，哭着入禀张太后，说：“您另选别人作皇帝好了，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安陆，仍旧作献王。”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奈，只好代世宗草敕下礼部，尊朱祐杬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奏报送上，世宗不待瞧毕就掷还，礼官又建议改进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悻，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决定后，才继续前进。蒋氏进京后，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授意吏部将迎合世宗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跟随自己发表“兴献王不宜称考”意见的官员，安排到吏部和工部。世宗对此没有干预，但他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可惜的是与杨廷和的这场分歧，在世宗心里留下了芥蒂，他由此开始排挤、削弱反对派官员。

到了嘉靖三年（1524）正月，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世宗立足已稳，揣测帝意，又上书重提旧案，要求“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世宗见到疏奏，连连点头，叹赏说：“此疏太重要了，天理纲常，要仗它来维持了。”下诏廷臣集议。杨廷和见他故态复萌，料自己也无回天之力，决意辞职，与他一同要求辞职的，还有礼部尚书毛澄。世宗在辞呈上写了“听之去”三个字，言官们向他请求留下二人，世宗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最后杨廷和为此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去职后，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世宗再不肯放过这一机

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将兴献帝改为兴献皇帝仍不罢休，又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官复原职。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礼仪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世宗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世宗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世宗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世宗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世宗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本生’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世宗看后急召二人火速入京。二人入京后立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世宗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世宗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宝。朝臣们从世宗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当下得到许多大臣赞同，他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 237 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世宗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 8 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世宗愈发恼怒，又指使厂卫抓了 134 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 16 人因受刑过重，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世宗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

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内，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三年、震动朝野的“礼仪”一案以世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自此世宗动辄就将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自此正直之士缄口，而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顺世宗而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从此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世宗始料不及的。

二、迷信僧道 纵欲宫变

嘉靖二年（1523）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世宗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瞰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避祸。世宗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 20 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自此皇宫内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世宗停止建醮，远离僧道，但世宗先是置若罔闻，后是疏远他们，对其他劝阻的职位较低官员则分别给予处罚。在杨廷和等一批重臣被罢免后，世宗崇奉僧道更是肆无忌惮，尤其

登位几年后更是一心只想长寿，从此终日礼佛拜道，而将朝政几乎全部搁到一边。

嘉靖三年冬，世宗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世宗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满朝之中，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十八年（1539）邵元节病死，世宗这时正在安陆谒墓，听到这一消息，哀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及锦衣卫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世宗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教唆世宗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三百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世宗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世宗信奉道教，努力尝试各种成仙之术，自我感觉不错，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并没有遵循道家“清心寡欲”的教规，而是频频派人到民间挑选淑女，为数超过数千。进宫的女子兼有供他淫乐和奴婢的双重身份，备受欺凌侮辱。于是，爆发了一起宫女造反的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世宗在

端妃处寻欢作乐，过后精神不支，倒头大睡。趁端妃不在的当儿，宫女杨金英招呼了十几个姐妹，一涌而上，一个人用黄绫抹布蒙住他的脸，余下的将他捺住。然后，杨金英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各执一端，使劲地拉。但杨金英在结绳时误拴成死扣，因此几个宫女勒了半天只是把他勒昏，并没勒死。皇后方氏得到消息带了太监火急赶到，从宫女手中抢出了他。造反的宫女第二天就被处死，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因受牵涉，也在宫中被处死。

宫婢造反给世宗敲了一记警钟，不过他并未觉悟，甚至认为大难不死也是尊崇天神的结果。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并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们见面。满朝文武，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位皇帝罢了。

三、宠信严嵩 靖边无方

严嵩本是礼部右侍郎，嘉靖七年曾奉世宗之命去安陆祭告兴献帝陵墓，事毕献媚说：“我走了一路，先祖家乡处处应时细雨霏霏，当载神主的船过河时，连河水都陡然高涨，真是天意啊。”世宗因此对他很赏识。这以后严嵩一边巴结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一边又在世宗面前讲夏言的坏话，终于博得了世宗对他的充分信任，渐渐地铺平了进入内阁的道路。

严嵩入阁前，大权由夏言执掌，夏言得宠的原因是由于祭醮青词写得好，祷祀的事情肯卖力气。但是夏言以后逐渐厌倦此事，并时有抵忤，世宗对此甚为不满。如世宗常常戴香叶道冠，

打扮成道士模样，还命人刻制了五顶香冠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位大臣。夏言不肯戴，还对他密疏讽劝，而严嵩则在世宗召对时，每每戴上，世宗自然更对夏言不满。世宗经常派太监到大臣府邸宣诏达事，夏言自恃位高，说话从不客气，待之如奴仆，严嵩则必捡手请坐，塞给来人黄金若干，于是这些人回来后争着向世宗说严嵩的好话。世宗觉着这样还不能说明两人的高下，又专门派人趁晚上到两人家里察看，结果发觉夏言往往是在家中睡觉，而严嵩却在灯下审看自己写的青词。世宗几次将两人送来的青词做了比较，发现夏言的多为僚属代写，有时还把用过的又拿来充数，而严嵩写的却越来越精彩。世宗心里有了底数，对夏言的印象直落千丈。他多次将夏言送入西苑的青词掷于地上，愤愤地说：“你就用这种玩艺来胡弄我，真是有负我的重用！”有负重用的人自然不能久留，嘉靖二十三年（1544）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到嘉靖二十五年，在严嵩的挑拨下，夏言最终被砍了头。

世宗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而是赏识严嵩的顺从。世宗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世宗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世宗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让他如意。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蒙古强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京师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

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世宗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以前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才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拼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世宗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而是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世宗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世宗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不知明朝中虚实，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以后俺答蒙古又曾两次兵临京师城下，纵兵饱掠，世宗仍是听之任之，使京郊百姓饱受兵燹之苦。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

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浪人。日本在明初恰是诸侯争战时期，藩侯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朝廷的畏惧之心，已一扫无余。世宗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被沿海官吏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不同的是他们有的依靠“浪人”组成武装走私集团，能贸易就贸易，有机会就无本万利的大肆抢劫一把。还有的与中国沿海的奸徒勾结，抢掠地方大发横财。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世宗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世宗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任后，向世宗提出了七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视，以求平安。”世宗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

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世宗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世宗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世宗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世宗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赵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世宗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的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

为福建总兵官，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首 2200”。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 2 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四、罢除奸相 热衷祥瑞

沿海一带战事频仍、在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朝廷中无形的战场也在大力厮杀，血腥味十足。首辅严嵩虽然手段高明，掌权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最终败给了徐阶。徐阶也以善于炮制青词见长，世宗对他比较信任。由于夏言生前曾向世宗推荐过徐阶，严嵩对此人十分警惕。徐阶觉出了这一危险，耍了一个手腕，对严嵩假意逢迎，不露半点锋芒。时间久了，严嵩也就麻痹大意，不再事事监视这个潜在的敌手，让他顺利地升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职务高了，自然与世宗接触也多了，因此，有可能对他加以影响。

世宗对严嵩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严嵩掌权之时，正是“南倭北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俺答的进攻，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四十二年，京师出现过 3 次戒严，倭寇的骚扰则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国家财政日益危机。嘉靖二十三年（1544）户部报告：财政

赤字达 147 万两，三十二年（1553）赤字又上升到 373 万两。这个责任，首辅是不可推却的。另外，严嵩的淫威能让朝臣侧目，却缄不住道士之口。有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很博世宗喜欢，信以为神。一日，召道士扶乩，卜问神仙是否会降临，又问长生的诀窍，道士用乩笔胡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等。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乩笔写出严嵩是妨贤的大蠹，大蠹不除，何以有贤？世宗不相信，又问：“真如上仙讲的那样，何不降灾诛之？”道士又写：“留待皇帝正法。”世宗不便再问，内心微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妻欧阳氏病死了，按理应由其子严世藩护丧归故，可严嵩却一日离不开他，此时严嵩已 80 有余，记忆和反映都很成问题，皇上的御札，还有诸司的请裁，如果没有严世藩替他奏答、批改，则不可想象。于是，他硬起头皮向世宗请求将严世藩留京“侍养”自己，以孙子代替，世宗表示同意。严世藩平日里就好声色犬马，其母管束颇严，不敢放肆。母亲既已去世，正好寻欢作乐，门面上孝服在身，内庭里却红颜留连，关起门来尽意胡闹。严嵩在西苑值日，世宗有时下旨问事情，严嵩就派人飞马告世藩拿主意。世藩只顾与侍姬调笑滥饮，哪有心思管这些，见有来札，草草应答，马虎了事。世宗看了，多不如意。一些急要的御札，太监就在值房立取，严嵩无奈，只好硬撑着应对，往往语意模糊，前后矛盾百出，世宗看了，则大惑不解。在世宗的眼里，从前那善解人意、巧写青词的严嵩已不复存在了。

也就在这一年，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不得已移居到玉熙殿去住。玉熙殿又小又矮，世宗住不下去，就想再营建永寿

宫。他把严嵩找来，询问意见。严嵩不摸底细，说可以暂居南城离宫。南城宫是英宗失帝位时住的地方，世宗因此而不高兴。又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则请修永寿宫。不久永寿宫就拔地而起，且比原先愈发漂亮，改名万寿宫。万寿宫的营造，标志着严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此，世宗遇事就不再找严嵩了。

严嵩已经失宠，朝廷中想要扳倒严嵩的官员们就加紧行动起来。有一次天下大雨，御史邹应龙就便到一个太监家中躲避，两人闲聊之中，太监不觉提到了蓝道行的乱言以及皇上对严嵩的种种不满。邹应龙摸到底细，写了一个奏文弹劾严嵩父子，次日就送了上去。世宗展开来看，大抵是弹劾严世藩假父亲权势，贪赃枉法，干乱朝政，不敬不孝，等等，连带着也奏严嵩溺子之过，疏奏最后写道“如有不实之辞，宁愿被斩首以谢严家父子。”世宗读罢奏疏，即召徐阶商议如何处理。徐阶将左右的宦官赶走，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严家父子罪恶昭彰，陛下要果断处置，不然可能发生事变。”世宗于是发锦衣卫驰入严府，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回乡，并逮严世藩入狱，其后谪戍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严嵩布在朝中的心腹，尽被弹劾，陆陆续续被罢了官职。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代为首辅。世宗将严嵩值班用的房子赐给了徐阶。徐阶对世宗感恩不尽，研墨挥毫写了三句话，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值房里面：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刑赏还公论。他依照这三句话主持政务，做了一些好事，使嘉靖一朝在最后的5年里稍许有点象样，朝臣们推他为“名相”。世宗对他感到很满意，其信任程度，超过了严嵩。

世宗自嘉靖中年之后，于热衷方土方术的同时，又添了新的喜好，就是喜欢谈瑞祥。他的这一喜好，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

乐此不倦。嘉靖三十七年（1558），总督浙闽的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受到内阁的指责，就将在舟山捕获的一只白鹿，献给世宗。世宗见此转怒为喜，在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百官也都纷纷称贺。胡宗宪听到消息，又将两只白龟献进宫来，还一同带来了5棵奇大无比的灵芝，世宗高兴地将这两样东西命名为“玉龟仙芝”。做为回报，他给胡宗宪提拔了官职，赐给若干银币，并赐金鹤衣一裘。献瑞祥既可讨好，百官何乐不为？

世宗醉心于瑞祥感应，晚年尤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动辄表贺，举朝重臣包括徐阶皆莫敢言半个“不”字。倒是小小户部主事海瑞，斗胆独自上了一疏，给世宗泼了一记凉水。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上长疏建言，说：“陛下竭民脂膏，滥修土木，20余年不视朝，法纪坏到了顶点。由于你猜疑戮辱忠臣，使得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困苦之极。虽然陛下处置了严嵩等坏人，但社会政治仍然不清明，老百姓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意思是民穷财尽。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天下？……人君自古就有犯错误的，但因有大臣匡正，不至一错再错。陛下如今仍修斋建醮，工部尽力经营，户部四处购香，竟无人指出陛下的错误，这也是大臣的失职。陛下的过错很多，其最大的在于求长生。陛下跟陶仲文求仙，连他都不能长生，何况陛下。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海瑞上疏之后，自知触忤了龙颜，命仆人买了棺材在家待罪，与妻儿留下遗言，并将僮仆一一遣散。世宗见到疏奏，大发雷霆，他将疏奏扔在地上，环顾左右咆哮说：“此人大胆妄言，立即逮捕，不准他逃掉！”宦官黄锦对他说，海瑞为人素有直名，且根本不打算逃走，而是在家等候降罪。世宗听完略有所思，又取疏奏看了一遍。怒气稍平后，

他把徐阶找来，说：“海瑞说人不能长生，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我长时间生病，不能视事，吃点仙药有什么不可以？”又说：“这也怪我平时不注意爱惜身体，若能出御上殿，何至被他如此毁谤呢？！”徐阶答道：“海瑞虽然言过了，但心是好的，请陛下宽恕他吧。”世宗这时也不愿意多杀谏臣，命徐阶将海瑞下到诏狱，虽不治罪，但也不准放出，让其在狱中反省自责。世宗一生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许多大臣，其中既有奸臣，也有孤直之士，对海瑞的惩罚，是他晚年在用人上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世宗服食的丹药，有不少是用水银制成的剧毒品，吃下去之后，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世宗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的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脸上呈暗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大臣们见到他，莫不从内心替他感到担忧，特别是徐阶。为了让方士们有所收敛，徐阶动用权力，杀掉了向世宗提供剧毒丹药的方士蓝田玉，并力劝世宗不要服食水银。世宗对徐阶没有责备，但也没听徐阶的苦劝。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陕西方士王金等人，伪造了《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与炮制的金石药一起献给世宗。这些药成份不明，世宗吃下之后，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鼻孔中流出鲜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经太医的救治，世宗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一直卧床不起。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世宗突然变得精神饱满起来，周身不再觉得疼痛。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徐阶，感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将他从西苑搬出，抬回乾清宫。没有多久，世宗就咽了气，时年 60 岁。

世宗的陵墓称永陵，跟他前面的几个明代皇帝一样，选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庙号为“世宗”。

穆宗朱载堉

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堉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急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30岁的父亲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神采飞扬，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受，便给他取名载堉。“载”是他的排行辈份，“堉”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载堉在世宗服丹药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一、艰难登极 难驭权臣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30岁的朱载堉衮冕加身坐在皇帝宝座上，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三跪九叩，登基大典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堉心中顿生

波澜，一种“天命在我”的神圣由感而来。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堉、三子载坫、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分别册封载堉为太子，载坫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堉嘉靖二十八年（1549）死后，太子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顺利。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听后索性不再立太子。这给景王提供了可乘之机。载圳依靠母亲受宠的条件，走动内宫，争立太子的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偏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坫也相当冷淡。就连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大量拖欠。载坫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藩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坫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藩问裕王侍读官高拱、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是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

夺嫡的运筹。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徐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载圳病死于封地，载堉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载堉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堉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堉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堉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遗诏”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1567）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经过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气象。

群臣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穆宗一方面为之欣喜！可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宫廷政治中的倾轧相残。坐稳皇帝宝座后，穆宗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他为此先做了一番布置。和历代皇帝一样，穆宗先是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

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国子监）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做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来不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

同乡，一定是受了徐阶指使。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一腔怨恨，他要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罢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分。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理应参加。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同样受到了徐阶冷落的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一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以缄其口。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如参劾不倒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高拱的要求有据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

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将矛头一齐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朝臣利用言官互相攻击时有发生。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深感厌倦。

二、和议蒙古 巩固边防

隆庆元年（1567）九月，内阁的徐、高之争风潮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又发作起来。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扫荡了大同，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虏掠河北昌黎，直至滦河。左右夹攻，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严，敌情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略。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三位抗倭名将，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抵抗蒙古来犯。这个主张得到徐阶、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很快得到穆宗的批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不久又被委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

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同时，几位名将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戚继光为例，他走马上任立即布置加强防务。一是沿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 1200 座。这种 5 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眺望，台壁坚固，台内分三层，驻扎 100 名战士，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既得处战地要害之机，去长途奔袭之苦，又可长期坚守，互相呼应。二是组建战车营。这种战车每辆用 4 人推进，作战时排成方阵，外层设拒马，可抵御骑兵冲锋。自己的步、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一旦敌人溃退，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作了区分：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经过这一番精明调遣和严格训练，京师大门的防卫确实达到了军容严整，士气大增的要求。

与此同时，朝廷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将领，要抓住时机与蒙古贵族建立缓和。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执行了朝廷的谋略，创造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他一再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宣传，广泛联系，并一再发表文告，宣布凡是从境外来投奔的平民和军人，都将受到安置接待。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从蒙古地区来投奔的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1507）十月，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跑来了。这个青年的行动，成为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对此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遗孤。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成人。后来俺答夫妇为他娶了比吉为妻。婚后小夫妻的感情不太融洽，把汉那吉又爱上了姑姑的女儿三娘子，把她也娶了。正当把汉那吉陶醉于甜蜜缠绵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他羞恨欲绝的变故——俺答也爱上了自己美貌的外孙女三娘子，并把她夺了去。这在当时，原是可以被蒙古风俗接受的事。可把汉那吉实在忍受不下这种羞辱，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比吉、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十余人弃家南奔，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

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此事。王崇古与方逢时商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把汉那吉来投，实质上成为明朝要挟俺答的人质。于是，王崇古指示方逢时派出 500 骑士的仪仗队，隆重地把这个失恋青年迎进大同巡抚衙门，奉为上宾安置下来。

把汉那吉来降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朝廷内的激烈辩论。有人主张不受降。他们引证宋代接受郭药师、张穀投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认为应将把汉那吉送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战争。还有人提出，收容生祸，不如全部杀掉，以绝后患。而主张接纳的一派也振振有词。双方针锋相对，争持不下。穆宗在权衡全局利弊之后，采纳了接纳派意见，向汉蒙言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把汉那吉南奔之后，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依克哈屯昼夜啼哭，并派人报信给正与吐蕃作战的俺答。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子的爱人，但他疼爱孙子的心并没有变，他也经不起依克哈屯的哭泣，便立刻率大军向长城袭来，要索回自己的孙子，整个北部边境立

刻紧张起来。

兵临城下，朝野震动，不仅反对派认为“接纳”引起了祸患，就是中间派也认为捅了乱子。如果穆宗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就会前功尽弃。幸而穆宗不是朝令夕改的优柔寡断之君，他继续给接纳派以坚决的支持。在皇帝的庇护下，张居正、王崇古等接纳派不改初衷，在坚守备战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俺答的攻心战。

俺答虽然来势汹汹，但他清楚地知道，隆庆以来长城边防正在逐日加强，明军实力已非昔日可比，此次进攻并没有决胜的把握。俺答正在犹豫之时，明朝使者告诉俺答，明朝出以诚心，厚礼接待把汉那吉。并不是明朝引诱把汉那吉，而是他厌恶陋俗，仰慕中原文化，自愿来降的。按照明朝的法律，斩获敌人首领及其子孙头颅者可以赏万金，封爵位。我们并非不能斩首请功，但为双方友好没有这样做。如果您要接他回去，理应好言好语商量。您现在恩将仇报，举兵要挟，难道我们的将帅会害怕您吗！一旦战争爆发，必然加速把汉那吉的死亡，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呢？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使者的一席话打动了俺答。他为讨还孙子而来，怎么会置他于死地呢！他立即派使者打听孙子的消息。使者在大同看到了把汉那吉容光焕发，绯袍金带的神气样子放了心，俺答闻讯也放了心。对使者鲍崇德说：我是不愿与朝廷为敌的，过去的战事都是汉奸赵全挑唆的结果。如果皇上能封我为蒙古王，统率蒙古各部，我哪里敢继续作乱呢。即使我死了，我的孙子受朝廷衣食优待之恩，更不会背叛朝廷，但愿朝廷能明白我的心意，允许我们进贡称臣，开放边境贸易，使蒙汉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呵！明王朝答应了其要求。俺答立即吩咐手下人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

等十几个汉奸捆起来，送到明军大营。

穆宗得到俺答言和献俘的消息，大喜过望。赵全勾结俺答 20 多年来屡次进犯，京师数度危急，是朝廷的心头之患。今天俺答称臣，奸人就擒是自己圣明决断的结果。他决定一定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来庆祝这一胜利。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穆宗亲自在皇宫午门楼主持受俘仪式，接着又大张旗鼓地行祭天、告太庙之礼，向祖宗显示自己的赫赫功绩。

在一派光宗耀祖的胜利气氛中，穆宗乘兴传旨：用最优厚的礼节护送把汉那吉回蒙古。把汉那吉奉旨感激不尽，依依不舍地跟王崇古等人洒泪告别。他身穿明朝赏赐的红袍回到了俺答的帐幕。俺答和依克哈屯看到孙子神采飞扬的高兴样子，百感交集，一齐流下兴奋的眼泪。俺答立即向穆宗上表称谢，从此，俺答和明朝结束了战争关系，打开了和平友好相处的大门。

隆庆和议，是明朝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最成功的一例，也是穆宗一朝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三、心在后宫 纵情声色

穆宗登位之初即打定主意，要当天下之主，而不是管家；要享主人的权威富贵，而不必付管家的操心经营之力。不是灾祸临头，无路可走，他是不甘心把时光用在治国上的。他认为他有的是卓越干练的大臣，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地去操那份心呢？

穆宗的心思被善于察颜观色的太监们摸得一清二楚。掌司礼监大权的几位大太监滕祥、孟冲、陈洪乘机诱导穆宗玩乐，博得其欢心，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初，穆宗未即位时处境微妙，

自己也处处小心，玩好之心一直被压抑着，不敢有稍微的放肆。如今，一切顾忌都没有了，那能不加倍地补偿呢！滕祥等人要为他造宫殿，搭秋千，他欣喜得意；要陪他游玩射猎，他乐不可支。隆庆二年（1568）元宵节之夜，太监们在宫中张挂了成千上万的花灯。入夜，偌大皇宫彩灯齐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穆宗高兴得赞不绝口，平时太监们精心安排了无数酒宴，变幻无穷的山珍海味，妖艳妩媚宫女陪酒歌舞，使正逢壮年的穆宗需要的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宫里玩腻了，太监们就陪他出城游玩。隆庆二年夏天，太监们告诉穆宗南海子如何杨柳清风，荷花掩映，无穷景致，勾起他游兴大发。太监们马上传令赶造龙凤舰，安排出游的巨细事项。

游幸南海子的计划，遭到以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皇帝玩好之心日盛，为宦官所操纵，迟早累及国家，于是一次接一次地上疏劝谏。吏科给事中石星的奏章写道：我看陛下陷入通宵酒宴之中，纵情声色，朝廷大事不过问了，几个太监作威作福，天下如此便不可救药了。我请陛下注意6件事：一是养精蓄锐，保重身体；二是学习经典，效法圣贤；三是经常上朝，接见大臣；四是尽快批复臣子奏章；五是广开言路；六是明察秋毫，不近奸佞。石星的意见很中肯，却不对穆宗的心思。太监一挑拨，穆宗大发肝火，命令给石星廷杖六十，罢官为民的处分。石星被架上来，监督行刑的，正是大太监滕祥。他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命令狠打。⁶⁰ 大板打完，石星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消息很快传出宫外，石星的妻子郑氏误以为丈夫被打死，悲恸至极，一头撞到柱子上气绝身亡。京师官员百姓闻讯没有不难过的。不久，多次劝阻穆宗游南海子的内阁首辅徐阶失宠。太监们

乘机说了徐阶不少坏话，穆宗烦恼之中就打发他回家养老去了。自此之后，他纵情声色更是无人敢于拦阻了。但只经短短几年时间，本来身体强健的穆宗由于纵欲享乐耗尽了精力。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五日，穆宗正在坐朝，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不断地歪动，显然是中风了。司礼太监冯保和大学士张居正连忙赶上扶住。文武百官目瞪口呆，一派诚惶诚恐。穆宗被扶入乾清宫。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随即被宣入宫。只见穆宗斜倚在御榻上，已奄奄一息。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穆宗命冯保宣读诏书，命死后太子继位，期望三人能尽心辅佐。高拱等人泪流满面，叩头谢恩。第二天，36岁的穆宗皇帝就死去了。

神宗朱翊钧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堉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朱载堉的十岁太子朱翊钧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朱翊钧是明代 21 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权力的巨辇奔忙了 48 年。从而使早已衰败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一、严督学习 贤臣柄政

万历是穆宗朱载堉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其母为宫女李氏。李氏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谋略，而万历前边有两个哥哥均早死，因此万历成为了独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宠爱。万历 5 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万历是位早慧的皇子。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

便正式册立。而事实上万历也的确聪明慧敏。

上学不久，每当李贵妃带儿子给皇后请安时，皇后经常取经书来，将学过的内容逐段逐句考问。万历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张居正是万历的师保，对万历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万历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万历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及国子监官员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是讲官和内阁学士的日常讲学。那时，万历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书》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 81 件，应警戒的恶事 36 件，汇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形象地使万历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 40 本书让万历阅读。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万历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万历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万历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万历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万历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1573—1582），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 10 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 400 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万历的“治

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使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开始，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减少开支。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1581年），土地丈量完毕，共

查实田地 700 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 300 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 4 点：（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在蓟州一带，张居正继续重用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戚继光镇守蓟州 16 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为害边境的建州卫部落，斩都指挥王杲以下 1100 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辽东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对军事上的这些改革、特别是选用将领，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万历也十分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1582）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六月，张居正去世。万历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大明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万历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造成了说不尽的是非恩

怨。

事情起因于冯保被逐。早些年，冯保曾将极受万历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万历对此十分难过，所以就恨造成这一事端的冯保和张居正。张诚拜辞时，万历暗中交待他离宫后要留意探明冯、张二人的劣迹。冯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张居正，人虽能干，政务上也很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廉洁自好，招权树党、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有资产等等，也是有的。这一切，都被张诚探了个清清楚楚。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进宫，便尽其所知一一陈奏，同时，建议万历先由冯保开刀，将其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这次对冯保的查抄，万历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

冯保被抄后，万历受更大贪欲的驱使，决心通过清算张居正，一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敛聚些钱财。这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14条罪状，万历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万历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文忠公谥，并革去其两子的官职。查抄钦差到达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荆州知府、江陵知县，将张家人口赶到空房子里看守。等到钦差等人到时，张家被锁的人饿死的已有十多口。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富。钦差感到不好向万历交待，十分恼怒，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财产。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若，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敬修投环自

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申时行、潘季驯等内阁和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万历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万历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二、沉溺酒色 不理朝政

万历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宫女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牢记自己儿时在后母严教下的寒窗苦读，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紧紧地束缚了他。他亲掌权柄后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万历最有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万历的最大影响，是他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摩万历的心理。万历亲政之初，言官因

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万历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万历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静。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万历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万历到了 20 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万历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万历听后感到的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万历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万历能明察猛省。万历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

恐招致物议，劝说万历令其归家为好。万历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万历索性把不理朝政公开化，自万历十八年（1590）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二十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就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万历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有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万历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察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赆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

之望。”对这次奏疏，万历却十分反感，他虽然照例不理睬，但也深知问题的确是相当严重。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三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1612）时，内阁仅叶向高一，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土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万历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万历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 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1583）。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万历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墓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

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万历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万历不再过多地关心身后而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万历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万历给掏空了。这时万历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万历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

但那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万历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万历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万历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万历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折磨处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万历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全国共有20处，专门奉行万历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是，遍及160多个州县。他们多设关卡，巧立名目，税收的数额自然就大。据说最初，他们倒是有过设想，征税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进行。但后来觉得太累太麻烦，

干脆“税不必商”，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这160多个州县，每年征税银数以千万计。有人形容那情景真是似蝗灾，税使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矿监比起来，税使还显得有点心慈手软，矿监们最要命的是凶横。他们名为开矿增加税收，其实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搞什么勘探，再组织力量开采，而是像指鹿为马那样，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笔，就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灾祸临头，有金银珠玉献上的还罢，若是没有，矿监便指使卒役们强行拆房毁屋，掘地翻圃，抢掠家产，甚至借机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这种明火执仗掠夺来的财宝，上缴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万历和矿监们，所以万历十分喜爱并偏袒他们。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万历于劳顿之后，忽然感到满身不舒服，随即病状越来越重。荒淫无度的万历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突然想到应弥补前愆。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和大学士沈一贯到启祥宫西暖阁。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说，“矿税的事，是朕因为宫殿建筑迟迟未了，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内监都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给事中、各衙门缺官的，一律补齐。”说完，就疲乏地躺下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当夜，阁臣和九卿都兴奋地留宿朝房，准备早朝一见圣旨立即执行。这喜讯也早早地就在朝廷内外传扬了开来。凌晨早

朝时中使捧万历手谕来到大臣们中间，果然如此，于是更是皆大欢喜。

但是人们发现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早朝刚开始不久，就又有中使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奉命要收回前边的诏旨。沈一贯和其他大臣们都很诧异，细一打听，才知是天傍亮时，万历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万历头脑清爽了之后，记起刚刚颁过的诏旨，后悔不迭。原来是感到必死无疑，才信口胡言，想死后捞个好名声，现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矿税，断了财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吗？于是就不顾金口玉牙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内阁索取前诏。当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万历身边，就劝谏道，“皇上说过的话岂可反悔！”劝他不要那么做。结果惹得万历大怒，口里嚷嚷着，一定要用刀砍死王义。同时派中使一拨接一拨，急如星火地来了二十多拨，反复传达万历的口谕，说是矿税万不能停，别的你们看着办吧！中使们还威胁说，惹火了皇帝要砍沈一贯的头。沈一贯被逼无奈，只好交出前诏。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第一句话就是埋怨说：“你要是再坚持一下，那矿税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贯也万万没有料到，就因他这一下没有顶住，采权之祸终万历一朝都没能废去。

三、立储纷争 朝党火并

万历六年八月，万历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万历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万历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怀上了孩子。此后，万历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谁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这事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 she 就把万历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万历矢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万历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反映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份。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万历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1586），包括万历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份、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常洵的生母，是最受万历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万历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1583）晋为贵妃。郑氏给了万历无微不至的关

怀，还鼓励万历亲政，被万历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万历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做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远不止封谁不封谁，而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朱翊钧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万历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万历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万历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

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万历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万历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二十，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万历被持续十五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万历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1594），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同胞弟顾

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中的许多官僚士大夫，也因为赞同他们的主张，而参加他们的党派活动。久而久之，东林书院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顾宪成一班人也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而被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入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万历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楚党”、“齐党”，以及“昆（江苏昆山）党”、“宣（安徽宣城）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品行，分别给予升降、罢官等奖惩，凡因此被罢官的，终身不再启用。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1506），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

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万历，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对于这一切，万历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

四、民情激变 边疆不宁

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朱翊钧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尤其在武昌地区，竟然公开强奸民女，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1601），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著名丝织业城市苏州的数以千计手工业丝织工人，被税使孙隆压榨勒索得纷纷失业，加上当地又发生水灾，生计十分困难。六月初三日，织工葛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头暴动，高喊：“宁可拼死，不

杀恶棍，不逐孙隆，誓不罢休！”市民们闻风响应，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6队，每队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向税署冲击，中途参加的群众不计其数。暴动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包围了孙隆衙署后，用乱石打死他的随从黄建节，将抓住的其他五、六个爪牙，捆绑手足，投进河里，并将恶棍汤莘的家放火烧毁。孙隆吓得丧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墙逃脱。万历三十年（1602）后，城乡人民和前线军兵的反抗斗争日益增多。那时候，江西上饶、景德镇，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民众暴动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万历手里，而几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因万历知道兵部自会依律派兵镇压，他也比别人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其实是他自己。那恶名远播的“采权”，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将大明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更为直接的威胁，却来自万历最初一无所知、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始觉骇然的北部边陲。这一年，早就窥视大明江山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于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历史上称为后金。他本人被贝勒、大臣们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从此，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其为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这一年的春天与以往没什么两样，御花园里照旧桃红柳绿。庸懒倦怠的万历，仍然不觉大祸将至，对边将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抚顺被努尔哈赤攻克，守城将士战死上万人，告急的羽书，一天数十次地传来，万历这才着了慌，并下决心要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第二年二月，万历命兵部调集

了近9万人的兵力，连同1.3万多朝鲜兵，约计10余万人，号称47万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然而户部却疏告兵饷缺300万两银子，请求从大内存银中调拨。当时的大内银库，每年增加金花银120万两，所以内币十分充足。但是，万历向来都是视内库为己库的，自己掏钱用来给国家去打仗，这在一个小商人看来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无奈，户部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请求拨款百呼不应，但建议加派却朝奏夕可。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请增加赋税，九月，万历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3.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军反击，急需军饷为由，又决定每亩再增征3.5厘。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竟决定再次追加，每亩增征银2厘。这样，三年三增，因此成为岁额，累计每亩净增已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额为520万余两。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底，明军终于调集到辽东前线，然后兵分四路合围努尔哈赤主力。努尔哈赤采用诱敌深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只几个回合下来，打得明军损兵4.6万余人，折将300余员，被迫撤出辽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年，后金兵又攻取开原、铁岭等地。十万铁蹄踏过辽东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边墙。

万历被深深地震动了。萨尔浒的失利，将亡国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万历面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凄凉。不久，就

染上病症。拖了一年多，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的病情突然加重，半个多月不思饮食。他深知将一病不起，便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和各部尚书等人到弘德殿，托付他们勤于职守，辅佐常洛。二十一日，万历以 58 岁未老之身，一命归天。此后不久，被召诸臣出示万历遗诏，大意是说，“因为有病，朕多年来只顾静养，很少赴郊庙早朝，奏疏多为留中，官员缺了不补，加上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搞得民生艰难、内外交困，日思夜想，不胜追悔，刚想改革，却一病不起，只好有赖后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然而，这一切无论是死后钓誉，还是真心感悟，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身后仅第 7 年（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灾民暴动，就揭开了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光宗朱常洛

光宗是明王朝第十四个皇帝，为宫女于万历九年所生，在位仅一个月，是明王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死后葬于庆陵。

一、偶然得生 侥幸得立

万历九年（1581），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它对朱常洛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时刻，才衍生了他以及他近 40 年莫可名状的荣辱悲欢。

对这个时刻的到来，他那当时年仅 16 岁的生母王氏毫无精神准备。那时她是慈宁宫里侍奉皇太后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宫女，18 岁的神宗常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未对她特别注意。但是这一天，神宗却不知怎么要洗手，王氏就端过一盆水凑近皇上，于是被临幸。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借神宗陪宴的机会，问起这件事。谁知，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这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神宗一时面红耳赤，只好承认确有那么一次冲动。太后趁机安慰说：“我老了，还没见过孙子。这次若生个皇子，也是宗社的福份。”神宗无话可说，便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按照明王朝有关宫廷规矩，如皇帝不承认宫女的身孕与自己有关，轻者宫女腹中的孩子得打掉，重者宫女就得丧命。因此万历如果一念之差就是不承认，或不是皇太后有心，朱常洛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朱常洛在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出生，便有了皇长子的名份。那时，神宗虽有王皇后和刘昭妃，终因二人都终生不生养而无子嗣，常洛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皇太后面前格外得宠。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1586）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极受神宗的宠幸，因此，常洵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办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有些大臣怕“子以母贵”，神宗会“废长立爱”，因此就上奏要求早立太子，而一批揣摩神宗意思，成为郑贵妃朋党的就极力阻挠，因此朝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神宗对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请求十分反感。于是上疏的大臣大多因此获罪被贬。然而，能左右万历的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

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吃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才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

但他采用拖计，不反对立长子可就是不立，名义上是皇后还年轻，还有可能生出嫡子。

到了万历二十年，嫡皇子还未出生，朱常洛已 11 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不过，万历二十年的预教之请很快就被神宗扑灭了。他抓住礼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所进的疏请将弘治年号写错了这一小节，痛斥其欺君罔上，同时，株连贬斥了大学士赵志皋、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 11 个人，使满朝文武惊骇感叹不已。

但大臣们仍不甘心，仍有不少人拚死上书，加上朱常洛确实也该启蒙教育了，因此神宗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不得不下令举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上学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 9 点到 11 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 3 点到 5 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

董其昌问：“如何理解‘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不轻用民力’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立长”的正确；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为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的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羞涩。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里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才下令，在辍讲已经十一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待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饌。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处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

(1611) 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自己的儿子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傍晚，紫禁城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隐隐地还有一抹夕阳的余辉。常洛已用过晚膳。明天是端午节，宫中这阵子正为节日用度做准备，他闲着无聊，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并押送到驻守东华门

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由于案子牵扯到了郑贵妃的两个内侍，庞保、刘成，所以举朝上下，议论汹汹，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大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忌恨，却没料到这忌恨竟到了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他忿忿然。不过他清楚，也仅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唯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地出卖她。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副样子，十分惊恐，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在辍朝 25 年之后亲自出面了断此案。五月二十九日神宗下令，凶手处死；十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挺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

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令大为增加。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知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八名最美的送给常洛。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要补足 30 多年亏空之势。

二、登极治国 红丸丧命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熬到二十一日，终于一命归西。

泰昌（朱常洛的年号）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当上了大明皇帝。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竟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在当太子期间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的还是清楚的，因此上台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是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樵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三

宫’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它用。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之，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祚等四个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 33 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大的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常洛矫枉过正，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一下病倒。第二天，是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到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第，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急召内阁首辅方从哲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

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中使宣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常洛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服药之初，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入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0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演绎起来。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那时，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日久的常洛，是断不该用的。常洛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追魂断命的劫剂。所以，就有说人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由此引起已有衰歇之象的党争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三案”中最后一案“移宫案”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才不了了之。

熹宗朱由校

明天启七年，一生喜好玩乐，将明王朝元气耗尽的熹宗朱由校死去，死后被谥为愍皇帝，庙号“熹宗”，葬于德陵。

一、闯宫立帝 东林治政

朱由校的父亲光宗朱常洛不为其父神宗所喜。虽为皇长子，但长期遭受歧视，直到 20 岁才勉强被立为东宫太子。

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深夜，选侍王氏生下常洛的第一个儿子由校。常洛在困境中得子，心中非常高兴，可是一想到父皇又有些心寒，不知他高兴不高兴？常洛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他令人分头将喜讯报知奶奶慈圣老太后和父皇。只要奶奶高兴，父皇大概不会怎么样。报喜的太监走后，朱常洛长久地徘徊在院子里，等待着父亲那边的讯息。老太后听到第一个曾孙子出生，又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继承人，觉得是天大的喜事。老太后一高兴就往儿子那里跑，待她到了乾清宫，神宗已得了消息。看到母亲喜的合不拢嘴，神宗也笑了，传令封王氏为才人，常洛才放下心来。

常洛由于长时期受压抑，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一发火就打骂太监宫女以及选侍。选侍当中只有李选侍比较能得到常洛的欢心，因此，她在东宫比其他入地位高、受宠，平时也就霸道，其他选侍难免与她发生些争执。王氏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看不惯李选侍的泼横，两人经常口角相拌，李选侍仗着常洛喜欢她，竟敢动手打王氏。万历四十七年（1619），王氏病死。有一种说法就是被李选侍打了，气愤而死。王氏死时，由校已14岁。常洛请示神宗后让李选侍照管由校。由检的母亲死后，也由李选侍照管，直到由校即位。

万历四十八年（1620）对明朝来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最长的君主神宗去世，临死还关照及时册立皇长孙。八月初一常洛即位，然而常洛福分太薄，在位一个月，于九月初一早晨死去。时年39岁。

常洛死前，旨传内阁大臣方从哲、刘一火、吏部尚书周嘉谟及科道杨涟等人入宫。谁知这几个人刚走到宫门口时，光宗已经驾崩了。杨涟说：“皇上晏驾，嗣君年幼，他又没有嫡亲母亲或亲生母亲在身旁，万一出现什么变故，我等就是天下罪人了。现在我们只好闯进宫去，拥皇长子即刻接受群臣朝见，安定天下人心，杜绝事故发生。”大家都认为只有这样办了。

商议已妥，杨涟就带头闯宫。守门的太监乱棍交下，不让他进去。杨涟将手一挥，大吼道：“我们是皇上召来的。现在皇上驾崩，嗣君年幼，你们阻止大臣入宫扶保幼主的目的何在？”太监被杨涟的气势镇住了，杨涟“哼！”了一声带领群臣进了宫门。

杨涟一行进了乾清宫，哭倒在常洛的灵前。磕头完毕。杨涟请皇长子朱由校出见群臣。这时朱由校正被李选侍拦在西暖阁内

不得脱身。刘一火景大呼道：“皇长子应当在灵柩前即位，今天却不在灵前？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回答。这时，常洛的东宫侍奉、老太监王安走来，告诉刘一火景说：“皇长子为李选侍所匿。”刘一火景大声吼道：“谁如此大胆，敢匿新天子。”王安说：“你等着，我去一趟。”王安说罢，大步走进西暖阁。他正言厉色向李选侍说明了外朝的情况，以不容违拗的口吻请求皇长子立即出见群臣。李选侍到底是妇人家，没见过这种场面，心中不免有些发毛，稍一迟疑。王安立刻抱起由校跑出来。刘一火景、杨涟等人立即跪倒高呼“万岁”。刘一火景看事不宜迟，挥一挥手，大家一拥上前，刘一火景架起由校的左胳膊，英国公张惟贤架起右胳膊，王安在后面拥着就把由校架上了步辇。这时，李选侍有些后悔，慌忙上前拽由校的衣服。杨涟吼道：“殿下是天下之主，群臣之君，谁敢阻拦。大家连拖带拉将由校拥入文华殿，群臣礼拜，由校即了东宫太子之位，议定九月六日即皇帝之位。”

九月初六日，正式举行了登极大典。由校即了皇帝之位，群臣舞蹈山呼。由校在高高的龙墩上看到了杨涟几天之间象是变了一个人，满头黑发和须眉都变成了白色，这是他几天来力交瘁所致。由校非常感动，数次称他为“忠臣”。由校的即位，是东林党人的巨大胜利。

东林党人自万历中期便自树高明之帜，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的重任，是朝臣中最清白最忠直的大臣。正由于东林党人绳人过刻，引起了某些官僚集团的不满。万历末年与东林作对的主要有齐党、楚党、浙党、昆党等士大夫集团。光宗即位后，时间不长主张顺应神宗意旨，保护郑贵妃的党派都被清除了，东林不宫如日行中天，气焰趋于极盛。短短几个

月间，被排斥的原东林派官僚皆披挂出山，冠盖满京华。

由校即位后，在东林党人的主持下，革除了神宗末年一些弊政。如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了赈济。明令免除了天下带征钱粮及北畿地区的加派，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再就是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作了结论，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荫，肯定了张居正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另外给建文时期的方孝孺等人平了反，恢复了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但是，东林党人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大弊大利的革兴方面毫无作为，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对国家亦无明显建树。

二、客魏崛起 天子纵乐

在天启初年，明王朝政坛上又悄悄崛起了一股政治势力。这个势力由于和皇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生长极快，迅速地对明朝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这就是魏忠贤太监集团。魏忠贤的兴起又与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妇紧紧相关，这个农家少妇即朱由校的奶妈客氏。

明朝皇家生儿育女，亲生母亲是不哺育的。一般是从农村挑选一些强壮的村妇为奶妈，代为哺育，据说这是希望农民的乳汁能给这些娇嫩的金枝玉叶增强体质。客氏是保定府定兴县人，其夫叫侯二。万历三十三年，客氏二胎产一女没有成活，恰在这时宫中为即将出生的朱由校寻找奶妈。客氏人长的肤肌白皙，身体苗条健美，眉清目秀，又恰在 18 岁如花似玉的年华，奶汁非常稠厚，于是被选中，成了由校的乳母。入宫二年，丈夫侯二病

死，客氏便带着儿子侯国光长期在北京住了下来。

客氏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却心灵嘴巧，非常机敏，又会做针线，所以很快在东宫上上下下混的很熟。由校的生母王氏对她很放心，把由校整个托付给了她。客氏知道怀中这个含着奶头的小生命是大明江山之主，是皇位的继承人，将来要掌管整个国家，一想到这儿，客氏总有些异样的感觉。她对由校的照顾非常尽心，也正是在这时客氏产生了非分之想，她要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她生活的轨迹，博取荣华富贵。而这些必须来自对由校的精心服侍。本来皇上断奶后奶妈就要打发出宫回家，因为客氏对由校太好，由校离开她便大哭不止，不吃不喝，王氏也看孤儿寡母可怜，例破例将她留下来，继续服侍由校，等到王氏一死，由校竟不自觉地吧客氏当成了母亲。

客氏发现由校已完全被她拢络住，心中十分高兴。由校即位使她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她要在后宫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子来，压倒那些有名封的后妃嫔贵，使谁也不敢瞧不起她这个农家女，充分品味一下全国第一贵妇人的滋味。客氏在宫中遇到一个和她有同样出身、同样感情、同样野心的太监，二人一拍即合、随即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进而干预国家政治，淆乱天下，这个太监就是魏忠贤。

魏忠贤是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家贫而无赖，娶妻冯氏，生有一女。魏忠贤生性黠慧佻薄，不事生产，饮酒赌博、鸡鸣狗盗无所不为。后其妻与其离异。忠贤的家乡是个出太监的地方，许多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而净身去投师父做太监。魏忠贤在欠了一屁股赌债、走投无路之际也踏上了这条道路。万历十七年，他入了宫，投于司礼监秉笔兼掌东厂之印的老太监孙暹名下。魏忠贤

被派到御马监干事，也就是这时培养了魏忠贤对名马的兴趣。魏忠贤在御马监呆了一阵又被派往甲字库看管仓库。他利用职务之便，盗吞库物，手头渐渐充裕起来。由校诞生后，其母王氏无人办理膳食，魏忠贤买通东宫太监魏朝，靠他引见入了东宫，为王氏及由校办理膳食。忠贤巧于逢迎，工于心计，千方百计利用旧日关系从各库掠取各种财物、玩好、果品、花卉取悦于王氏及小由校。他还做得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属上乘，因此颇得王氏欢心。

客氏原来与魏朝是“对食”关系，即太监宫女形同夫妇的生活。魏忠贤来东宫后立刻看上了客氏，多方接近她，讨她的欢心，客氏渐渐喜欢上了魏忠贤，二人偷偷相好，如胶似膝。熹宗即位后，客氏将魏忠贤拉到由校手下，充当典膳局官。由此，二人皆成为由校的亲近之人，他们都怀着控制小皇帝，进一步攫取权力的野心从政治上、生活上结成一体。

由校对客、魏二人恩宠有加，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深深忧虑，他们害怕由校被二人迷惑挟制、重演出太监专权、阿保乱政的局面。杨涟、左光斗在十月份上疏，以由校大婚在即为借口，提出将客氏放出宫去。老太监王安从中主持，由校只得让客氏离宫。但客氏一走，由校象掉了魂一样，茶饭不思，“啪嗒”“啪嗒”直掉眼泪。不出三天，就令客氏再次入宫。王安劝他，说：“娶了皇后就好了，有伴了。”由校说：“娶了皇后也不行，皇后也不大，也要客奶照顾！”群臣看着客氏再次来到由校身边，谁也没有办法。

客魏集团的形成是由校造成的，以后客魏集团的肆虐也是由校纵容的结果。朱由校是一个爱玩、贪玩、会玩的“主儿”。即位之前，客氏、魏忠贤带他玩马、玩狗、玩猫、玩花、玩草，花

样翻新的玩、昏天黑地的玩。做了天下之主，他的玩性丝毫未减，反而大加弘扬。有了权了，更有了玩的条件，玩的更加邪乎。魏忠贤最希望朱由校发扬玩的天性，自己好从中渔利，专权擅政。所以他对由校的玩加意引导，花鸟虫鱼、声色狗马，极天下之所能以供由校一乐。朱由校也忘掉了江山社稷、列祖列宗、黎民百姓，忘掉了自己是一国之君。

朱由校生性活泼好动，对什么事情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追求新奇、刺激，喜欢名马，爱好骑马射猎，魏忠贤以他在御马监学到的知识，搞了许多名马送给他，由校为之逐匹命名。他经常跃马挥鞭满宫乱跑，为了跑马的方便，宫内的许多几百年的大松树都被砍掉，窄小的门洞被拆除。由校爱打猎，尤其爱亲手杀死野兔、獐狼之类。他喜欢亲手砍掉野兽的头后看它的眼睛转动，从鲜血淋漓中追求刺激。由校在宫中象一个顽皮的农家小子，常常上树去掏鸟巢，下水去抓鱼。有一次，他掏鸟从高高的树上摔下来，衣服被扯烂，摔的头破血流。魏忠贤还时常带他去北海泛舟。由校为了好玩并不安分地坐在船上，他要亲手划船。经常是魏忠贤等太监坐船，皇上划船。有一次，由校与两个小太监在一条小船上。由校衣袖高挽，非常卖力地划桨。突然，湖上风起，将小船打翻，两个小太监不会游泳，由校也不会游泳，三人眼见就要淹死，正好一个会游泳的太监从湖边经过，将由校救起，两个小太监被淹死了。这时，魏忠贤、客氏在远处的画舫上喝酒，还不知道发生了事故。这类事情很多，由校玩起来根本不顾危险与否，魏忠贤也不以此为意。最危险的一次是由校在宫内大阅兵。他披坚执锐看施放铙的表演。一个叫王进的小太监就在由校面前装药点火，结果“轰”的一声，发生爆炸。王进的手被炸飞

一个，险些伤及由校，他只“哈哈”一笑，并不介意。

由校还喜欢蹴球、舞剑、射箭。永寿宫是魏忠贤与由校日常蹴球之所，乾清宫前丹陛是他舞剑的地方，常常在月下可以见他舞剑的身影。由校箭射的极准，有一次，魏忠贤骑马从他眼前驰过，他一箭便将那马射翻。

除了这些武的，由校最爱看戏。宫内钟鼓司准备有各种戏。朱由校几乎每晚必看，而且很开心。由校看戏每天必到极晚，冬天更是通宵达旦。

由校爱忘事，过去的事情转眼就忘的一干二净。但他人聪明，手也很巧。他最喜欢土木建筑、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样样精通，油漆一行亦极工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宫中原有十作，即十个作坊，由太监管辖，负责宫中土木营造。由校在宫中就成了十作的头。他爱好营建，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廊曲室，手操斧锯，兴趣盎然。但他喜厌不恒，造成了，看看哪里不顺眼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把他忙的不亦乐乎，顾不得吃饭喝水。由校不但造大的亭阁，而且擅长细致的雕刻，他做的硯床、梳匣皆是自己油漆，五彩绚烂、工巧妙丽，出人意表。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盈尺的天地里雕刻的花鸟虫鱼、人物走兽都栩栩如生。他令太监将这八幅屏拿出去，每套卖1万两银子。太监为讨他高兴，第二天就拿1万两银子给他，使由校大为兴奋。

玩、玩，一切时间都花在玩上，由校哪还顾得上朝政。为了玩他可以不读书、不上朝、不看奏章、不批军机。魏忠贤充分利用了由校的昏庸。他要谋私害人就在由校忙于设计制作时去请示事情。每次，由校都是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你们去

办吧！”于是，魏忠贤盗取了批奏之权，口衔天宪，威压群臣。不利己的事以皇上的名义批驳，谋私害政的事情也以皇上的旨意传令执行，外廷之臣无可奈何。

三、客魏横行 荼毒朝臣

客魏利用由校的昏庸在宫内立住了脚跟，然后开始发展他们的势力，组织听命于他们的官僚集团，以求把持天下。

东林党人眼见得魏忠贤青云直上，异常担忧。他们密切注视着客魏的动向。在客氏的去留问题上东林党人进行了力争，遭到由校的痛斥。由校大婚礼成，荫魏忠贤侄二人，东林党人主亦表示反对，元年十月，赐给客氏香火田二十顷，神宗山陵工成，亦表彰魏忠贤之功。东林派言官皆上疏反对，但由校根本不听，反而怒责东林党人，而那些东林党的反对者则受到纵容和支持。

到了天启二年底，大臣中有两个人倒向了魏忠贤。其中一个 是礼部尚书顾秉谦。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一直受到东林党人的攻击。他看到魏忠贤的迅速崛起以为冰山可倚，就秘密地投靠了他。另一个是南京礼部侍郎魏广微。此人亦是寡廉鲜耻、柔媚无骨之徒。魏忠贤得势，魏广微认为是个机会，他以同宗同乡为由巴结魏忠贤，魏忠贤遂将他召到北京拜为礼部尚书。到天启三年（1623）正月，顾、魏二人皆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进了内阁，改变了东林党在内阁的一统天下。这样，有顾魏二人相助，魏忠贤如虎添翼，更加放开了胆子为非作歹。天启三年，太监明目张胆地跑到工部堂上索要冬衣，多方挑剔、挑起事端，工部尚书钟羽正被逼离职。魏忠贤令御史郭巩疏攻周宗建、刘一火景、邹元标、

杨涟、周朝瑞等人保举熊廷弼镇守辽东是党邪误国。东林党人群起相救，皆受严责。许多人因此罚俸。魏忠贤假皇上之命封他的子侄和客氏的子侄世袭锦衣卫官职，又不顾廷臣反对接连增加内操军士2万多人，由此，魏忠贤掌握了宫内外所有禁卫大权。

在内宫，客魏二人对光宗的嫔妃和由校的嫔妃都可以任意生杀。光宗的赵选侍素与客氏不和，魏忠贤矫旨赐其死。赵氏将光宗历年所赐之物罗列于庭，再拜上吊。由校的裕妃张氏怀孕，过期未生，客氏在由校面前说她是妖精，将其关闭在一个死胡同内，不给吃、不给喝，偶而天下大雨，张氏爬在地下喝屋檐下滴下的雨水，终被折磨而死。冯贵人尝劝朱由校罢内操，客魏大怒，将其赐死。成妃李氏向为由校所喜，她曾借机会在由校面前为冯贵人辩解，被客氏知道后矫旨革其封号，绝其饮食。李氏鉴张氏之死，预先在各个墙角、壁缝间藏有食物，故关闭数日后得以不死，客魏将其斥为宫人。另外，胡贵人对客魏专权有恨，尝与人言，魏忠贤借由校出门祭天的机会，派人将胡贵人杀害，向由校报称是暴疾而亡。好在由校爱忘事，过去就忘。从来就没把他的这些嫔妃放在心上，少上几个他也不知道。

天启四年（1624），开势发展对东林党人更加不利。魏忠贤不但在文官中间招纳了羽翼，武臣方面亦安排了心腹之人。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北镇抚司理刑许显纯皆是魏忠贤的死党。东林党人的奏疏只要弹劾魏忠贤必定受到痛斥。相反，反东林党者都逐渐开始罗列东林党罪状，发起反攻。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决战终于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爆发了。时任明朝最高检察官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再次披挂上阵，疏奏魏忠贤犯有24大罪行。

杨涟此疏一出，的确把魏忠贤吓住了。疏中所指，件件是事实，倘皇上雷霆一怒，后果不堪设想。魏忠贤惴惴不安，晚上找到由校，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外庭有人想整他，给他罗织了许多罪状，全是无中生有。他一心为国，一心为皇上，才得罪了这些人，这些人攻击他，实际上是想限制皇上。他假装提出辞去东厂职务以全尸骨。由校未读奏疏，不知所以然。客氏又从旁边替魏忠贤评功摆好，说魏忠贤如何清忠勤谨，如何效尽犬马之力。外庭大臣故意对他过不去，是因为魏忠贤公正廉明，他们作不了弊，才危言耸听，给魏忠贤安了这么多罪名。朱由校只知道魏忠贤万事顺从，竭尽全力带他玩，对外庭事务根本不了解，因此也就说不出什么，也不愿意读那份奏章，他不允许他辞东厂之职，而对杨涟则大加申斥，说他“扑风捉影，门户之见，大胆妄言。”

杨涟被责，激怒满朝官员的愤怒。杨涟次日又写一疏，准备面奏皇上，魏忠贤则阻遏由校不御朝三日，第四日才出御皇极门。魏忠贤早作了准备，锦衣卫士布满朝堂，仪仗金瓜倍于往时，杀气腾腾，一片森严。魏忠贤口传圣旨，今日只听取内阁奏报，其余诸臣不许奏事。此一举更加剧了东林党人的愤怒。继杨涟而上疏者风起云涌。或单疏，或合疏，短短两天，不下百余疏。但是，魏忠贤控制了由校，已稳操胜券。所有奏疏，不管言词多么激切、多么尖锐，皆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

魏忠贤顺利地渡过了这一难关，他明白了东林党人别看声势浩大、气势汹汹，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容易对付。东林党势头过去了，魏忠贤该反过来收拾东林党了。他不能容忍他们再这样指名道姓的谩骂，他要用铁的手腕树立起自己的威严来，叫

东林党人知道魏忠贤也不是好惹的。此次风头过后，被东林党人攻击的官员都希望魏忠贤给东林党一点颜色看。魏广微拿了一本《缙绅便览》，用墨笔将他认为是邪人的官员一一圈点，重则二圈，轻则一圈。象叶向高、韩爌、何如宠、钱谦益、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李应升等六七十人皆被三圈。他将这本《缙绅便览》交给魏忠贤，让他依次罢逐。有人则向魏忠贤献计，恢复“廷杖”之刑，用来威震群僚。

天启四年（1624）十月，祭主庙。百官毕集，宦党大学士魏广微不至。到仪式进行了一半，他踉跄入班拜跪。遭到魏大中、李应升等人的评击，魏广微以失仪请求罢免，魏忠贤矫旨免罪挽留。魏广微因此怀恨魏大中、李应升，催促魏忠贤对东林党人下毒手。十月、十一月两个月，魏忠贤假传圣旨，陆续将东林党人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庭、右都御史杨涟、左金都御史左光斗以及魏大中、乔允升、冯从吾、袁化中、房可壮等数十人罢斥。朝属几乎为之一空。内阁中顾秉谦做了首辅，东林的天下彻底失掉。

天启四年十二月，宦党徐大化再次上疏弹劾杨涟、左光斗串通王安，威压宫禁、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另一宦党曹钦程更是危言耸听，说赵南星、周宗建、李应升收受了熊廷弼的贿赂。魏忠贤立即矫旨削了周宗建、李应升的官职，并派锦衣卫逮捕杨涟等人的到京听讯。

魏忠贤的党羽已定好计谋，诬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袁化中等东林党人都受了熊廷弼贿赂。锦衣卫受宦党指使，先将东林党人汪文言抓来北京投入镇抚司监狱，交由宦党许显纯审问，逼他承认经手给东林党杨涟行贿。为了让汪文言承认，每

次过堂，五刑备尝，汪文言死不诬人。一直折磨了两个多月，汪文言皮开肉绽，一息尚存，许显纯也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口供。最后，许显纯动用最残酷的刑罚，一天到晚拷打不休，汪文言实在受刑不过，便说：“你们不要打了，口供你们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承认便是！”于是，许显纯诬杨涟等人受熊廷弼贿赂，汪文言经手过付。文言听到这里，大呼一声“苍天啊！冤枉啊！以此污清廉之士，我死不承认！”许显纯冷笑一声，让人拿着汪文言的手画了押，便将他打死，上报汪文言已经招供。

七月份，杨涟、周朝瑞、左光斗等人逮到，下到北镇抚司。杨涟等人入了狱，还不知道犯的是何罪。第一次过堂后，才知道被诬受赃。左光斗对杨涟他们说：“他们这是存心要杀我们。他们杀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乘我们不服，酷刑毙命，一是暗害于狱中，说我们是急病而亡。如果我们一审即承认，即可以移送法司，到时候再翻供，尚有一线生的希望。”大家认为确是这样，所以，第二次过堂，不管诬赃几万都承认了。谁知道承认了许显纯并不将他们移交法司议罪，而是更加残酷地拷打，立逼吐出脏银。这些东林官僚平时都是极清廉的，哪有几万两现银？交不出来，许显纯就三日一堂、五日一堂，压杠子、夹脑袋、带枷锁镣、烙、刺、夹、棍一齐上，旧创未复，又加新伤。几天下来，这几个人连跪的力量都没有了，过堂时皆带着桎梏平卧堂下，惨状目不忍睹。几个大臣的家人在京城东奔西走，筹措银两赎人，但京城是魏家的天下，谁敢借给他们银两。七月正是暑天，杨涟等人无医无食，屡受重刑，很快就濒于死亡边缘。第一个死去的是杨涟，抬尸的人发现杨涟体无完肤，面部被打的血肉模糊，爬满了蛆虫。尸体上有一个土袋子压着，两个耳朵都钉进了铁钉，显然

是被暗害。家人载棺回家，家产已全部变卖，无地安葬，只好厝置河边。其母亲妻小栖息于城楼上，而魏忠贤依然令地方严厉追赃。第二个死去的是魏大中，大中家徒四壁，异常贫寒，死后六七天不让抬出，结果尸体腐烂。其子扶棺归乡后亦勺水不进而死。左光斗死后，人见其两腿已被打断，仅一筋相连，肌肉已烂掉，只剩下白骨。蛆虫满身，面目不能分辨。顾大章也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赵南星等人则被或追赃，或削籍，或远戍。赵南星终于死于戍所。

依靠高压和滥杀魏忠贤建立起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内外大权抓于一手，内廷除宦官王体乾外有李朝钦、王朝辅等 30 多人为左右死党。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为“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惨杀，号为“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 10 人号为“十狗”。其他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崔呈秀等人门下的义子、义孙又不知凡几。自内阁六部以至于四方总督、封疆大吏、遍是忠贤死党，客魏两家的亲属，更是满门公侯，当时北京城有人云“真皇帝是魏忠贤”。明王朝在客魏把持下，卖官鬻爵、滥封滥荫、贪污贿赂、献媚取宠、排斥异己、高压专制，吏治坏到了极点，明朝政治一塌糊涂。

魏忠贤把持的东厂成为最恐怖的特务机关，东厂番役到处横行，官民偶有不慎便遭横祸。甚至东厂番役故意设下圈套诬陷无辜，京内外人们对东厂畏之如虎。一次，有两个人在酒馆喝酒。其中一个喝醉了，大骂魏忠贤，旁边一人制止他，怕他得祸。这时候，门外进来一个人，故意挑逗那个醉者，说魏忠贤好生厉害，让他听到可不得了。那醉者乘着酒劲说：“他能奈何得我？能

剥了我的皮吗？”那人冷笑一声，亮出了东厂番役的身份，将那醉者绑去，活活剥了皮。

阉党对东林党人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天启六年（1626）尽毁天下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又仿宋元党禁之例，立东林党人碑，将东林党人永远禁锢。天启六年顾秉谦修成《三朝要典》，将东林党人描述成专权乱政、结党营私、危害国家的小人，丧失封疆的罪人，宣布永远禁锢。

魏忠贤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的党羽们亦从中取得了好处。为了长保荣华富贵，这些人对魏忠贤献媚取宠，无所不用其极。魏忠贤俨然是太上皇帝，所缺的只是名义。阉党分子想尽办法为他歌功颂德。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疏，请“建魏忠贤生祠，用致祝福。”朱由校马上降旨同意。为表彰魏忠贤心勤体国，钦赐祠名为“普德”。生祠很快在美丽的西子湖建立起来，座落在关公与岳飞庙之间，备极壮丽。有一位提学副使黄汝亨从门前经过，微微叹息一声，结果被守祠的太监当场打死，地方不敢过问。杭州生祠一建，建祠之风迅速吹遍全国。各地督抚大员纷纷效法，唯恐落后，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华丽。到处都发生拆民房、拆庙宇，甚至拆学宫建生祠的事情。建造费用初起各官捐献，后来皆是动用国库银两。每一个生祠都请皇上命名。其名歌功颂德，调门越来越高。如“广恩”，“崇德”、“仰德”、“旌功”、“德芳”、“威仁”、“嘉猷”、“隆勋”、“报功”、“感恩”、“存仁”，不一而足。一年时间，全国从京城到各省，从通都大邑到边荒蛮地，生祠遍布，对建造生祠不热心者立即逮捕治罪。各地生祠建好后都举行盛大的迎喜容仪式，文武百官皆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象对皇上一样，只差没呼“万岁爷”。

四、昏君病重 贤后定计

由校的身体本来是很好的，他喜爱户外活动，兴趣广泛，爱玩善玩，精神与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天启六年（1626）春他划船落水以后身体大不如前，常常闹些毛病。按说才二十出头，身体是不应当如此脆弱的，朱由校不知什么原因日益虚弱起来，脸和身上都出现了浮肿。到天启七年（1627）六月间又一次病倒，这次更是严重。惧热怕冷，时发高烧，浮肿也更加厉害。脸色黄里透青，吃饭也越来越少，说话也没有力气。这下忙坏了御医们，也吓坏了魏忠贤一伙。由校的饭原来是魏忠贤、客氏、王体乾、李永贞四家轮流办的，不吃尚膳监的饭。四家为讨由校的高兴，饭菜一个比一个精美，尤其是客氏所做的御膳更是精美绝伦，由校特爱吃，称做“老太家膳”。由校病倒后，四家都在吃上下功夫，想补一下他虚弱的身体。阉党分子霍维华向由校进献了“仙方灵露饮”。其法用银锅蒸馏五谷，取其精华制为饮料，甘冽异常。由校喝后觉得很好，但喝了几天也就没有兴趣了。待到七月间，由校的病明显恶化。客魏二人不免心中焦愁，他们依靠由校这个大靠山，原认为一世尊荣是不成问题的，而今年轻的君王眼看要命归天府，怎不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京师传出了魏忠贤欲谋篡位的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满城风雨。人们心中惴惴不安，皇后张氏更是焦虑。

张皇后是河南生员张国纪之女。天启元年（1621）四月二十七日选为皇后，与由校完婚后。张氏丰姿绰约，美色天成。成婚之初她与由校感情还算好。然而，他们二人的性格悬殊太大，时

间久了产生摩擦。由校好动爱玩，张氏喜静厌游；由校不谙事理、不明大义，不懂得自己的职责，一付纨绔子弟的性格，张氏通达事理、深明大义，对国事家事都有一定的看法。这样水火不容的性格凑和在一起，难免要造成双方感情的破裂。

张氏平时喜欢静静地在房中干些杂活，或者看看书，写写字。由校去玩时总是来叫她，她多是托病不去。实在推不掉就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脸上也无高兴之色。时间久了，由校也厌烦了，不再叫她。显然，他不乐意与这个不会玩的妻子在一块活受罪。

张皇后看到客氏、魏忠贤横行霸道乱国乱政心中十分气愤。但她给由校说由校根本不听。有一次，张氏在读《史记》，由校玩得满脸是汗跑进来了，问张氏读的是什么。张氏说“赵高传”。“赵高？谁是赵高？”由校问。“大奸似忠，毒如蛇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坏秦家锦绣天下的小人！”张氏气愤地说。由校才不管他赵高是何方神圣呢，他似懂非懂地朝张氏一笑，又玩他的去了。

客氏最担心张氏控制由校，所以时时处处对张氏提防和限制。客氏在宫内大摆威风，以由校的母亲自居，根本不把嫔妃看在眼里，对张皇后也是如此。客氏对由校既象母亲对于儿子，又象少妇对于情人，一种与生俱来的嫉妒心使她不能容忍任何女人占据朱由校的心。对客氏的横暴，张氏非常反感，她曾当面斥责过客氏，因此，客氏、魏忠贤与张后结下冤仇，必欲铲除而后快。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了孕，客氏将张皇后宫中下人一律换成她的心腹，在侍候张氏时粗手粗脚。终于有一天，一个宫女给张氏捶背用劲过猛造成张氏流产。由校的其他妃子也有生育。

范贵妃生悼怀太子慈煊，容妃任氏生献怀太子慈炅，皆殇。由校嫔妃如云，但他不好色，晚上一般看戏看到很晚，倒头便睡，一觉大天亮。客氏又故意限制他与嫔妃接触，故此外再无生育。由校一心在玩上，对有没有儿子并不在意，而张氏对由校子嗣问题却是很焦急。

由校的重病和外间的传言使张皇后忧心忡忡，她最担心的是皇位的嗣继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由校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由校无子，信王又是他唯一的弟弟。遵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信王是皇位当然的继承人。信王当时已 17 岁，与由校即位时的年龄差不多大。信王沉毅冷静、通达情理、深明大义、素有贤名，张后早有耳闻，因此，她看中了由检。张皇后虽然被由校冷落，但中宫名号尚在，万一朱由校突然死去，未留下遗嘱，她可以用中宫的名义发布关于继承人的谕旨的。但张后还是希望在由校活着时就把此事确定下来。

自从生病之后，长时间辗转于床第，朱由校有了反思自己一生的时间。大概出于良知的发现，自天启七年朱由校性格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他周围的人，对张后也渐渐转变了，张氏因此可以经常陪伴在他的床边。就在八月初，张氏对由校提起了信王，说信王可以托付大事。由校表示同意。到八月八、九日间，由校病情加重。魏忠贤等人时刻守在宫殿内外以防不测。张后劝由校召见信王一次，由于客魏防范太严未成。十一日，魏忠贤休沐。张后借这个机会，传旨召进了信王。

信王来到乾清宫，见到了他的哥哥。看到由校全身浮肿、气息奄奄，由检很难过。由校强打起精神说：“我弟将来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又说：“魏忠贤、王体

乾皆是忠臣，可以信任，可以大用。”信王只是伏地叩头不敢回声。接见结束后，张皇后叮嘱他多加保重，随时注意事态变化。由校昏昏庸庸过了 20 余年，只有接见信王确定继位人是他做的唯一明白事。但至死他对客氏、魏忠贤的眷恋丝毫未变。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申时，统治天下 7 年，将大明元气戕毁殆尽的朱由校撒手离开了尘世，时年 23 岁。

思宗朱由检

明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大明帝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年仅 23 岁的朱由校卧病两个月后死去了。不久人们看到，一队仪仗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涂文辅带领出了宫门直奔信王府。不多时，便拥簇着一个 17 岁的青年，在一片暮色中踏进紫禁城登上皇位，他就是思宗朱由检。

一、治国除奸 抵御满清

朱由检对天命的降临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他的父亲虽然生了 5 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由校和他两个。由校嫔妃成群，却无子嗣。这样，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就是由检了。

朱由检从他哥哥手中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只保留着强大躯壳的腐朽政权。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可以说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千头万绪，从何做起？朱由检心里早已有打算，第一个应当解决的是天怒人怨的“客魏集团”。

朱由检要清除魏忠贤也没有那么容易。朝廷中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没有一个帮手，操之过急只能逼魏忠贤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力量的对比是不利于朱由检的，他要谨慎地、耐心地等待时机。

他首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理国政中去。这时的明王朝象一个垂死的老人四肢麻痹、行动不便、指挥失灵。国家的财政经过魏忠贤时期的破坏已濒临绝境。每年固定的财政收入不能如数收缴国库，各地都有拖欠，而国家用项却越来越多。一是军费开支，当时已较 30 年前增加 3 倍多，如果满足军方需要，就要用掉年收入的 97%。二是皇室费用、百官俸禄都成倍增加。由此造成年年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天启以来，全国灾荒不断，大量人口逃亡，转死沟壑，土地荒芜、社会动荡，这已在许多有识之士中间引起了深深的恐荒。尤其是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已经传来了人吃人的消息。陕西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发。在东北，建州女真自万历末年起兵发难，建立了后金政权，目前已经羽翼丰满，不断侵掠明边。明朝将大量兵力财力抛到辽东，而辽东局势根本没有缓和。这些问题使由检心乱如麻。为了尽快使帝国起死回生，登基后，他只得夜以继日地工作。

自天启七年八月始，一道诏谕传遍天下。由检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织造、烧造、采办等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停止了皇宫的一切土木营造，削减自己和后妃们的吃用开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僚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明令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下诏免除了许多受灾地方的赋税。这一道道诏令又重新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朱由检把解决“辽事”，即后金问题作为继位后要办的大事之一，这一方面有恢复故土，重振帝国之威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尽快结束战争状态，节约大量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自上台后，他就积极地物色能担负这一重任的重臣。朝廷许多大员推荐了前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对袁崇焕，由检是有所耳闻的，袁崇焕天启年间久镇辽东，熟知敌我情势、山川险易，胸有韬略，屡建大功，由下吏而渐升至巡抚。天启七年的宁锦之役，他固守宁远，挫败了努尔哈赤的凶锋，在崩溃的边缘挽回了整个辽东战局。但他在举国如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热潮中不随流俗，被太监告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很不高兴。为了国家，为了辽东，袁崇焕最后还是屈服了，但他留给魏忠贤的印象却改变不了。宁锦大捷使朝中高官显宦、太监阉党都得一一加官晋级，封爵加荫，而袁崇焕仅仅是加了一级。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只得请求解甲归田，回到广东老家。粉碎魏党之后，东林党许多人因袁崇焕有颂美活动将他看作阉党。虽然侥幸未入逆案，东林人私下却称为漏网小人。由检权衡了一番，决心不顾东林党人的反对，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实际上将整个对金防务交给了他。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从广东赶回北京。十四日，由检在建极殿东面的高台上（俗称平台）召见了他。

由检看着这个黑瘦精干的中年人，对他忠心为国，长途赶来表示赞赏。袁崇焕非常激动，他表示，我受皇帝陛下特殊眷顾，刻骨铭心。倘若假我以便宜，我5年便可恢复全辽疆土。由检很高兴，说：“你能五年复辽，朕决不吝惜封侯之赏。”

在对国政进行了初步治理，他的皇位初步巩固后，朱由检开

始集中精力解决客魏集团。他准备采用先稳住他们，然后再逐个击破的方式将客魏集团消灭。由于朱由检继位后，对魏忠贤不冷不热，魏忠贤深怕前景不妙。九月一日，魏忠贤提出辞去东厂职务来试探由检的态度，由检没有批准。次日，客氏提出出宫，由检马上表示同意。第二天，天还未明，客氏素服到由校的灵前将她保存的由校胎发、指甲焚化，痛哭一场，离开了紫禁城，住进由校赐给她的府第里。魏忠贤的主要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照样得到由检的信任，九、十两个月的登极恩赏照样给予他们。只不过，朱由检新重用的太监徐应元、曹化淳比魏忠贤更加得意。

朝廷大臣中那些魏忠贤党羽也心神不定，他们预感到形势将要变化，许多聪明人开始寻找退路。魏党的分化使形势开始明朗。九月十六日，南京通政使杨所修疏奏宦党崔呈秀父丧不奔，夺情视事非制，请放他归籍丁忧守制，由检不允。十月十四日，魏党首恶分子杨维垣丢卒保车，主动疏劾崔呈秀专权乱政。说魏忠贤是听信了崔呈秀，被他所误。崔呈秀慌了，要求守制，由检还是不放他走。十月十八日，杨维垣再劾崔呈秀通内，连累了魏忠贤，并颂扬魏忠贤一心为公，矢忠体国。杨维垣疏中还弹劾了其他几个魏党人物，由检继续保持沉默。

十月二十三日，独立于魏党之外的下级官员也行动了起来。工部主事陆澄源参劾崔呈秀，词中涉及魏忠贤建造生祠问题。由检薄责陆澄源越位擅言，但心里高兴，遂将崔呈秀放归。二十五日，兵部主事钱元恂直接弹劾魏忠贤，言词激烈，天下震动。二十七日，海盐贡生钱嘉徵上疏，将魏忠贤罪行列为十项，要求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由检拿这本奏章让人读给魏忠贤听，魏忠贤知道事不好，马上以患病为由提出辞去东厂印务。

由检令他出宫调理，随后传令将魏忠贤集中在宫中的军士解散。

接着，由检又点了几个魏党首要分子的名，下令吏部调查崔呈秀等人的罪行。

十一月一日，由检下诏，公布了魏忠贤的罪行，宣布本应将魏忠贤寸斫以谢天下，念先帝还未出殡，姑且安置于凤阳。客魏二犯家产籍没，冒封的爵位革除，子孙人等俱到烟瘴之地充军。

魏忠贤离京，带了许多人和车辆。由检以此为理由，令兵部差人将魏忠贤押往凤阳。十一月六日，魏忠贤一行走到阜城县，闻知了由检的命令，知道末日到了，魏忠贤当晚上吊自杀于旅舍。崔呈秀在蓟州家里听到魏忠贤的死信也自缢身亡。十一月七日，客氏被押往浣衣局打死。随后，客魏两家子孙人等皆被斩首。

朱由检在剪除客魏集团的斗争中大获全胜，为大明帝国清除了最大的隐患，显示了他不可低估的行政才能。

魏忠贤除掉了，但把持朝政的魏党羽翼其势力仍然庞大。当时，内阁、六部，各院寺首脑都是魏的死党，身居要职者都与魏忠贤有瓜葛。杨所修、杨维垣、安伸、贾继春等人以弹劾魏忠贤的功臣自居，上窜下跳，他们的目的就是保护同党，使由检不再追究他们，从而达到维护现状、继续压抑东林党人的目的。

朱由检深知，魏忠贤如果没有朝廷中这些寡廉鲜耻之徒的帮助是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的。朱由检当然不会放过他们，让他们继续把持朝政。十一月份，他下令逮捕了魏忠贤的主要爪牙“五虎”和“五彪”，交法司议罪。从十二月到崇祯元年（1628）五月，朱由检亲自主持选拔了4批共132个给事中、御史。这些新进言官除个别人依附魏忠贤，此外，皆是与魏党无关联之人。他们以清除魏党为己任，言路渐趋清明，由检因此了解

到更多的真实情况。对被魏忠贤害死、削夺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

但朱由检这时也犯了一个大错。原来，袁崇焕出关后，整顿兵马，修缮城池，使山海关一线的防务稳定下来，清帝皇太极一看在山海关无机可趁，决定从别处入关，一者骚扰内地，再者找机会设计除掉袁学焕，以去掉这一危险对手。

崇祯二年十月，秋高马肥之时。后金十数万精兵分道由龙井关、大安口入犯，连下遵化等名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回师救援，全军覆没。正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警兼程回救，屯于通州。但金兵绕开袁崇焕，直扑北京。

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兵，京师守卫益显薄弱，由检心中忐忑不安。待闻袁崇焕率师赶来才放下了颗悬着的心。他任命大将满桂为武经略，总理各镇援兵、保卫京师。满桂与袁崇焕分屯于安定门和广渠门，打败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由检为此召见了袁崇焕。他向袁崇焕表示慰劳，并解下自己的貂裘赐给他，袁部下将领皆得到赏赐。袁崇焕向由检表示一定要尽快赶走敌人。十一月底，东便门之战，袁崇焕大破金兵，自己的兵力也损失过半，又因补给不及时，袁兵疲劳已极，要求入城稍做休整。就在这时，情况突变，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皇太极曾在北京城下俘获两个太监，他让营中广泛宣传与袁督师有约在先，袁督师让路让我们来打北京。故意让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太监回到宫内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由检。本来由检对袁已心中有气，倡言五年复辽击贩金兵，现在辽东未复却把金兵引到了家门口，听太监一说，心中不免起疑，是不是与金真有勾结？由检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就在十二月一日召对时

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在城外遂大溃，后为孙承宗收抚。孙承宗接替袁崇焕的职务。十二月中旬满桂战死，孙承宗督率各镇援兵力战克敌，解了京师之围。后金兵在畿内大肆抢掠，到次年四五月间，金兵才退出关外。

后金兵退走后，崇祯愈感袁崇焕有负他的厚望，怒气难消，于是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了长城。

二、镇压起义 损兵折将

明末农民起义军自天启中期大规模爆发后，规模越来越大。在袁崇焕出关抗御清兵，边防形势好转后，崇祯任命洪承畴任三边总督，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陕西义军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在明军的压力下先后离开了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山西饥民群起响应，全省震动。洪承畴迅速派悍将曹文诏、马科、曹变蛟等人统兵追入山西。起义军闻讯东越太行进入畿辅平原地带，所向披靡，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为解畿南之危，明廷调集大军3万余人，在崇祯六年冬天将义军包围在豫北。为了摆脱困境，起义军诈降明廷，使明军停止了进攻。待十月底，黄河结冰，义军遂出其不意溃围而出，南渡黄河进入中原，分道直扑安徽、湖广、四川。农民起义从局部问题变成了明廷的心腹之患。

怎么对付这种形势，朱由检一筹莫展。大臣们提出，农民军之所以没有被消灭于畿南就是因为事权不一，明军各自为战、步调不一致，各怀观望，不肯用命。建议朝廷设立总督，统一指挥。由检同意这个意见。可是，这个总督让谁当呢？洪承畴这时已调

防辽东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过了数月，有人推荐了延绥巡抚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总办剿灭义军军事。

崇祯七年（1634），陈奇瑜集中各路明军在湖北打了几个胜仗，将义军赶回陕西。义军在向陕西退却的路上误入汉中栈道险区，被明军包围在车厢峡，进入死地。义军又采用伪降手段，派人以重金贿赂陈奇瑜手下将领，陈奇瑜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收服义军，主张招抚，得到由检批准。义军走出死地后，立刻又砍杀官军重举义旗。朱由检羞恼成怒，下令将陈奇瑜下狱治罪，调洪承畴接任五省总督。崇祯七年底义军返回河南，次年正月打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掘了朱家的祖坟。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苍天，对不起祖宗。一连几天，他布衣角带避殿办公以表示自己的痛苦，亲赴太庙，祭告祖宗，同时发布《罪己诏》引咎认罪。由检不甘心失败，他严令吏兵二部追查凤阳失陷的原因，凤阳巡抚杨一鹏被逮捕处死，一大批有责任官员被遣戍。随之，又调发拼凑了7万官兵，拨军费100多万两，限洪承畴6个月之内荡平义军。

洪承畴在皇上的催督下提兵入河南。义军避开明军又回到陕西，消灭了明军艾万年、柳国镇部。李自成在真宁消灭了明军精锐曹文诏部。高迎祥等则继续在中原活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由检又起用卢象升总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与洪承畴一个西北，一个东南，分区剿灭义军。到崇祯九年（1636）正月，六个月期限将过，东南、西北两路皆无捷报。朱由检一面给洪、卢二人施加压力，一面下达大赦令，表示赦免

起义农民，企图分化瓦解农民军。

崇祯九年（1636）五月，卢象升会合洪承畴在周至地区击败高迎祥所部，生俘了高迎祥。明军乘胜收降了张妙手、蝎子块等部。李自成也在明军追击下离开陕西进入宁夏、甘肃。一时间，出现了天下将平的征兆。可是，好景不长，只不过几个月时间李自成又死灰复燃，领兵从甘肃直扑四川，烽烟再起。张献忠、罗汝才复又驰聘于中原，天下骚乱如故。

崇祯十年（1637）三月，朱由检起用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委他负责内外军政。对于剿灭农民起义，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由总督和总理分别统兵，各负其责。总督由洪承畴担任，总理则是杨嗣昌推荐的两广总督熊文灿，嗣昌居中调度。整饬兵马，期以三月消灭全国农民起义。

增兵就要增饷，根据杨嗣昌的计划，增兵 12 万，增饷 280 万两。280 万出自何方，当然还是百姓。想到再次加派，由检不禁大费踌躇。正在这时，有一个在京考选的知县在召对时慷慨陈词，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不在于加派与否。守令只要廉，再加一些也无妨，这个知县深知由检最恨贪污，最急兵饷，因此投由检所好，以求大用，由检果然龙心大悦，认为此人来自地方，知地方弊病，加派还是可行的。过了几天，朱由检便发下诏令，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养兵，着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这就是剿饷的加派。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以兵弱不可用，请增练边兵以成劲旅，于是又加练饷，剿饷练饷总共 1000 万两，加上辽饷，加派达 1700 余万两。远远超过正赋之数，民间由此私自呼崇祯为“重征”。这更给燎原的农民起义火上浇油。

本来明军在首辅杨嗣昌的调动下，崇祯十一年在剿灭农民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江淮地区，总理熊文灿招降了张献忠，小股农民军投诚者颇多。西北方面，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十一年底将李自成部荡平，李自成捡了一条性命逃进了深山。

但在重重加征之下，人民水深火热无法生存，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不得不再叛于谷城，一时诸降明农民军皆云起响应，攻城掠地，天下又趋大乱。

崇祯万般无奈无将可派，只好对杨嗣昌寄与厚望，让他亲临前线督师，以遏制农民起义军的燎原之势。

杨嗣昌到达军中，在襄阳建起大本营，积蓄粮草兵杖，整顿士卒，誓师扑灭张献忠。杨的“剿贼”实际上是“赶贼”。他想把张献忠赶到四川去，然后封闭四川加以围攻，因此他督军跟在张献忠屁股后面鼓噪，却不积极进攻。四川的军队又被杨嗣昌调了出来，张献忠乘虚入川，连下重庆等几十个州县，由检急令嗣昌跟踪剿灭。待嗣昌赶到四川，张献忠却虚晃一枪返头又折回湖广，直奔襄阳。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在陕西复起，率领18骑出现在河南，饥民从者如流，旬日众至10万。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打下洛阳，杀由检亲叔福王，其子由崧逃往江淮。朱由检刚得到洛阳失陷之报，张献忠又已攻下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端起一杯酒对襄王说：“请亲王痛快地喝下这杯酒。我要借殿下的人头杀掉杨嗣昌。”遂杀襄王，一个月中间连失两个亲藩。洛阳福王聚敛金银无数，襄阳杨嗣昌积蓄的军马兵仗又全被农民军缴获。时谓“洛阳国帑，襄阳军资”全归了张李。杨嗣昌知道自己的死期就要到了，由检不会饶过他，与其被诛于

西市，不如自裁，遂在军中服毒自尽。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明原兵部尚书、陕西总督付宗龙在与李自成起义军作战中又兵败被杀于顶城，明军精锐人马损失净尽，河南的州县也几乎全部被农民军攻占。到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继任的陕督汪乔年也被李自成打败杀死。这时张献忠起义军攻占了湖广四川绝大部分地区。在辽东方面，洪承畴 13 万大军在朝廷一味催战下又陷入清军重围，到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坚持一年的明军全军覆灭，明王朝山海关外军事要地尽失，清军又将兵锋指向关内。

大厦将倾。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了他的政权，准备加紧夺取全国政权。同年，张献忠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权。接着挥师挺进四川，崇祯十六年九月，潼关之战，孙传庭兵败身死，由检手中最后一支生力军也丢掉了。李自成又乘胜夺取西安，建立大顺国，据有了明王朝的半壁江山。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誓师伐明，亲率 40 万大军渡河东征，直扑北京。面对天下的四分五裂，李自成的猛烈进攻，朱由检已经无能为力了。

三、回天无术 上吊煤山

严重的内忧外患把朱由检搞的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眼看着满朝文武结党营私，全不以帝国的命运为重，他非常苦闷。自崇祯十五年后，宫中人等都感到朱由检的性格越来越多疑、乖僻、暴躁、易怒，常常表现出不可控制的神经质，他快要支持不住了。皇冠给别人带来的是权势，荣誉、享乐，而给他带来的却是痛苦和劳碌。

朱由检自奉节俭，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室的开支。皇帝和后妃的衣服本来是穿一次就要换，后宫库内堆积如山的箱子里盛的就是历代帝后的衣物。由检觉得这样太浪费，他自己带头穿经过浆洗的旧衣。周皇后有时还亲自动手洗衣。为他讲课的大臣曾看到过他衬衣袖口磨烂，吊着线头。宫中旧有的金银器皿皆摒而不用，也不再制造新的，到最后，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了。由检当政 17 年，宫中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节省了大量经费。他有时晚上看奏章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让太监拿几个零钱去买点宵夜。宫中原有的大批宫女，由检亦大批遣出宫去。

由检的勤政超过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章奏，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章奏，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昼夜不休息。

由检没有特殊的嗜好，吃穿用住，概不讲究。狗马声色统不沾身。他登基之后，有天晚上他在文华殿批奏章，忽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随之觉得血液沸腾，阳兴思春。他觉得奇怪，仔细搜索殿内，最后发现一个小太监坐在大殿角落里，香味是从他手中的那柱香中发出的。经过盘问，才知道这是宫中旧规，那香是特殊秘方配制的。由检感叹父兄皆为此香所误，立斥内侍毁掉秘方，再也不许制造使用。由检的嫔妃很少，这与历代君王夺天下女儿以自奉的情况比较起来，堪称天壤之别。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京城大风，黄雾满天、黑气沉沉，凤阳祖陵又发生了地震。京师人心惶惶，人们都预感到明帝国的末日来到了，朝中有的官僚大多为自己谋求后路了。

正月初十，李自成逼近京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由检手拿奏

疏、浑身颤抖，痛哭流涕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天下一旦失之，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听到由检要亲自出马，陈演等大学士一个个报名请替，李建泰尤其迫切。李家住山西曲汪，为地方巨富。他表示愿出私财饷军，在山西建立武装，抵挡李自成的进攻。朱由检大喜，当即决定李建泰以督师辅臣身份“代朕亲征”。

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检行隆重的遣将礼，然后在正阳门城楼上摆上宴席为李建泰饯行。朱由检亲自用金杯赐李三杯酒，过后又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赐督辅手敕》交给李建泰。在敕书里授给李建泰莫大的权力。“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遥制。不论何人，只要不服从李建泰便可以尚方剑从事。”李建泰份外感激，誓以死报。饯别后，由检站在城楼上久久地望着李建泰远去的征尘，他把天下安危之重任寄托在李的身上。

可是，李建泰刚出京，轿框就折了，朝野上下皆以为不吉利。此时，北京城外好象已不是明朝的天下，李建泰处处受阻，沿途州县根本不供给吃用。到了河北定兴，县令竟不许进城。待闻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过黄河时，李建泰慌忙撤退，带领几百名亲军进了保定，不久就在保定投降了大顺军。

李建泰出师山西后，北京城守怎么办？全国已无兵力可抽，只好抽调在宁远的总兵吴三桂了。正月十九日，由检指示调吴三桂回来。但吴三桂一撤，就等于将关外之地拱手送给了清王朝。大学士们深知弃地意味着什么，也深知由检思想易反复，爱诿过，故都不敢承担责任。首辅陈演以各种借口拖延，多次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吴三桂内撤后，边民怎么安顿，费用怎么出？山海

关怎么守？一直拖拉到二月底，吴三桂还没撤。三月初，大顺军已经拿下山西，逼近北京。朱由检急了，才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率军入关拱卫京师，但这时已缓不济急了。

随着京师日益危急，朱由检拼尽气力支撑局面。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户部便告称国库已经空空，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朱由检下令勋戚、在京的百官捐助，以纳银3万两为上等。朱由检派太监去找皇后的父亲周奎，让他拿12万，为百官做个榜样。周奎不答应，只拿1万，太监含泪而去。朱由检听了再次派人让他拿2万。周奎暗中向女儿求救，周后给了他5000两，他扣下2000两，只上交了3000两，可后来大顺军从他家抄出现银50多万两。由检嫂子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拿了2万，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只不过几十两、几百两而已。由检看收不上来，便实行摊派，按衙门收。后来又按籍贯收，规定8000、4000、3000不等。太监也奉命捐助，平时最富的太监如王之心等人此时也大大哭穷。折腾了一个月，共得银20余万两。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那儿共得到两千余万两金银。

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朱由检两次发表《罪己诏》，向天向臣下百姓表示承担一切罪责，下令停征一切加派，企图稳定民心，鼓舞士气，作困兽斗。但是，这时候的空言已经毫无意义。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攻居庸关，守关的唐通和太监杜之秩投降。三月十六日打下昌平，当天便有部队到达北京城下。

此时的北京城乱成了一锅粥。京军在城外溃败，城上守者有太监亦有官军，号令不一，兵部、五军都督府、还有太监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没有个统一指挥。城上兵士吃不上，喝不上，士气低落。太监们回报由检，由检也没有办法。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去与由检谈判，提出双方中分天下，由检拿出800万两白银犒军，双方罢兵言和。守城太监曹化淳、王德化将杜勋带上城来，杜勋对由检说明了来意。由检当时未表示意见。他根本不想投降，但又不想放弃这个拖延时间的机会，于是令亲信太监与杜谈判，希望拖到各地勤王兵到来解围。可是，李自成不想再等了。三月十八日晚上，农民军大举攻城，曹化淳打开城门迎降，李自成占领了外城。

由检听到外城陷落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他率领宫内一群太监在城内无目的的转了一圈，回到宫内，登上了煤山。看到外城烽火连天，由检长叹一声，潸然泪下。他默默地站了一会，便回宫去处理后事。

由检首先让人叫来了太子和永、定二王。看着16岁的太子和一个11岁，一个9岁的皇子，由检心里非常痛苦。他告诉他们，北京就要失陷，国破家亡了。你们要逃出去，将来有时机为我报仇。又令人拿来破旧的衣服给三个儿子穿上，由检说：“今天你们是太子和王子，明天就是普通百姓。出去后，见到老者叫伯伯，年青的叫先生。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快、快逃命吧。”由检说到这里哽咽了，三个孩子也哭作一团。由检挥手让太监分别将弟兄三个送到周、田二位皇亲家中。并随手写了一张诏谕，令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人送到内阁，这时内阁已经没有人了。

送走了三个皇子，由检让太监王承恩给他拿了酒来，他自斟自饮，不多时便醉了。他走出宫门，怅望黑压压的紫禁城，内心百感交集。17年的呕心沥血，17年的惨淡经营，如今毁于一旦，他只能以死向祖宗之灵赎罪，向万民赎罪了。他要壮烈地象英雄一样地死去，自己及家庭不能受到任何侮辱。由检令身边的太监

向各宫传旨，皇后嫔妃速速自裁。少顷，由检来坤宁宫，周后哭得泪人一般，看到由检进来她止住哭声，二人泪眼相望，眼睁睁地看着爱妻自缢身亡，由检感到一阵晕眩，随即“哈哈”狂笑起来，提剑走出坤宁宫。

由检从坤宁宫到了袁妃的西宫，几个嫔妃都惊慌地躲在这里。由检看到袁妃已自缢，但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口中尚有呼吸。他抽出宝剑咬着牙向袁妃砍去，袁妃血流如注。由检似乎疯了，他挥动宝剑又连砍了几位嫔妃。然后直奔寿宁宫。

他的次女，16岁的长平公主住在寿宁宫，16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由检很喜欢她。去年，他就在贵族子弟中替她物色驸马的人选，初步选定了一位周姓贵族的公子，由于形势的突变，此事放了下来。此时，国将亡了，明天，乱贼将要入宫，一个少女怎么逃命？由检不敢想象爱女的命运。他宁愿让她去死也不愿她落入贼手苟活。由检到寿宁宫时，长平公主已准备自缢。看到爹爹浑身血迹，手提宝剑，长平公主大叫一声“父皇”，就朝由检扑过来。由检心如刀搅，怕爱女扑进怀中后他再也举不起宝剑，便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一剑砍去，长平公主顿时倒在血泊中。杀了长平公主，由检又去昭仁殿杀了三女昭仁公主。

干了些后，他在宫中稍稍停留，便由太监王承恩架着出宫登上煤山。他跑掉了一只鞋子，沾有血迹的长袍也脱掉了，只穿着一件宽松的内袍。进了寿皇殿，他让王承恩在梁上搭上一根白绫，吩咐自己死后，王承恩可以逃命去。王承恩涕泪交流，表示要随皇上去死，由检心中稍觉宽慰。他最后望了一眼宫城，望了一眼远处农民军点起的熊熊篝火，心中产生了一种解脱感，自己

将白绫套上了脖子。王承恩眼看着君主死后自己，也吊死在他的对面。历经 16 帝 276 年的大明王朝终结。此时，正是 1644 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黎明。

由检死后，与周后一起由清方用柳木棺成殓，寄于寺庙。多尔袞下令以礼安葬他，允许明朝遗老遗少哭临祭典。祭典完后，决定将由检夫妻殓入田妃的陵墓。开掘墓道、建立碑亭，估工价约 3000 两白银。清廷从十三陵陵租中拨给 1500 两，其余由曹化淳等太监和明朝遗老遗少自筹。曹化淳为此多次上奏，多尔袞也数次责成有司速速完工。直拖到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掘墓道的工作方才开始。到了年底，才将墓道修好，打开了田妃陵墓。凑巧的是，安放棺木的陵床非常宽大，放三棺材没问题。于是由检与他的周后、田妃便安息于此了。

南明建立后，谥由检为烈皇帝，庙号思宗。清谥为“庄烈愍皇帝”，无庙号，陵曰“思陵”。